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 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 <http://www.7help.net>

看懂THE NO.1 BOOK UNDERSTANDING CHINA'S ECONOMY 中国经济 的第一本书

江凌峰 汪文生◎著

赢不过GDP，也赛不过CPI，还不如拿着人民币去买美国货？追不上刘翔，更跑不过房价，买房不如租房？
热钱投机，股市迷乱，Hold不住中国经济？就业“被剩”，生活“被穷”，啥时你才能成鲁冠球、李嘉诚？

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专业的经济学刊物、
权威的经济学家，
都不会这样直白对你解答！让人民币追着你跑的天机！

明明白白过日子，草根发财梦不遥远！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看懂经济江湖
洞察财富天机

中国经济与你有关！

看懂 THE NO.1 BOOK UNDERSTANDING CHINA'S ECONOMY
中国经济
的第一本书

江凌峰 汪文生◎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看懂中国经济的第一本书 / 江凌峰, 汪文生著. --北京: 北
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2.2
ISBN 978-7-5502-0545-1

I. ①看… II. ①江…②汪… III. ①中国经济 - 通
俗读物 IV. ①F1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20891号

看懂中国经济的第一本书

作 者: 江凌峰 汪文生

总 发 行: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 010-83670231

责任编辑: 王 巍

封面设计: 华夏视觉

版式设计: 胡玉兵

责任校对: 李永锋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西里一区13号2层 100011）

北京嘉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50千字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17.5印张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02-0545-1

定价: 29.8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63783806

前言

PREFACE

中国经济其实很简单

国外人说：看不懂中国经济，根据最基本的经济学常识和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规律，中国的 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早就应该降下来了。但让人奇怪的是，欧美等国家还没有完全从金融危机中复苏，中国 2010 年的 GDP 增速居然就超过 10%了。

国内人也说：看不懂中国经济，为什么居民收入增长跑不过 GDP 增速，也跑不过 CPI（消费者物价指数）呢？为什么人民币国内的购买力下降了，国际购买力却上升了呢？

是中国经济真的脱离了经济规律，还是人们脱离客观事实、太过主观地看待中国经济？是中国经济追求过高的增长率，还是别有用心的人混淆是非、太过恶意地歪曲中国经济？

很显然，站在大洋彼岸雾里看花，是不可能看明白中国经济的，因为即便以客观的态度来对待中国经济，也只能是纸上谈兵。任何一个不了解中国、没在中国生存过的人，仅根据几组数据、几句传闻就得出

结论，是不可能透过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看清真相的。

有人也许不同意我的这种说法，并且会搬出一个大家很熟悉的经济学家——张五常。他没有出生在中国，也没有在中国生活过，照样能够看透中国。很多经济学专业的人都比较喜欢读他的《卖橘者言》。张五常得到大家的认可，并不是由于他理论推导得好。因为如果这一论断成立，那么记忆力好的人、会推导的人就都可以成为经济学家了。张五常受欢迎的真正原因是：他尊重事实，也喜欢实证。从实证得出来的结论才能让人信服，即便有时也会出错，但因为他敢于付出，也愿意付出，最起码我们相信他是凭良心在说话，而不是口是心非，在卖弄文采，抑或另有图谋。

我们毫不否认，中国经济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因为我们走了一条不同于欧美日的独特道路，我们要以更快的速度实现追赶和超越。其他国家成功的经验可以学习，但世界上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验。即便是拿来就可以用，我们也只能跟在别人的身后亦步亦趋，不断模仿却永无超越的可能。

正因为此，中国注定要走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这条道路或许直通天堂——如果我们的GDP数年如一日地增长下去；或许直达地狱——如果我们的经济体系真像某些人预测的那样接近崩溃。

跨过大洋，从彼岸到此岸，变置身事外为立足国情，揭开层层面纱，中国经济其实非常简单，并没有背离所谓的经济学常识。翻开世界经济史看看，所有曾经或依然发达的国家，都曾经历过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高速增长期，中国并不是特例。

只要摘下有色眼镜，不要纠缠于中国威胁论，也不要纠结于中国崩

溃论，别让“经济学常识”蒙蔽了眼睛，就会发现中国经济并非那样难以看懂。前任加拿大驻华大使罗岚早在 2005 年的时候就说过：全球经济现在依靠中国的发展来提供增长动力。无论是 1997 年的亚洲金融风暴，还是 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都被国际社会誉为全球经济的“稳定器”。

事实表明，中国经济也是踩着市场规律的节拍在前进的，并非真的看不懂。只要坚持走自己的特色之路，就不怕各种妖魔化中国经济的言论。中国不仅找到了一条发展自己经济的特色道路，也将进一步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



看懂中国经济的第一本书
ANDONGZHONGGUOJINGJIDEDIYIBENSHU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CHAPTER 1

稀饭变稠了，离大块吃肉还有多久？



1. 改革号角：要富就要勇吃第一口螃蟹 ■ 003
2. 开放市场：一言定乾坤！ ■ 011
3. 救急经济“高烧”，全靠朱总理的“虎狼药” ■ 016
4. 漫漫入世路咱究竟图什么？ ■ 025



第二章 CHAPTER 2

中国经济走自己的路，让他们说去吧！



1. 中国人的创富欲望，喷薄而出 ■ 033
2. 第一代企业家的秘密：树挪死，人挪活 ■ 037
3. 你流的汗，怎样变得更值钱？ ■ 042
4. 全球化了，就该去买外国货？ ■ 049
5. 金融危机，为何唯中国优雅从容？ 056
6. 高速增长，神话进行时 061

第三章 CHAPTER 3

企业江湖，你该投靠哪路阵营？

1. 国企不再“兵强马壮” ■ 071
2. 小心国企改革变成“一卖了之” ■ 078
3. 国企分红就像一道美的彩虹 ■ 085
4. 民营企业——从草寇到英雄 ■ 092
5. 跨国企业——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 103
6. 民族企业——有实力才有脊梁 ■ 109

第四章 CHAPTER 4

股市何以引万人竞折腰？

1. 上市企业：富豪的摇篮？ ■ 119
2. 20 万亿为何一夜蒸发？ ■ 126
3. 和股市捉迷藏，玩的就是心态 ■ 134
4. 股权分置改革，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 142

第五章 CHAPTER 5

追不上刘翔，更跑不过房价！

1. 低收入者买不起房的时代 151
2. 房价背后，究竟还有几双黑手？ ■ 158
3. 楼市调控，政府靠谱吗？ ■ 164
4. 房地产泡沫，还能 Hold 多久？ ■ 170

C 第六章 CHAPTER 6

通货膨胀在捣谁的乱?

1. “买不起”与“卖不动” ■ 179
2. 谁偷走了你的存款? ■ 185
3. 钱袋缩水, 缘于货币滥发? ■ 190
4. “热钱”, 最狡猾的捣乱分子? ■ 197
5. 高物价时代老百姓的活法 ■ 203

C 第七章 CHAPTER 7

就业天花板, 达摩克利斯之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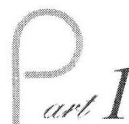
1. 天之骄子过剩, 扩招惹的祸? ■ 211
2. 民工荒, 紧张了谁的神经? ■ 217
3. 白领怎么就无辜失业了? ■ 224
4. “公务员”何时成了“金饭碗”? ■ 232
5. 机会天花板, 你被挡住了吗? ■ 238

C 第八章 CHAPTER 8

钞票多了就幸福了吗?

1. 财富鸿沟, 你在哪一边? ■ 245
2. 财政大盘子与百姓小盘子 ■ 253
3. 你离幸福还有多远? ■ 260

参考书目 ■ 267



第一章

稀饭变稠了，离大块吃肉还有多久？

● 弹指一挥，沧海桑田。30 多年时间，中国 GDP 达到 58790 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 1978 年的 3624.1 亿元到现如今的 58790 亿美元，短短 30 余年时间，中国经济总量翻了上百倍。

这样的变化，只能用“翻天覆地”来形容；这样的发展，只能用“日新月异”来描绘。所有这一切，都源于 1978 年的体制改革。那一年，从南海吹响的改革号角，掀启了中国经济腾飞的崭新篇章。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 1. 改革号角：要富就要勇吃第一口螃蟹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新闻报道中，描写中国新经济起航的原点时，最常用的一个词就是“一穷二白”。

毛泽东在 1956 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早就对“一穷二白”这个词进行了阐释：“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

这篇文章发表 22 年后，中国又一次从一穷二白的状态开始了新的经济起航。

中国古语说得好：穷则变，变则通。战争和错误的思想斗争的破坏力毋庸置疑，但正因为由此而来的“一穷二白”，中华民族才有了崛起的紧迫感和使命感。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世界政治格局和形势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新的时代主题。新形势下，军事、政治退居“二线”，经济、科技走向前台。面对咄咄逼人的资本主义经济强国，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站了出来，振

臂疾呼：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

这是振聋发聩的呼喊，整个民族都为之振奋。1978年12月18日，在这个注定要在中国历史上烙下印记的日子，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帷幕。此次会议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决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并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

由此，一场自上而下掀起又自下而上得以推动的改革大潮，在神州大地上奔涌而起。

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中国建设同样走了这条路线。改革的号角虽然由上层吹响，但真正的实践还是由农村开始的。从来就没有闭门造车能诞生的理论创新，也没有脱离实际而有效的方针政策，一切都源于群众的首创精神。

时势造英雄。历史转折关头，总有一些人会以先行者的姿态走出来。他们或为先驱，或成先烈，但无一例外地会成为人们缅怀的对象。1978年冬天，从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开始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农村生根发芽，成为改革之初最璀璨的一道风景。饱受贫穷生活的人们，压抑不住创富的冲动，18位农民以“托孤”的形式在协议书上悲壮地摁了手印。至今，在小岗村的展览室里，依然保留着这份弥足珍贵的史料。

历史证明，人民群众才是创造历史、建设国家的真正

英雄。要想打破体制的桎梏，寻找新的出路，就必须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改革的浪潮从农村兴起，取得成效后开始向城市蔓延。城镇人民的嗅觉更加灵敏，但也更为谨慎小心。农村火热的改革气息撩人心弦，城里的人早就按捺不住热情。市场刚刚开放，商机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只要敢为天下先，即使是贩夫走卒，也能够赚得盆满钵满。

改革一时间风起云涌，“下海”成了时髦的名词，“经商”成了时代的强音。于是出现了很多令人难以置信的经商传奇：原本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放下书本拿起算盘，成为改革的风云人物；原本游手好闲的“懒汉”，手握秤杆成了诠释政策的代言人。

在很多反映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生活题材的小说中，我们很容易发现这样的故事：一个生性懒散又好高骛远的人，自己不屑于也不会侍弄庄稼，是大家眼中的败家子和懒汉，甚至连个媳妇都娶不上。身上有点偷鸡摸狗的劣迹，偶尔做一些投机倒把的事，成为乡领导、村领导眼中的投机分子，频频遭到打击和批判。然后，此人一度消失，几年后的某一天，居然衣锦还乡。在电视剧《我的孩子我的家》中，林建设就是这种形象的代表。知青林建设下乡返城后，一直找不到工作，只能寄居在哥哥家里。林建设除了维护家人尊严偶尔打打架、砸砸人家玻璃外，每天游手好闲，无事可做。后来迫于生活压力，林建设离开

哥哥家，消失得无影无踪。几年后，林建设突然回来，摇身一变成了一家工厂的厂长。

那时候，经商虽然有政治风险，但市场空间极大，既不需要渠道，也不需要走关系，只要有货源，就不愁没有销路。今天，很多人说在国有企业老总的椅子上放一头猪，企业也照样正常运转。这话有点戏谑的意味，但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80 年代初的时候，只要是敢于下海的，赚不到钱的人很少。

天津有“帽子王”之称的王德强，年轻时支援边疆建设，1979 年年底返回家乡小城，1983 年踏上创业之路。其实，说创业可能有点夸大其辞，事实上有点倒买倒卖的意思，只不过开始时规模很小。创业之初，王德强只有 200 元资金，从朋友那儿借了 400 元钱后，才凑够了做第一笔生意的本钱。

那时候，王德强一家三口只能挤在一间 17 平方米的地下室里。然而，一旦下定了决心，王德强就将借来的钱投到了帽子生意上。回忆当年的情景，王德强说：“我把帽子拿到河北任丘去卖，果然旗开得胜，小小的帽子打开了我生意的大门。后来我又去卖服装。凌晨 5 点拿货，花 1 毛钱买个红薯边吃边走，赶到任丘正好 9 点，开始卖货。当时就我一个人，不能去喝水、不能去吃饭，更怕上厕所。直到下午 5 点多钟，货卖完了才能放心地吃一顿

饭。”

凭 600 元起家，两年后王德强已经积累了数千万资产，成了当时最让人羡慕的“万元户”。之后，生意越做越大，牌子也越做越响，被评为天津市著名商标。王德强的下一步目标是打造中国帽业第一品牌。

像王德强这样的“生意人”很多，他们初期的目标通常并不远大，赚点小钱，改善生活条件，是大部分人的初衷。但还是有一批商人受够了体制内的压抑，希望在商海中搏击，捞一桶金。

1979 年 1 月，被誉为“改革开放第一人”的袁庚，在中央的指示下，率领招商局在深圳宝安县开发蛇口工业区，真正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的呼吁下，一大批企业家昂首登上舞台，开始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那时候，后来成为 TCL 董事长的李东生还没有接触电视和手机，而是与香港人合作生产录音带，在农机仓库里开办起工厂；后来成为中信泰富集团董事局主席的荣智健那时年少气盛，只身前往香港，虽然大赚了一笔，但经历磨难的他最终选择了跟随父亲荣毅仁从商这条更为轻松的道路；而后来成为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的冯仑那时不再愿意被体制束缚，果敢地离开了国家体改委，前往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海南创办了“万通”；而步步高集团董事长段永平那时也早就对国营企业的沉闷

心生厌烦，虽然研发“小霸王电脑学习机”还只是浮光掠影的想法，但是他还是离开了北京电子管厂，希望真正做点事。

这些勇吃第一口螃蟹的人，大都怀着“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情怀开始创业历程，但却无一例外地成为中国现代企业家的先驱，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史册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然而，改革毕竟不是请客吃饭那样简单。改革意味着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意味着既得利益者的挑衅和反抗，甚至意味着流血和牺牲。1981年，国务院先后下发两次文件，措辞严厉：对严重破坏经济秩序的罪犯，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他属于哪个单位，不论他的职务高低，都要一律追究其责任，严惩不贷。就这样，人们身处风云激荡的时代，身前可能是暴风雨，身后也不代表阳光灿烂；昨天还是媒体上的“人民”英雄，今天就可能成了阶下囚。

早期的创业者中，女性企业家很少，金燕静可以说是其中少有的几朵“金花”之一了，在北京商业圈子里更是大名鼎鼎。她和好友于1984年创办了信通公司。她身上有着多数男性企业家的果断决绝，很有领导魄力。在她的带领下，信通迅速发展，很快就名列中关村最负盛名的“两通两海”之列，比联想的名气要大得多。

金燕静魄力惊人，在1988年的时候，她就与一家美

国公司达成协议，共同生产 286 微机。在她的运筹帷幄之下，这次合作还得到了国家教育委员会的支持，并获得世界银行贷款。要知道，联想直到 1990 年才获得微机生产许可证，开始 286 微机的生产。这就是说，信通的国际化腾飞比联想整整早了 2 年。

那时候，通讯业还不发达，只有国家级别的新闻才能覆盖全国，然而信通这家创业仅 4 年的公司却因为被列为当年中国计算机界的十件大事之一而闻名全国。同年，金燕静作为 4 名获奖者之一，成为“首届全国科技实业家创业奖”的金奖获得者。此后，金燕静先后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信通则成为“中关村优秀高新技术企业”。

或许得益于女性企业家的独特身份，金燕静一时风光无限，成为北京企业家圈内的明星人物。然而，1991 年，信通公司却因为涉嫌走私被海关缉私处查处，金燕静也因此身陷囹圄数年。

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机遇，让一些人在追求商机的过程中迷失了自我，像金燕静那样触犯了国家政策或法律的底线。如今，温州人心头依然难以抹去当年“八大王”事件的阴影。面对当年严峻的政策形势，“八大王”有的不知所措，有的试图救赎，有的则逃亡他乡。“矿灯大王”程步青是“八大王”中最年轻的，但也是第一个被逮捕并

【温州八大王】

指的是改革开放初期温州柳市镇的八个个体户，即“五金大王”胡金林、“线圈大王”郑祥青、“螺丝大王”刘大源、“目录大王”叶建华、“矿灯大王”程步青、“旧货大王”王迈仟、“电器大王”郑元忠和“合同大王”李方平。还有一份名单和上述名单略有区别：最后两位换成了“胶木大王”陈银松和“翻砂大王”吴师濂。1982年，国家七部委联合调查组进驻柳市镇，以“投机倒把罪”查处了这批风云一时的人物。

接受批斗的乡镇企业家；“目录大王”叶建华在遭遇变故前一无所知，正在给孩子洗脚的他，以被邀请谈话的名义进入了监牢；“五金大王”胡金林是“八大王”中较有远见的一个，他闻风而动，扛着一整袋6万元的现钞上门向工作组交代，补缴了一年多的税款。但问题并没有解决，精明的他在被捕前走上了逃亡之旅。两年后以为风声已过，没想到刚回家就被送进了监狱。

事实上，当时涉嫌走私的企业很多，联想也曾一度遭到调查。

记忆清晰而恍惚，很多童年在20世纪70年代度过的人，一度对改革充满了不屑。改革前，他们经常有机会端着成人用的大瓷碗，趁着夜色到“大队部”分食肉汤；改革后，这样的场面成了关于童年的回忆。虽然炉灶里的火比以前旺了，锅里的稀饭比以前稠了，但要想随心所欲地大块吃鱼、大碗吃肉，还要耐心地等待一段时间。

►► 2. 开放市场：一言定乾坤！

这是一个关于春天的故事，但依然有着丝丝寒意。

第一代企业家大都对邓小平心怀尊敬，年广九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出生于改革发源地安徽的一户满族人家。当很多个体户还在为几十元的小买卖折腾时，他凭借炒瓜子手艺和6万元原始资本，打造了“傻子瓜子”的品牌。凭借灵活的经营手段，他将产品迅速推向全国，在北京、上海和南京等一线城市全面铺开。短短几年，就成为中国最早的百万富翁之一。

市场刚刚开放，财富之门才打开一条微小的缝隙，人们能够接受生活富裕者，却无法容忍大富翁的存在。官方有人建议“动”他，但被邓小平制止了。1984年，在中顾委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冷静地说：“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

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邓小平的坚持稳定了局面，也让更多的精英人物走上了经济舞台的前沿。

因为邓小平的干预，年广九在 1984 年侥幸脱身。但他的噩梦并没有因此结束，很多双眼睛还在盯着他的一言一行。1989 年，改革似乎遭遇了十年之“痒”。这年元旦，《人民日报》社论中写道：在改革的第十年，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经济生活中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党政机关和社会上的某些消极腐败现象也使人触目惊心。事实上，风声从 1988 年就开始响动，在 1989 年则达到一个高潮。

作为改革的桥头堡之一，温州依然首当其冲。在 1989 年 5 月 14 日的《人民日报》上，一篇名为《温州的畸形消费》的文章，将温州形容成声色犬马、攀比成风的城市。在全国政协七届二次会议上，浙江省政协委员不惜自曝家丑，当面对温州企业的举动进行指责。于是国务院采取了行动，研究室主任袁木派出四人调查组赴温州调研。

这一年，不仅温州的改革遭遇了寒流，全国各地都是如此，安徽也不例外。上次侥幸脱身的年广九，再次成了检察院调查的对象。芜湖市人民检察院以贪污受贿罪将年广九送上法庭，理由是年广九在与芜湖郊区政府联营期间贪污挪用了大量公款。然而，法院调查的结果显示，年广

九在联营期间虽然存在账目不清等问题，但并不构成贪污罪。在经济问题调查无果的情况下，年广九的私人生活也被列入调查范围。最终，中级法院以流氓罪判处年广九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虽然是缓刑，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意味着年广九已经失去了经营自由，甚至连人身自由都受到了限制。幸运的是，就在这个当口，对此事并不知情的邓小平在南方视察过程中再次提到“傻子瓜子”：“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针，影响改革全局。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这无意间又救了年广九一次。

中国改革开放史上最重要的年头有两个：一个是开篇的1978年，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幕；还有一个就是1992年，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为标志。

邓小平南方视察发生在改革的关键时期，一方面经济改革已经全面铺开，但缺乏强有力的政策指导，理论上也有待提升；另一方面，苏东剧变后，改革浪潮受到了影响，社会上产生了很多负面言论。当时，北京有媒体刊载了一篇《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章，认为：私营经济和个体化就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根源。社会上

也时常听到这样的讨论：改革开放要收一收，该抓抓阶级斗争了；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根源，经营机制是资本主义的；中央要取消个体户了……

从当时的形势看，改革的动力在变弱，改革的阻力在加大，而且还有倒退的可能。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邓小平意识到危险，随即作出了南方视察的决定。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到南方视察。1月19日，邓小平到达深圳，在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和深圳市委书记李灏等人陪同下，全面考察了深圳的城市建设、政治文化、经济状况和精神文明建设。在此期间，邓小平很少讲话。这时候，全国的目光都在盯着深圳，因为从这里传出的任何声音，都会成为举国上下新的政策动向和指示。邓小平很谨慎，直到临行前，才在蛇口码头对李灏说：“你们要搞快一点！”

但对翘首以盼的人们来说，仅仅这一句话显然还不够。直到1月27日，邓小平在考察珠海的企业时才发言：“不是有人议论姓‘社’姓‘资’问题吗？你们就是姓‘社’。”

一言定乾坤。邓小平的南方讲话，第一次以官方的名义正式肯定了改革的成绩，并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为党的十四大的召开奠定了基调。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党的十四大在北京召开。会上，党中央正式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

【南方谈话】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社会主义大家庭发生了动荡。中国国内也出现了各种思潮的碰撞，人们在思考：社会主义命运将会如何？中国今后怎么办？同时还出现了姓“资”姓“社”的争论。关键时刻，邓小平于1992年初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通称南方谈话。南方谈话重申了深化改革、加速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初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

场经济体制”的论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崭新的概念，也是个独创性的提法。在此之前，只有一种说法：社会主义运用计划调节经济，因此计划是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用市场调节经济，因此市场是资本主义的。正因为此，邓小平在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时才会踌躇良久。

从这时候开始，中国经济改革的大幕才正式拉开。

►► 3. 救急经济“高烧”，全靠朱总理 的“虎狼药”

就在邓小平南方视察的前一年，一位湖南人从上海转战北京，在中国经济改革最为关键的时段，力挽狂澜，上演了一幕荡气回肠的大戏。

改革有时候并不难，只要能抓住主线，保证政策的延续性，就能开展得轰轰烈烈。中国改革最关键的无疑是经济改革，一位懂经济的总理当然必不可少。邓小平曾经如此评价朱镕基：“我们党现在和将来都需要一批党性强、懂经济、思想开放、富于创新、任劳任怨的领导干部，这样的同志现在还不多，朱镕基就是这样一位同志。”

朱镕基曾陪同邓小平巡视上海，对邓小平的改革思想体会甚深。由此，邓小平也认为朱镕基能够将他的改革方略付诸实施，甚至发扬光大。最关键的是，中国改革正遭遇洪流，格局尚不稳定。在这种形势下，急需一位果敢勇毅、特立独行的大管家，为改革大业保驾护航。邓小平认

为朱镕基无疑就是这样一位人物。

“经济沙皇”、“铁腕总理”、“铁血丞相”，这些朱镕基履职期间获得的外媒评价的称谓，足以印证了邓小平的慧眼识才与远见卓识。

事实上，我们从朱镕基上任伊始的言行也能看出他一往无前的决心。刚当选总理的时候，他在记者招待会上慨言：“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是这种直面困难、义无反顾、雷厉风行的领导风范，为他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尊重。

朱镕基在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影响，早在他成为副总理期间就开始彰显。研究朱镕基的文章资料，通常将 1993 年至 2003 年这段时间，归结为“朱氏十年”，这是因为朱镕基总理实质上从 1993 年连任副总理的时候，就开始总管中国经济和金融，并成为继邓小平后的第二位改革设计者。

随着一系列有关市场经济的文件相继出台，中国经济像脱了缰的野马一般迅速蹿升，甚至还有继续蹿升的势头。发展是好事，形势看着也很喜人。但朱镕基毕竟是有经济学问的人，他当然明白经济发展是遵循周期性发展规律的，任何一个国家也不可能脱离世界经济体系而成为一枝独秀。事实上，他早就看出了经济过热的苗头。早在

1993 年之前，改革一度遭遇暗礁，经济发展中突显出来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思。

数据显示，1992 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为 12.8%，比 1991 年高出 5 个百分点。随着现金投放力度的加大，经济逐渐呈失控状态。到了 1992 年年底，商品零售价格上升了 6.7%，一线城市甚至超过了 13%。更让人担心的是基本生活资料价格的上涨，这可是关系民生的重要领域。那一年，粮食价格一度上涨了 43%，让人触目惊心。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在一份报告中披露：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急剧贬值，平均贬值幅度达到 25%。

一切现象表明，通货膨胀的迹象已经越来越明显。1993 年，问题变得更加严重。4 月份统计局发布的报告显示：大城市的生活物价指数涨了 17%，而原材料价格上升了 40%。5 月，世界银行忍不住向中国政府发出警告：“这些现象如不及时制止，当经济增长率放慢时，可能演变为一场金融风暴。”

事实上，当时不仅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率骤升，就连金融系统也出现了很多不良反应。下面这几件事能够说明当时经济问题的严重性。

中国农业银行衡水中心支行行长赵金荣和副科长刘淑红，仅 4 月 1 日愚人节一天，两个人就开出 200 份金额达

100 亿美元的备用信用证，交给了两个在美国纽约注册公司的骗子。而另外一个叫沈太福的人，以“年息 24%”为诱饵，非法集资 10 亿元，不仅贪污，还向一些相关干部和媒体记者行贿。而著名的“苏三山”事件，则更为引人深思。一个姓李的湖南人，声称身份是某县物资局的干部，提出公款 100 万元，又在银行透支 1000 万元，在深圳买下 15 万股“苏三山”。然后在北海市街头小摊刻了一枚印章，用盖有印章的传真向深圳、海南两地的媒体宣布：已收购“苏三山”5%的股本，总计 2503300 股。媒体信以为真，当即发布了有关信息。随后，“苏三山”股值大涨 40%。前面的经过虽然悬念迭起，后面的结果却四平八稳。李姓湖南人被揭发，跟着买进的股民被“苏三山”套牢。

经济改革大潮中，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对出现的问题当然不能等闲视之。

急病需猛药治，主管经济的朱镕基当然不会对此放任不管。降低物价，减轻通货膨胀，实现经济“软着陆”，就此成为政府工作的主旋律。为了搞清楚中国经济的现状和问题的本源，朱镕基向全国 26 个省（直辖市）市派出了 13 位部长。这 13 位部长回来后每人写了一份汇报材料，共计 13 条意见。在国务院讨论时，朱镕基开玩笑说 13 条

【分税制】分税制是指在国家各级政府之间明确划分事权及支出范围的基础上，按照事权和分税制财权相统一的原则，结合税种的特性，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税收管理权限和税收收入，并辅之以补助制的预算管理体制改革模式。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于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迅速下降，中国中央财政陷入严重危机。在这一背景下，1994年，在朱镕基力主下，中国开始推行分税制改革。

建议不吉利，就又加了3条。这16条就是影响深远的“中共中央六号文件”。原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个文件非常重要，为经济体制改革打下了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对于分税制的展开起了非常大的作用。1993年下半年，我们几乎全部精力都扑到了分税制改革上，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其中许多是非常紧急的。”

新一轮经济政策中，明确提出：要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收回超过限额的贷款；股份制公司挂牌上市；削减基建投资；削减行政费用百分之二十；重新审查开发区；改革外汇留成制度；停止用“白条”支付农民的粮款等。凌志军在《变化：1990—2002年中国实录》一书中写到这段历史时说：“党的方针具有如此鲜明的个性，实属罕有，一看就知是出自朱的手笔，但是可以肯定他得到了江泽民的支持。”

事实证明，朱镕基这次的确动了真格的。此前，国务院曾多次指示中国人民银行收回贷款，以便遏制经济过热态势。然而，这一精神始终未得到贯彻落实。现在，形势更加严峻了，朱镕基已经失去继续等待的耐心。于是，他以常务副总理的身份出任新一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以分税制为代表的一批新政策的相继出台。1993年7月，朱镕基第一次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身份，将全国各地的行长们召回北京面谈。这次再没

有回旋的余地，连时间期限都作了说明，而完不成任务的代价则是被摘掉“乌纱帽”。

期限是 40 天，“逾期收不回来，就要公布姓名，仍然收不回来，就要严惩不贷。”

会上，朱镕基不怒自威：“自己不勤政，又不廉政，吃吃喝喝，乱批条子，任人唯亲，到处搞关系，把国家财产不当一回事，你还坐在讲台上作报告，下面能不骂你？更不会照你说的去做。你也不敢处理一个人，就只能搞点福利主义，给大家发点奖金，形成一种庸俗的机关作风，这要害死人的……我在这里讲的，如果我自己做不到，我绝对不要求大家。如果你们发现我有不廉政、不勤政的问题，你们可以检举、揭发。”

面对讨价还价的债务人，银行行长们毫无讨价还价的余地：“我通融你，朱老板非把我的头砍了。”这话当然只能在私底下说，但严肃性不容置疑。到了 7 月底，银行收回了 332 亿元贷款，另外还增加了 405 亿元的储蓄。

有了前期的铺垫，后期发布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就水到渠成了。1993 年 11 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向全国人民描绘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蓝图和国家推进改革的有关举措。《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

度；一般小型国有企业，可以实行承包经营、租赁经营、股份合作等方式，实行灵活经营。这是朱镕基针对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措施，也是国有企业“抓大放小”战略改组方针的雏形。

1994年，通货膨胀率还没有完全控制住，按照官方的解释，这是滞后效应。随后的一段时间里，通货膨胀率不断降低，经济过热现象有所缓解。与此同时，朱镕基开始加大财政和税制改革，首当其冲的就是分税制改革。

即便今天，分税制改革的利弊在专家学者当中和民间都没有定论。但在当时，分税制无疑是有效地增强了中央政府的控制力。1992年，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试点办法》，决定在浙江等9个省市率先实行分税制的财政体制。1993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正式决定从1994年1月1日起改革现行地方财政包干体制，对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计划单列市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项怀诚在评价分税制时表示：“财政收入由1993年的4349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51300亿元，14年平均年增3354亿元，平均年增长19.3%。这一切充分说明了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功不可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次广泛而深刻的改革，它奠定了中国特色财政改革的基础。”

不管怎样，就当时的情形来说，朱镕基的经济政策无

疑也是有效的。从 1993 年到 1996 年，用了将近 3 年时间，中国经济终于实现了“软着陆”。1997 年的时候，中国的通胀率低至 0.8%，经济增长率则达到 8.8%。这次“着陆”无疑是非常及时的，因为在短短的几个月后，一场让人谈之色变的金融危机席卷亚洲。而正是因为朱镕基的先见之明，击碎了中国经济中的泡沫，有效地防范了金融危机。在危机最为严峻的时刻，如果不是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那么金融危机的影响可能会更加剧烈，甚至可能蔓延到全球。

朱镕基总理在金融危机中的贡献不仅限于中国，而且辐射到全球。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就认为朱镕基总理应当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美国人龙志安更是为朱镕基总理的领导魅力所倾倒，直到 2002 年的时候，还在为使朱镕基总理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到处游说。

事实上，朱镕基的“虎狼药”还有很多。在被外媒称为“地雷”的国企改革和机构改革以及“入世”的过程中，这位共和国总理的表现都赢得了无数喝彩。

很多时候，普通百姓对改革过程中一些关系自身切身利益“小事”的关注度远远高于对国家大政方针的关注度。

在这个时期，有一件“小事”被很多人记在了心里，虽然这同样只能算是个小插曲。1994 年通过、1995 年 1

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明确规定了“五天工作日”。这一规定让所有劳动者欢欣鼓舞，尤其受到了那些风华正茂的青年学生的追捧。

►► 4. 漫漫人世路咱究竟图什么？

“在一个晚餐会上，你不可能把请美国人吃的菜单，同样请我们吃一遍。”

这是中国为申请加入世贸组织在谈判时对欧盟代表所说的话。很直白，但却意味深长。据龙永图所言，欧盟之所以不肯让步，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护其作为世界强大经济体的面子。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程如此艰辛，就是因为一方面要稳定和推动国内的改革进程，另一方面还要顾及欧美对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需求。

开放和改革是作为一条政策同时提出来的，但改革远远地走在了前面。虽然深圳等经济特区和 14 个沿海开放城市是打着“开放”的旗号发展起来的，但在发展的前期，无论是经济特区还是开放城市，享受的主要还是国内改革的成果，开放的影响相对要小得多。对开放政策来说，仅有几十个对外窗口是不够的，中国还需要更广阔的

【中国入世历程】

1982年11月，中国获得GATT的观察员身份，从而能够出席缔约方的年度会议。

1986年7月11日，中国正式照会GATT秘书长，要求恢复其GATT成员国席位。

1995年1月1日，世贸组织正式成立，有134个成员。它取代关贸总协定，负责管理乌拉圭回合一揽子协议的实施，负责管理世界经济和贸易秩序。

1995年7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决定接纳中国为该组织的观察员。

2001年6月14日，中美就解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遗留问题达成了全面的共识。

2001年6月20日，中国与欧盟达成全面共识。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舞台，而加入WTO无疑就是经济开放最鲜明的标志。

进入改革开放的第20个年头后，中国终于要在“开放”上发力了，加入WTO则是开放政策的中心工作。当前，世界贸易组织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起，并称为世界经济体制的“三大支柱”。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世界贸易组织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愈发重要。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要想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并获得必要的经济保护，加入WTO无疑是捷径之一。世界贸易组织在宗旨中强调：努力确保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增长中的份额与其经济需要相称。中国便是考虑到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开放，要想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就必须成为WTO的一员。

颇有戏剧色彩的是，中国原本在1971年就有机会加入GATT（关贸总协定），也就是WTO的前身。龙永图曾很遗憾地说：“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中国当时认为关贸总协定是一个‘富国俱乐部’，所以中国决定不参加。”等中国想加入的时候，又由于意识形态和经济体制的限制，使得“入世”过程一波三折。

1999年是“入世”极为关键的一年，4月6日，朱镕基抵达洛杉矶，开始了访美历程，准备争取与这个在世贸组织中占重要地位的大国进行谈判。当时，北约正在打击巴尔干半岛，美国国内反华的声音很高。朱镕基的行程让

人担忧，但他自己却没有放在心上，凭借着他的亲切、幽默、睿智和真诚打动了美国人。

他在大雨中与迎接他的华人握手，风趣地说：“老天爷似乎不欢迎我，昨天晴天，今天下雨。”

洛杉矶市长问他对西方歌剧的兴趣，他直言不讳：“我喜欢民乐和京剧，我听了以后精神振奋。我对今天表演的莫扎特四重奏，也觉得表演得很好，我一直在鼓掌，但我也要承认，我确实听不懂。”当克林顿在白宫的记者会就此调侃时，朱镕基说：“我听歌剧时绝对没有打瞌睡，只不过是打瞌睡。不仅没有打瞌睡，而且在一些不该鼓掌的地方鼓了掌……”

而当有记者指责中国窃取美国的核技术时，朱镕基将自己的幽默和睿智发挥到了极致：“洛杉矶市市长夫人曾问我如何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我告诉她说，我们今年将有一个盛大的阅兵式，展示中国最新式的武器，这些武器是中国自己开发的，不是从美国偷来的。市长夫人向我建议在那些武器上标明：‘中国制造，不是从美国偷来的’。”此语一出，连克林顿都忍不住捧腹大笑。

美国的刁难是显而易见的，但中国的“入世”不仅仅是中国人民自己的选择，世界同样需要开放的中国。经过一番谈判，美国便不失时机地接受了中国的条件。

除了美国和欧盟，其他国家的谈判就简单而顺利了。龙永图介绍世界贸易组织的会场时说：“中间一个很大的

咖啡厅，大家都坐在酒吧间喝啤酒、喝咖啡，周围一圈是谈判间，都是小谈判间。小谈判间是美国和欧盟在谈，日本和加拿大在谈。几个大国在谈，100多个小国家基本就坐在咖啡厅喝咖啡。”

这100多个小国家的代表其实就是看客，并没有太多的话语权。当时有一篇文章这样描述道：有记者见一个非洲国家的代表在各种场合到处散发名片，就问他为什么要这样。这位代表挺幽默地回答说他们是“微的非小国”。其潜台词就是，他们的国家是微不足道的非洲小国，不发名片的话，是没有人会记住他们的。

中国加入WTO虽然很晚，也很难，但再怎么说是也在世界舞台有一席之地的，不用在大厅里喝啤酒、喝咖啡。

在网上搜一下“中国为什么要加入WTO”，相关搜索结果高达164万个。由此可见，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中国政府为什么要花费数十年时间和世贸成员国进行谈判甚至不惜放弃很多利益也要加入WTO。以中国庞大的消费和投资市场，如果没有非常必要的理由，当然没有必要向欧美等国家妥协。正因为加入WTO对我们意义重大，中国政府才会不惜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甚至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后，依然忍辱负重，继续坚持和美国谈判。

具体说来，中国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高速发展后，已经面临发展的瓶颈，如果想继续以更高的速度发展，就

必须打开国门，迎接世界市场的挑战。WTO 信奉的是对等原则，只有我们向别人开放，别人才会给予我们同样的慷慨。在加入 WTO 前，我们每年都要和欧美各国就最惠国待遇问题举行谈判，为与欧美做生意的中国企业争取优惠条件，当我们加入 WTO 后，就不用再为此费精劳神了。

然而，最美的玫瑰下面总是藏着棘刺，WTO 同样是把双刃剑，当你伸手去碰的时候，也会受到在所难免的伤害。中国人民大学的贾根良教授就曾表示，中国甚至应该考虑退出 WTO。在他看来，中国在加入 WTO 后的 10 年间，虽然 GDP 和外贸增长迅猛，但在通货膨胀、高 CPI 的影响下，普通百姓的实际收入水平基本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即便从 GDP 增长的原因上来看，似乎也不容乐观。政府和支持中国加入 WTO 的学者认为，外贸增长是推动 GDP 增长的重要因素。然而，从外贸的层次来看，这种增长是很难持续的，对国内产业的升级也毫无利益可言。众所周知，我国的外贸是以进口高端产品、出口低端产品为主要结构形态。这种结构形态虽然能在短期内获得经济增长，却抑制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在经济增长的表象下，中国的产业结构和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考察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历史，它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走了一条与中国相反的道路。当产业结构的层次和

技术水平很低时，为了实现对发达国家的赶超，它们通常采取产业保护的政策，让国内的高端产业尽快发展起来，形成足够的比较优势。在此基础上，再采取出口高端产品、进口低端产品的外贸政策，在国际贸易中争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和话语权。

很显然，中国在产业保护方面做得远远不够。当我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而欢呼时，全然没有意识到中国很多重要的产业和高端市场已经被跨国企业抢占甚至垄断了。比如说汽车产业、通信产业等，都是在签署多边协议时明确要打开的市场。当产业保护政策取消后，中国这些原本弱势的产业就将直接面对跨国巨头竞争的冲击。以中国企业的资本实力、技术实力，当然无法战而胜之。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能选择与对方结盟，或成为对方的加工工厂。

退出 WTO 虽然不值得提倡，但如何更好地适应 WTO 规则，合理地运用 WTO 规则，将 WTO 当做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的动力，这才是我们应该考虑的。

P art 2

第二章

中国经济走自己的路， 让他们说去吧！

● 对那些滥批中国经济的人，有网友这样回应：国外的那些人纯粹是眼红，希望中国经济脱轨；国内的那些人吃饱了没事干，拿着放大镜到处找事。尤其是那些研究经济的，就喜欢俯视一切，将发现问题当做专业，事实上可能还没搞懂什么叫“边际效应”；那些搞时评的，无外乎是为了找口饭吃，将发现问题当做饭碗，事实上可能还没搞明白什么叫“价值规律”。

鲁迅对这样的人会说：“一个都不要放过！”我们却没有必要这样。对这样的人，我们不能太苛刻。发展是硬道理，走自己的路，让他们自个说去吧！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 1. 中国人的创富欲望，喷薄而出

幼儿园孩子们最庄重的誓言表示是拉钩。小时候，我们都曾许过“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的诺言。这样的诺言，在成人眼中似乎显得很天真，但没人会去怀疑孩子们的真诚。对他们而言，拉钩意味着一切。然而，成人的世界里是没有拉钩的，有的是法律、制度、合同和协议。一个国家的发展，当然更离不开政策和制度。

“文革”结束的时候，人们翘首以盼，希望国家的政策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现代化建设转变。1978年，改革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开展起来。在率先举行的科学技术大会上，郭沫若的声音如鲜花般绽放：“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

原本厚重的历史，经过诗人的语言点化，就变得意蕴无穷。

有一首诗这样写道：“青锋一闪而过，将我剖成两段
呼痛的断藕……一段，叫从此；一段，叫从前。”

1978 年就是一个节点，1978 年以前，叫“从前”；
1978 年以后，叫“从此”。1978 年，中国重新起航，从
此，中国人民开始在追求富裕的道路上狂奔。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绞尽脑汁的邓小平又有了
新的想法，他将胡耀邦和于光远叫到家里，从桌子上拿起
一张纸。至今，于光远依然记得纸上写的七个重要问题：

- 一、解放思想，开动机器；
- 二、发扬民主，加强法制；
- 三、向后看是为的向前看；
- 四、克服官僚主义、人浮于事；
- 五、允许一部分好起来；
- 六、加强责任制，搞几定；
- 七、新的问题。

现在看来，最重要的无疑是第五点“允许一部分好起
来”。由于是私下的聊天，这一点写得有点过于简单，其
实就是指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邓小平
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必须允许一部分企业、地区、社
员先好起来，这是一个大问题。在具体的数据上，邓小平
强调，农村富裕人口可以由 5%增到 10%，再增到 20%，

城市富裕人口的比例一开始就可以占到 20%。按邓小平的说法，干得好的，就能影响左邻右舍。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国家经济的发展，同样离不开领导人的带领。邓小平对部分地区、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看法，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基调。不过，即便有了邓小平的有力号召，要想让大部分人很快接受这样的观念依然很难。国家全面宣传这个政策还要在几年以后，直到 1984 年，大家才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共识：“平均主义的泛滥必然破坏社会生产力……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带动越来越多的人一浪一浪地走向富裕。”

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变迁，彰显了国家在不停地尝试用新思维看待财富，审视富裕和贫穷的差异。早在 1979 年的时候，邓小平就审慎地指出，中国在以计划经济为主的前提下，也要结合市场经济，并不忘强调，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到了 1982 年，党的十二大报告已经名正言顺地指出，我国的经济体制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在此基础上，中央很快又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强调要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给了商品经济真正的“名分”。

之后的故事脉络分明。1992 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以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

存在、共同发展；1997年党的十五大则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确定了下来；而到了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有人曾说：“这一重要论述，使我们进一步增强了鼓励、支持、引导发展民营经济的信心和决心，也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发展民营经济的目标和方向。”

制度变迁的主要意义在于解放了民营经济，让中国民营企业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登上历史舞台。党的十六大的时候，五位民营企业代表出现在大会现场。这一幕曾让多少民营企业家兴奋激动！他们无一例外地将其当做民营经济时代来临的标志。

正是在经济制度的变迁中，人们逐渐打破了平均主义的窠臼，不再将钞票和富裕当做洪水猛兽。

西方有句谚语：不要试图改变一个孩子的想法。或许，最难改变的就是人们对事物的看法和认识，但只要我们有追求真理的勇气，改变的梦想终将会实现。这个过程虽然略显漫长，但依然让人们在艰辛中看到了幸福的曙光、在贫穷中看到了富裕的未来。

在制度的呼吁下，中国人终于不再满足于“老婆、孩子、热炕头”，被贫穷激发的创富欲望开始喷薄而出。

►> 2. 第一代企业家的秘密：树挪死，人挪活

到 1984 年，改革的春风已经吹了 6 年，但农村的经济增长似乎陷入了停滞状态。土地的红利是有限的，尤其是那些单靠农作物为生的农民，联产承包的热情很快就燃烧殆尽，要想让他们进一步富裕下去，就必须开拓更多的致富门路。

贫穷会让人饥不择食，追求富裕同样会让人手足无措。在政策的刺激下，农民的致富欲望日益高涨。当土地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后，人们将目光越来越多地投向了副业，然后是小本买卖，最后是兴办工厂和企业。

已经年届古稀的任清海，闲下来的时候经常带着笑容眺望着远山。原本的万亩荒山，在他的努力下已经被栽满了核桃树。放眼望去，漫山葱翠。这位在当地小有名气的“富翁”，曾经因为孩子在冬天光脚丫没鞋子穿流过泪。改革开放前，即便他在村里任职，家里生活依然非常贫困。即便在三

九天，6个儿女都穿不上棉袄，有的还要光着脚丫上学。那时候，看着一家人跟着自己受罪，尚在壮年的任清海没少流过眼泪。为了让全家人过上好日子，他没少动过心思，但在那个靠挣工分吃饭的年代，除了壮劳力，别无他法。

然而，任清海不甘心就这么生活下去。作为一名村干部，他敏感地注意到了国家方针政策的变动。从那时候起，他开始寻找机会。很快他就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青海西宁生产一款农用车，售价仅2万元出头，而且可以半价提车。任清海当时兴奋起来。当时，当地农民经常需要雇车到城里拉煤，如果有一辆汽车的话，赚起钱来肯定很轻松。下定决心后，他借钱买回了汽车。此后，他带着一帮孩子整天在外奔波，为当地的农民拉煤和其他农用物资。农闲的时候，还会从外地买一些柴油到当地卖。然而，即便是这样的小本生意，任清海还是遭到了当地乡领导的警告。在大会上，乡领导多次点名批评他，也有很多熟人私下警告他。

喜欢看报纸的任清海很清楚当时的形势，全国各地每天都有因为经商、雇工等问题而被罚款、批判甚至被关进监狱的报道。广东高要县的一位农民承包鱼塘。由于经济效益不错，第二年的时候他雇了1个人，到第三年雇了5个人。然而，在现在看来再正常不过的小事，却引起了《人民日报》的关注，一位高层领导曾批示：我个人认为，按这个材料所说，就离开了社会主义制度，需要做出明确

规定予以制止和纠正并在全省通报。事关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局，故提请省委考虑。

很显然，像小岗村十八户农民那样的孤注一掷不是偶然的，任清海虽然忧心于政策的变动和个人安危，但更不愿看着自己的家人整天受着贫穷的折磨。面对可能面临的种种危险，他选择了义无反顾，坚持在致富的道路上勇往直前，最终有了今天的成就。

面对日益富裕起来的农民，城市居民的羡慕是显而易见的。不久后，改革的浪潮很快从农村蔓延向城市。

1979年1月，被誉为“改革开放第一人”的袁庚，在中央的指示下，率领招商局在深圳宝安县开发蛇口工业区，真正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随后，政府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之后不久，又将海南列为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窗口刚刚打开，中国将“亚洲四小龙”作为学习榜样，实行出口导向的经济政策，加快走出去的步伐。

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特区，是中国人心目中的神秘之地，象征着财富、欲望和机遇。活络的人开始向东南迁徙，更多的人则引颈探望，寻找茶余饭后的谈资，偶尔也会尝试改变一下生活节奏。在经济特区的刺激下，珠三角地区率先进入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不仅企业家们心向往之，全国各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也纷纷“赶场”，希望能

从中分一杯羹。

自诩“民间布衣”的博客写手王伟在《一个生于 1978 的小人物看改革开放 30 年》一文中真实描述了经济大环境的变动在普通人身上的反映：

彻底摆脱穷困进而过上富裕生活的欲望激励父亲作出了大胆决定，和少数农民走出乡村外出打工，由此开启了父亲 20 年的农民工生涯。起先是在铁路上，后来基本是在公路上，父亲成了筑路工。父亲在铁路打工时，我们家第一次吃到了绿色塑封包装的方便面，对于新型食品，我们连说明也没看，就一股脑儿把十几袋儿都倒到锅里像做家常面一样地煮了，不过味道却是前所未有的香甜。

【赶集】也有“赶山”之称，是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时代和地区普遍存在的一种贸易组织形式。所谓“集”，指的是集市，也就是人们从事贸易活动的固定场所。这里所说的集市，通常位于乡村，贸易的主体是农民，贸易的对象则主要是农副产品。集市有固定的时间，通常以农历的月为单位，有的集市是逢一、四、七开放，有的集市逢三、六、九开放。可能是一种巧合，很少见在二、五、八开放的集市。

30 多年过后的今天，现在一些乡村还保留着一些集市。这些集市都是改革开放之初兴建的，出生在 1970 年代以前的人应该有着当时的记忆。当时，平均两三个村就会有一处集市。为了错开时间，各个集市会按照“三六九”、“一四七”的日子错开。

王伟如此描写人们赶集的情形：每逢农历初三、初六、初九，乡间山路就充满了欢声笑语，人们都往一个方向走，因为这是乡镇上的赶集日……人们沿着街道摆开自己的摊位，牲畜、粮食、蔬菜、草药等都可以交易，场面非常热闹。

同样是从这时候起，中国第一代企业家开始相继登上舞台。被称为“中关村第一人”的陈春先，在仓库里创办了中关村第一家民营科技实体——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中国最会赚钱的农民”鲁冠球，创立了第一家上市的乡镇企业——万向集团；“企业承包第一人”马胜利承包了石家庄造纸厂，第一年便完成 140 万元利润。随后，还有更为有名的王石和万科集团、任正非和华为、柳传志和联想，以及发誓要做“中国 IBM”的史玉柱，一心想做电冰箱却创办了第一家生产轿车的民营企业的李书福等人。

第一代企业家有的成为改革的先驱，有的成为“摸石头过河”的“先烈”。然而，无论是先驱还是“先烈”，在政策尚未稳定的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都有过九死一生的遭遇。然而，受够了贫穷的人们，宁愿冒着坐牢的危险，也不愿缩手缩脚。当年，柳传志的一家三代人就住在自行车棚搭成的大约 12 平方米的风子里。房子四周是糊满报纸的墙，房顶上架着草席。但这已经让柳传志夫妇万分满意了，因为之前早已结婚的他们只能分居在男女宿舍里。

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个年代的人们甘冒失败的风险，也敢于无视政策的权威。当中国人从压抑太久的贫困生活中脱围后，没有人再愿意尝试那种物质匮乏、没有希望的生活。就像有关领导人所说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人们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高呼：我要富裕！

►► 3. 你流的汗，怎样变得更值钱？

当年 TCL 收购汤姆逊电视的时候，几乎引起了全球震惊。这家连杰克·韦尔奇都拯救不了的企业，TCL 凭什么有这么强的自信？事实上，不仅业界对此颇为疑惑，就连研究人员对此也大惑不解。

为了搞清楚原因，一位名叫亨利的美国大学生利用假期跑到中国，希望能通过实地查访获得真相。由于是一名普通的学生，亨利无法通过官方渠道进行调研，只能寄望于中国媒体和民间的消息。为了深入实际，亨利甚至连钱都没带，而是以打工的形式维持生存，并借此融入中国的社会生活。

虽然有语言方面的障碍，但并不影响活泼的亨利与周围的人打成一片。事实上，获得真相比亨利想象得要简单得多，当他拿到第一个月工资的时候，已经非常接近真相了。亨利拿到手的第一个月工资是 1500 元。按理说，作

为一个尚未毕业的大学生,而且做的是临时工,这样的工资在2003年的中国还是不错的。但是,来自美国的亨利可不这么认为。2003年的美国,每小时最低工资已经超过5美元,按当时的汇率折算,也就是超过40元人民币。1500元的工资,其实也就相当于30多个小时的收入。亨利每天工作8小时,当然还有必不可少的加班。原本应该是4天的工资收入,现在却要花费自己一个月时间,这让亨利很恼火。他一度兴起起诉雇主的念头,但随即意识到自己可能找到了要寻找的答案,不由得兴奋起来。

很显然,亨利的确发现了真相,虽然这不是全部。

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取得长期高速的发展,缘于人口、土地和外贸三大红利,劳动力红利正是其中之一。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一直远大于需求,导致劳动力成本极低。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在中国市场面对进口产品或者当中国产品出口到国外市场时,就会占有极高的低成本优势。中国的轻工产品、纺织品之所以能行销全球,甚至成为各国反倾销的对象,便是源于这种比较优势。

三大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大有小,人口数量优势带来的劳动力红利最为显著。从2000年至今的人口调查中,15岁至64岁的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一直在70%以上,而且保持持续上升的势头。调查显示,这

【劳动力红利】

也叫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重较大,从而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这种条件下,这个国家的经济将呈现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良好局面。很多经济学家认为,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长的重要极原因。

一趋势将一直持续到 2020 年。即便这一比例有所下降，相比于大部分国家来说，中国依然可以享受高劳动力参与率带来的丰厚红利。

仅有大量的劳动力并不意味着经济的高效，仅作为世界加工工厂，也无法推动中国产业的升级换代。事实上，劳动力红利的维持，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持续上升的劳动力配置效率。众所周知，中国有着众多的农业人口，相比较而言，中国的土地资源并不充足，农业发展程度也不够高。在这种条件下，中国的农村劳动力明显过剩，劳动生产率也极为低下。但正因为如此，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农村劳动力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转移，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劳动力的配置效率。甚至可以说，中国收获劳动力红利的程度，就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由潜在劳动力转化成现实生产力的程度，更简单点说，就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程度。幸运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我国城市化进程基本同步，保证了这一趋势的延续和有效。

在劳动力的高参与率和劳动力配置效率提升的基础上，由此衍生出来的高储蓄率，同样贡献了劳动力红利。与适龄劳动力的高比例相应，需要抚养儿童和赡养的老人的比例相对较低。也就是说，我国人均劳动力的负担就比较轻，从而为居民储蓄提供了条件。在关于经济增长的各种模型中，居民储蓄都是重要的贡献因素。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劳动力红利就成了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从中国企业最典型的两则国际并购案例中,能够看出这种劳动力红利的影响。TCL 并购汤姆逊电视,并不是因为 TCL 的赢利能力比对方强,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 TCL 拥有低成本优势。根据调研机构的研究, TCL 在并购汤姆逊的时候,其彩电业务的毛利水平极低,在国内毛利率是 5.2%,在海外只有 2.9%。即便这样的毛利水平,还是得益于国内的低劳动力成本,如果放在海外,几乎没有赢利的可能。同样,作为国际并购的另一个典型,联想并购 IBM PC 的时候,其毛利率只不过是 14%,而 IBM 的毛利率高达 22%。然而,联想 PC 能够赢利,而 IBM PC 业务却承担着巨额亏本,这在很大程度上同样得益于中国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

这种近似于“坐地分赃”式的竞争优势,让跨国巨头们颇感无奈,甚至连欧美等国也只能望洋兴叹。在实在没招的时候,反倾销就会成为它们最后的撒手锏。

据媒体报道,巴西外贸委员会于 2011 年 9 月 6 日宣布,为了保护本国工业,将采取一系列措施限制商品进口。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要对 7 种制成品提高进口关税,并对一批进口产品实施反倾销制裁。这一报道之所以引起中国方面的关注,是因为在提高关税的 7 种产品中,有 5 种来自中国。其中,瓷砖的关税将从 15%提升到 35%,自行车的关税从 20%提升到 35%,而分体式空调同

样从 18%提升至 35%。因此，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是这些措施的最大受害者。

据说，巴西还将对来自中国的碳钢管实施反倾销制裁。在未来两年内，巴西将对从中国进口的碳钢管征收 743 美元/吨的惩罚性关税。制裁一旦开始，碳钢管的价格将比目前提高 80%，基本堵死了中国碳钢管向巴西的出口。

其实，每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会经历劳动力红利这个阶段，只不过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让这个阶段看似无限期地延长了。

然而，当我们安享劳动力红利的时候，不应该对劳动力红利可能的减少和由此而来的负面效应视而不见。由于对劳动力红利的依赖，中国企业更多地倾向于投资资源密集型产业，对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业兴趣不大，从而让中国逐渐成了全球资源配置中的加工工厂。这也是有识之士建议中国应该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原因。

更让人们不安的是，近年来出现了一些不利的迹象，让我们不得不怀疑这种近乎不劳而获的红利优势是不是走到了尽头。

2011 年年初，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出现大规模的民工荒，很多制造类企业因为招不到人而倒闭，还有一些则靠

高工资得以维持。当时,极富人气的富士康就在其内刊《富士康人》的头版头条上如此渲染:“春寒料峭,大江南北用工荒;风景独好,人潮汹涌富士康。”这个曾因员工十儿人连跳事件而震惊中国的企业,并没有因此成为被民工遗忘的角落,在富士康的招聘点上,依然人流汹涌,“长蛇”蜿蜒。富士康如今受民工青睐的背后,是它比大部分中小企业要高出 50%甚至一倍的工资。

去年,有感于民工荒的说法引起的慌乱,商务部部长陈德铭曾专门予以驳斥,中国劳动力“红利期”远远没有过去,供大于求状况没有改变。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原本在春节过后的特殊时期,也很少有企业因为缺工而着急,但现在在正常的季节,依然有大量的企业为此苦恼不堪。

有一个不易被人察觉的现象变动能说明民工荒并非杜撰:因为企业招人越来越难,一些原本靠赚打工者门票费的人才市场,现在正在逐渐降低面向打工者的门票价格,有的干脆直接取消,转而向企业索求更高的入场费。深圳三和人才市场总经理许琴就表示,以前人才市场主要靠打工者赚钱,从 2009 年之后就倒了过来,开始提升对企业的收费标准。比如,对于求职者来说,以前人才市场的门票是 10 元,现在 10 元门票有效使用期为一个星期,有时候甚至可以免费入场。

当然，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整体状况并没有改变，而且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但是，由于地区分布、行业分布的不均，以及薪酬福利的差异，很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难免会遭遇民工荒的困扰。面对这种现状，不仅企业要提前做好准备，政府更要尽早将这个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否则，7%以上的 GDP 增长速度将很难延续下去。

►> 4. 全球化了, 就该去买外国货?

不经意间, 国际品牌已经充斥了我们的生活。即便普通的中产阶级, 用的电脑大部分是戴尔、惠普品牌, 手机则多为诺基亚、摩托罗拉、索爱品牌, 电视是松下和索尼品牌, 冰箱是西门子和三星品牌, 洗衣机是伊莱克斯和惠而浦品牌, 空调是三菱和日立品牌。于是下面这样看似夸张的描述不再是梦幻, 而成了现实。

早晨, 揉着惺忪的眼睛, 掀开身上的嘉加梦 (意大利品牌被子), 从床上坐起来, 顺手脱下身上的凯伦堡 (意大利品牌睡衣)。洗漱完毕, 拿起诺基亚手机, 打麦当劳热线, 要了一份麦乐送, 解决了早餐。该到上班时间了, 套上博柏利 (英国品牌西装), 走出了家门。天气不错, 回头看了眼欧式别墅, 满意地登上 BMW M6 (德国品牌汽车) 双门轿跑车。在去公司的路上, 给女朋友打了个电话, 约好晚上去柯达电影世界 (首家外资控股影院) 看刚

上映的《女巫季节》（美国电影）。

全球化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通过优势资源的整合，各个国家都能参与国际化分工，从而形成优势互补，分享全球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利益。对消费者来说，国外消费品也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当初，中国加入 WTO 的前夕，人们普遍对“入世”充满热情，就是因为很多人非常憧憬拥有国外的商品。

经济学家韩德强在书中写道：“在机关大楼的办公室里，在超级市场的柜台前，在朋友们的聊天问候中，消息灵通的人士都在发布美国小汽车、计算机、电话费的行情，把听众们的心挠得痒痒的，恨不得中国第二天就‘入世’。你想，一辆中高档的皇冠车在美国只售 8000 美元~9000 美元，合人民币不过 6 万元~7 万元，只相当于买一辆昌河或奥拓的钱，多划算啊！还有计算机，200 美元就够买一台 586；电话根本不要初装费，打电话很便宜，还不断有别的电话公司用更优惠的价格来吸引你。‘跳槽’，多好啊！要是出国，千万别买国航的机票，太贵，找个朋友在国外买好机票寄回来，就能省出一台电视机。”

“入世”的成功，加速了中国国际化和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以全球化最大的主体——企业来说，既能通过国际化进行全球资源配置，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又能通过发挥比较优势，获得高额利润。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企业之间的竞争以更为综合的形式呈现出来,企业面临的是从日常运营到市场拓展、再到全球化适应能力等全方位的竞争态势,而不再像以往那样纠缠于价值链的某一个环节的较量。在这种竞争态势下,企业在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或存在弱点都是致命的,都会成为缺乏竞争力的根源。

事实上,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源全球化是企业唯一的选择,如果无法做到这一点,就只能被动挨打,被排斥在国际市场之外。很多反对中国加入 WTO 和参与全球化进程的人认为,中国广阔的市场空间足以满足自己的需求。但事实却是,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很多传统产品市场已经趋向饱和,从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出现了生产过剩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国不能顺应潮流,继续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改造,并合理引入和转移资源,就会成为全球化的牺牲品,最起码是浪费全球化带来的发展良机。

很多跨国企业将工厂办到中国,并不是希望将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带到中国,而是希望利用中国丰富的廉价劳动力来降低生产成本。正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这些跨国巨头将中国的优势资源——劳动力资源和其他国家的优势资源(诸如能源、运输、市场、金融和税收体系等)汇集起来,尽力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一直提倡以市场换技术,希望向跨国巨头开放中国市场,

借以获得学习对方先进技术的机会。尽管“中国制造”一直遭到不少外国人诟病，但还是为中国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为中国经济参与全球化奠定了基础。

同时，全球化也是企业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通过资源转移参与国际化分工、最终获得超额利润的有效途径。对于企业来说，全球化既可以有机会获得国外的优势资源，又可以通过资源的国际转移，以国内的优势资源参加国家分工，通过比较优势获得比国内更高的利润。众所周知，一项技术从诞生到普及，其利润必然会经历从垄断利润到超额利润、再到平均利润的阶段和过程。事实上，任何一个产业发展的过程，同样遵从这样的逻辑。随着生产、技术、管理等要素的慢慢普及，产业发展初期的垄断利润会变为超额利润，随后在进入自由竞争阶段后，慢慢发展成为平均利润。简而言之，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更多的企业掌握相同的技术，或者推出类似的产品，产业的利润都会逐渐摊薄。然而，得益于经济全球化，企业可以通过向全球转移国际资源，从而延长获得超额利润的时间。

比如说作为中国传统优势产业的纺织业，在国内市场早就进入饱和状态，市场供大于求的状况十分明显。纺织业要想继续发展和获取利润，只能寄希望于出口贸易或资源转移。数据显示，2001年中国入世后，纺织业开拓国际市场的步伐大幅加快，出口额一路飙升。以2003年为例，

我国纺织业出口净创汇高达 645 亿美元，是全国净创汇 255 亿美元的 2.53 倍。如果没有出口的话，中国纺织业就会失去了继续增长的空间，如果不能在产业升级上作出努力的话，就只能走下坡路了。

毋庸讳言，包括纺织品在内，中国的轻工业品和部分农产品之所以能畅销全球，主要得益于中国廉价的劳动力成本优势。甚至在部分高科技制造领域，中国都能凭借这种优势参与国际分工，赢得相对于跨国企业的比较优势。早在 2006 年的时候，韩国贸易协会贸易研究所就曾发布《韩中日三国的国际市场主导产品技术水平之变化》的报告书，该报告书根据联合国 2000~2004 年的统计数字，研究得出结论，认为中国正在逐步包揽韩中日出口优势产品。很显然，中国正是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将国内的比较优势通过资源转移体现在了国际市场。

当然，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发展的影响，绝不仅仅在于有利于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分工，还在于能够推动中国市场化进程的进程，有利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等。

中国申请加入 WTO 的时间很漫长，尤其是在 1993 年之前，在长达 6 年的时间里，中国和世贸成员国的谈判几乎毫无进展。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因为加入 WTO 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成员国要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只有这样才能与其他国家开展国际贸易。我国在 1992 年提出“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应该说是中国经济体制发展的必然结果，但之所以在当时提出，是为了配合加入 WTO 的谈到并取得进展。从这个层面来说，正是加入 WTO 的需要让我国加快了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步伐，并在全球化过程中不断完善这一体制。

幸或不幸，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与新一波经济全球化历程相契合，有效而全面地推动了中国的成长。通过参与全球化历程，我国提高了国际地位，扩大了国际影响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都获得了长足发展，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 and 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然而，在欣喜地看到全球化有利一面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带来的不利影响和威胁。其中，尤以部分幼稚民族工业为甚。

以汽车工业为例，2010 年中国几大汽车集团中，上海集团的合资产品占全部产品的 91.37%，一汽集团的合资产品占全部产品的 59.53%，东风集团的合资产品占全部产品的 49.01%。在中国汽车市场日益火暴的今天，中国的汽车工业并没有像表面看起来那么风光。数据显示，2011 年上半年我国自主品牌乘用车销量增速低于整体市场平均增速。其间，乘用车自主品牌销量为 315.6 万辆，同比下降了 0.82%。

事实表明,无论是市场换技术还是股权换技术,都没有真正从跨国企业手中换来先进的技术,中国民族工业依旧在下游奋力地挣扎。著名的汽车评论员杨再舜甚至发出“中国商用车应该放弃民族汽车工业”这样的质疑。

退出 WTO,或者说不参加国际分工,这样的言论当然过激。无论如何,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分享的红利还是显而易见的,只要我们能妥善地保护好我国仍显幼稚的部分重要民族工业,对外开放依然是我们坚定的选择。

►► 5. 金融危机，为何唯中国优雅从容？

雷曼兄弟公司是为全球政府、机构、公司和投资者提供金融服务的一家多元化投资银行，是美国的四大投行之一。自 1850 年创立以来，迄今已有 160 年的历史。它是《商业周刊》评出的 2000 年最佳投行；2001 年，被收入标准普尔 100 指数；2002 年，被《国际融资评论》授予“年度最佳投行”称号。就是这样一家历史悠久、信誉卓著的美国投行，于 2008 年 9 月 15 日宣布申请破产保护。

这个案例在政界、经济界和学术界影响极大，但对普通的中国百姓来说，有可能并不以为意。那么，下面一个故事，则值得引起关注了。

一位极善言谈的朋友，经常在 QQ 群聊中给大家制造欢乐，很多人将他视为知己。不久之后，他成为一家企业的副总，已经鲜少在群里出现。又过了两年，也就是 2008 年，他再次在群里活跃的时候，我们都感到很奇怪。以他

的能力和经验的,似乎不会被无端炒鱿鱼。

经过问询,才知道他所在的外贸企业陷入低谷,人员极其过剩。至于原因,他也有点儿茫然,不知为什么,突然间生意就不好做了。

后来我们都知道了“罪魁祸首”原来是发轫于美国的金融危机。雷曼兄弟死于美国的次贷危机,美国金融危机发轫于次贷危机,而全球金融危机又发轫于美国金融危机,就是这样一个因果链条。

危机来袭,伤害的不仅仅是经济,也摧毁了人们生活的信心。美国一向是全球经济的支柱,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将美元作为最坚挺的外汇储备。然而,2008年的华尔街,人们面对的无奈现实却是:假设去年你有1000美元的现金,如果买了雷曼兄弟的股票,现在你已一无所有;如果你买了AIG的股票,现在你只剩下33美元;然而,如果你只是碰巧全部买成了啤酒,那么喝完后你至少可以依靠卖易拉罐赚回214美元。

金融危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美国和欧盟的金融体系都岌岌可危,美国除了“两房”和美国国际集团被政府接管之外,五大银行基本上全部垮掉,其他商业银行也都陷入困境。至于股票市场的动荡、各国货币的贬值和外资出逃等现象,更是在意料之中。实体经济同样难逃厄运,世界银行同期发布的全球报告显示,2008年全球经济增长率

【美国“两房”】

即房利美(Fannie Mae)与房地美(Freddie Mac),是两个带有政府性质的联邦住房贷款抵押融资公司,当初是美国政府为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而组织的两个住房贷款公司。一开始是国有的,后来变成私有的了,但享受很多优惠的政策。“两房”是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支柱,两家机构承保或者购买的房地产贷款约占美国居民房地产市场的50%,次贷危机以来达到80%以上。

只能达到 3.9%，比上一年度整整低了 1 个百分点。美国、欧盟和日本三大经济体全部进入衰退；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虽然远离西方经济中心，但也难逃影响。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中国经济增长率也从上一年度的 11.9% 下降到 9.4%，而印度、俄罗斯等国经济增长率也分别下降了 1~2 个百分点。

危机来袭，“救市”是所有国家的共识。财大气粗的美国，在 2008 年 10 月 1 日的国会会议上通过了全年投入 8500 亿美元的金融救援方案；英国也不甘落后，推出了高达千亿英镑的金融救援计划，并于次年决定在二级市场上收购中长期英国国债；德国政府通过“金融市场稳定方案”，为银行提供 4000 亿欧元的债务担保，建立了 800 亿欧元的特别基金。法国、日本也纷纷出台了金融援助和振兴市场计划，试图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率先从金融危机中突围。

然而，这些看似宏大的抱负却不堪一击，在危机漩涡中如同随波翻卷的浪花，难以形成强劲的逆流。

在这场汹涌的金融浪潮中，中国虽然也受到了影响，但金融体系依然固若金汤，经济发展势头依然保持强劲。国际社会突然发现，全球危机中似乎还有一座安全的孤岛，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落到了中国身上。

在《未触底的中国经济》一书中，作者如此写道：“1944 年，凯恩斯提出超主权货币时，响应者寥寥，认为

这是一个不能实现的货币理想国。2009年,当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时,全世界都刮目相看。”

如果周小川的这一提议是在2008年之前,相信没有几个国家会赞同;但经历了金融危机后,人们认识到美国经济和金融体系的脆弱,也感受到了中国经济的实力和稳固,观念也发生了转变。事实上,正是中国在全球经济危机中表现出来的从容和张力,让国际社会认识到崛起的不仅是中国的经济,更是全方位的发展中的大国。

2009年两会前夕,温家宝总理在线回答网友的提问时谈到了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举措。温家宝表示,中国为了应对金融危机,从2008年6月份开始采取措施,至两会前夕,形成了“一揽子计划”。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大规模的政府投入和结构性的减税,以扩大内需;

第二,大范围内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涉及十大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行业;

第三,大力度的科技支撑。我们准备在两年加快推进科技专项规划,投入1000亿,为经济发展提供支撑和后劲;

第四,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单就大家关心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我们计划在三年内要投入8500亿。

在整个危机过程中,中国政府显示了强大的自制力、适应力和果断决策的能力。随着危机影响的加深,中国政府及时调整了宏观经济政策,从年初的“双防”(防过热、防通胀)调整为“一保一控”(保增长、控通胀)。

2008年年底的时候，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确定将宏观调控方向明确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正如温家宝总理在讲话中所说的，中国政府的应对措施“要狠，要准，要实”。事实也是如此：4万亿的投资计划，够狠；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放松的货币政策，够准；扩大内需、稳定币值、增加美元储备，够实。

谈及中国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国际社会普遍给予了赞誉。美国财长保尔森就对中国采取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赞不绝口，认为中国扩大内需的做法，为解决全球产能过剩问题作出了卓越贡献；为了稳定周边经济、尤其是亚洲经济，中国不仅没有限制进口，反而扩大了进口规模，有效地维持了亚洲和周边国家的经济稳定；在美国经济最为脆弱的时候，中国不仅没有落井下石，反而增加了对美国国债的持有量，超过日本成为美国的第一大国债持有国。这一举措有效地稳定了金融市场和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

更让世界惊羡的是，中国在为世界经济做贡献的同时，自身的发展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9.0%；2009年，依然保持了8.7%的增长率。按照经济增长的正常递减规律，这样的增速应该是正常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微乎其微。

与欧美国家疲于应付危机的窘况相比，中国在金融危机中显得优雅从容、张弛有度。

►► 6. 高速增长，神话进行时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年均近 10% 的增长率。这一绝高的增长率，在欧美发达国家超低增长率的映衬下，美得令人炫目。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相比于国外的负增长率，中国 9.0% 和 8.7% 的增长率，让国际经济学家惊叹不已。按照他们的理论逻辑，这已经超越了经济学所能解释的范畴。然而，30 多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发展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时认为，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主要成就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就是经济总量的高速增长，也就是前面提到的 GDP 增长。30 多年来，我国 GDP 增长了近 20 倍，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出口总额增长更快，世界排名从原先的第二十三位跃升至第二位。更让人欣慰的是，中国不仅经济保持高速增长，而且也是世界公认的维护全球稳定的重要力量。第二就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改革开放前，从“大跃进”

到“文革”结束的20年间，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没有任何提高，甚至偶尔还倒退。相比而言，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43元提高到如今的19109元；1978年的时候，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仅为134元，2010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已经达到5919元。第三，贫困人口数量得到了有效降低。30多年来，农村无保障贫困人口减少了2亿多人。世界银行2003年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自1990~2002年的12年间，中国完成了世界减贫人口的90%计划，这是令世界刮目相看的成就。

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实现如此高速的增长？制度创新无疑是一大主要原因。除此之外，很多经济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源于“华盛顿共识”。所谓“华盛顿共识”，其实是世界银行、IMF和经济学家们给贫困国家开出的药方，也就是帮助贫困国家发展的主要措施。这一概念最初由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提出，但其内容则集中了以上各方和美国政府的智慧。“华盛顿共识”分为四个部分，主要包括10个方面的内容。

一、财政政策

1. 加强财政纪律，控制政府财政赤字；

2. 财政支出集中于经济回报高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和基础设施的公共支出；

3. 改革税收,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

二、货币政策

4. 利率自由化,力争利率为正,以鼓励储蓄;

5. 采用具有竞争性的汇率制度;

三、贸易和资金政策

6. 实施贸易自由化,取消对进口的量化限制;

7. 实行资本准入制度,允许外国直接投资;

四、宏观产业政策

8. 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

9. 放松政府管制,消除市场准入和退出的障碍;

10. 保护产权。

研究表明,中国采取的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有很多和“华盛顿共识”不谋而合。但大多数人认为,“华盛顿共识”虽然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已不再具备当初提出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也不适用于当今的经济形势。之后不久,美国《时代》周刊的高级编辑、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的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在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调查论文,提出了“北京共识”。他认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了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

渣打银行中国研究部主管王志浩(Stephen Green)曾

梳理过中国在经济发展中采取过的措施，或许可以看作是
其对“北京共识”的认识。内容如下：

严格财政纪律，运行温和的财政赤字，控制公共支出
规模；

20 世纪 90 年代将教育和基础医疗方面的支出压缩到
很低的水平，但从 2000 年以后又开始增加对这些领域的
财政投入，减少对国企的补贴；

1994 年税制改革以来税基得以扩大，边际税率适中；

贷款利率仍由央行确定，同时给商业银行一定的灵活
性。储蓄受到鼓励，尽管实际存款利率经常为负数；避免
了犯下货币过度估值的错误；

中国开放贸易。朱镕基任内下调关税，对于中国经济
产生了积极作用，迫使国内企业与进口竞争；

大力吸引制造业外商投资；

取消部分商业限制措施，但在一些行业的市场准入方
面仍严格限制；

在保护私人财产权方面采取了一些动作。

比较“北京共识”和“华盛顿共识”，在一些基本经
济政策方面，的确存在不少近似的地方，但整体而言，中
国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较严，这应该是中国经济体整体波动

较小的原因所在。

经济高速增长的事实无可否认，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同样值得肯定。但无论现实多么美好，总有一些声音让你不得不关注。

在主题为“中国改革三十年：评价与展望”的第十届光华新年论坛上，吴敬琏选择以“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怎样才能持续”为题进行了演讲。这一主题的背景是：中国经济面临困境，很多国内外专家学者在看衰中国下一轮的经济发展速度。

知名的中国经济及政治研究专家大卫·罗奇认为，在全球信贷危机期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一枝独秀，依赖于基础设施的高投入，据估算，去年中国经济增长有九成来源于此。果真如此，中国经济增长对投资拉动的依赖就太过严重了。

经济学家韩志国认为，近年来宏观调控政策的波动，已经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造成了伤害，而随着人口、土地和外贸三大原始驱动力的削弱，如果不能及时解决面临的问题，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发展将会被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普通的评论人士和研究人员对中国经济增长更是心怀犹疑，诘问从表面来看更显犀利。财经评论员叶檀的力作《拿什么拯救中国经济？》、艾学蛟等著的《未触底的中国

经济》，都对中国经济发出了质疑。

国外不看好中国经济的专家学者，对中国经济能否继续保持目前的增长率，不屑于置之肯否；而在国内，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普通百姓，面对瞬息万变的世界形势，也很少有人敢于断言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总体上看来，国人的评价是比较客观的，中国经济经过 30 多年的高速增长后，经济机体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癣疮小病，甚至沉疴恶疾。但经过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两次考验，中国即便不是世界上最坚固的经济体，也应是世界经济百花园中几朵奇葩之一了。以这样出色的表现，指责中国经济积重难返是不客观的。

外国的部分学者还是比较看好中国经济在可预见的数年内将保持高速增长的趋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莫里斯，在“上海论坛 2011”年会上分析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呈现的是资本投入与 GDP 产出同步增加的状况，而没有出现资本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减效应。世界经济放缓、外贸出口下降，对中国 GDP 增长的影响可能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就此而言，中国经济依然前进在良性发展的轨道上，而没有出现严重的脱轨迹象。

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曾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将在 2016 年达到 19 万亿，那时候美国的经济总量将达 18.9 万亿。

高盛公司在 2003 年的时候曾将 2041 年预言为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经济总量的年份，后来又调整为 2027 年。

还有部分经济学家以中美两国经济增长率的走势为参考，预计未来 10 年中国经济将保持 7.5% 的增长率，而美国经济增长率为 2.5% 左右。据此，将 2019 年看做是中国经济超过美国经济的年份。

这些预测都是基于相对客观的数据得出的，而没有掺入个人情感，因此更具有参考价值。虽然这些预测在时间上出现分歧，但无论以哪个时点作为标准，中国经济今后数年的平均增长率，应该不会低于 7%。这样的速度，相比于欧美发达国家，依然属于高速增长的行列。

当然，预测都是基于历史增速、经济现状和国家现有的经济政策得出的，中国在可预见的数年时间内，会不会沿用现有的经济政策，还是个未知数。那么在经济政策平稳的条件下，中国经济如何保持相对高速的增长呢？答案有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条还是扩大内需。众所周知，消费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短板，相比于国外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 70% 多的贡献率，我国相应 40% 多的贡献率显然太低了。但正因为如此，才让中国经济有了高速增长的空间。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丹尼尔·麦克法登表示：为了保持高速增长，中国必须使内需高速增长。为此，他提出了三条建议：提高贫困人口收入，缩小收入差距；实

行新汇率政策，让消费者能买到廉价进口商品；通过审慎监管和透明运营，减少金融风险。他还为中国经济寻找新的引擎作出了努力，认为“一套能减少个人风险和私人储蓄并促进内需的、全面的全国性社保和医保方案”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有了中国相对稳定的政治格局为保障，原本就颇为稳健的中国经济发展应该不会出现太大的波动。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可见的数年内，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第三章

企业江湖,你该投靠 哪路阵营?

●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企业犹如国家的旗帜,人们通过观察企业来了解国家,以企业的实力来衡量国家的实力。正因为如此,《财富》世界 500 强那样的榜单才有了标志性的意义。

在 2011 年的世界 500 强企业榜单中,中国大陆企业的数量创历史地达到了 61 家。然而,这些企业依然以国有企业、垄断型、资源型企业为主,民营企业仅有华为、联想两家,国企和民企的发展依然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同时,外资经济的崛起,不仅挤占了民族企业的生存空间,而且还肆无忌惮地控制了某些事关民生的产业。对此很多人在就业选择上彷徨了:该投靠哪路阵营?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 1. 国企不再“兵强马壮”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国有企业先后经历了扭亏脱困、重组改制等艰难历程，国有经济也采取了有进有退的战略性调整，将国有资本逐步转向了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行业和领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自 2003 年以来，央企的数量已经从当时的 196 家压缩到 122 家，在数量减少的同时资产总额却翻了两番，竞争力有了明显提升。然而，从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国企与外资企业及民营企业运营效率对比、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来看，国有企业依然是改革中较为薄弱的一环。很大一部分专家学者认为，国企问题的症结在于垄断。

2011 年 7 月 23 日晚 20 点 30 分左右，甬温线永嘉站至温州南站间，北京南至福州 D301 次列车与杭州至福州南 D3115 次列车发生追尾事故。截至 7 月 29 日，事故已造成 40 人死亡，200 多人受伤。温家宝总理亲赴事故现场

查看并召开了中外记者见面会。

事故发生后，举国哀悼。当初步调查结果公布后，很多人的情绪由悲哀转向愤怒，再次掀起对国企垄断的质疑。

调查初步结果显示，事故发生与相关道路安全设施产品质量问题有关。上海铁路局局长安路生表示，根据初步掌握的情况分析，这起事故主要是由于温州南站信号设备在设计上存在严重缺陷，遭雷击发生故障后，导致本应显示为红灯的信号显示为绿灯。据说，信号设备是由北京全路通信信号研究设计院设计。这家设计院是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全资企业，而后者是由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作为主要发起人发起设立的。而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是国资委直接监管的大型中央企业。

多方信息表明，涉及高铁产业链的各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专家认为，这起事件背后所反映的，是国企内部政企不分、产权不明，对产业链形成垄断并在小范围内分配利益，产业链上最终导致部分负责人责任感缺失的普遍现实。

国企改革实施了30余年，前期一直以市场化为目标，不断削弱垄断性，正因为此，社会上才出现了“国退民进”的说法。然而，近几年来，国企改革出现了一种矛盾格局，一方面是国企整体数量的减少，另一方面是部分国

企的规模越来越大，垄断的特征日益明显。于是乎，“国进民退”成了新的舆论潮流。

在某种程度上，国有企业的垄断是国企改革造成的。国家在约束国有企业数量的同时，对国有经济的规模也提出了要求。这种略显矛盾的要求，让有关部门一边努力削减国有企业的数量，另一边又不断扩大原有大型国企的规模，导致很多国企成了行业的巨无霸，形成了事实上的垄断。国企改革的目的并不是控制数量，但由于政策和业绩考核指标上的矛盾，让目的发生了异变，导致部分国企尤其是央企的规模越来越大。

然而，即便今天，也并不是所有的政策制定者都充分认识到了垄断的弊端，还有一部分人在鼓吹垄断带来的好处。原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就对央企垄断颇为赞成，在2010年夏季的达沃斯论坛上表示：“某些行业出现垄断是正常的……如果没有‘三桶油’，中国经济早乱了……2008年油价高涨时，‘三桶油’承担了高达1680亿的巨额亏损，以维持国内市场的稳定。”

李荣融或许没想到，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这“三桶油”承受的巨额亏损，其实是由政府和全体人民承受的，因为它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当然，在相当一部分人眼中，国有企业就是本企业员工甚至高层管理者的企业，和全民根本没有关系。否则的话，当上市国企的市值蒸发掉90%后，股民怎么会全都欲哭无泪，这些企业的高管们怎

么能安心地拿着高额分红呢？

在完全国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垄断造成了国有企业的低效，进而导致了中国经济长期停滞不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进行分析，2003 年到 2008 年，在一定规模条件下，国有企业资产总额、主营收入和利润总额分别增长了 2 倍、2.5 倍和 2.4 倍。与此同时，私营企业的相应增长数据分别为 5.2 倍、6.7 倍和 9.7 倍，外资企业的增长速度也快于国有企业，与前两者对应的相关增长数据分别为 2.9 倍、3.4 倍和 3 倍。从中能够看出，私营企业在三类企业中的发展速度最快，外资企业次之，而国有企业则是最慢的。国有企业以保值增值为目标，但原本最为国有企业看好的增值速度，也远低于私营企业。

众所周知，最近几年资产价格一直处于膨胀期，在同等条件下，谁能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谁就能利用财务杠杆作用实现更快的资产增值。在我国，国有企业在银行贷款方面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在必要的时候还能得到政府财政的支持，按理说国有企业应该是发展最快的。然而，让人不解的是，国有企业虽然获得了大量的贷款，但资产增值的速度却远远落在了私营企业后面。

国有企业的运营效率之所以如此低下，就是因为长期垄断的情况下，缺乏很强的市场竞争力。中国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逐步放松对非国有企业的市场准入限制，从而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自

市场化改革以来,民营企业、三资企业和乡镇企业全都获得了快速发展的机会,而国有企业则是节节败退,成了它们的陪衬。正是忧心于国有企业的低效,国家才希望通过改革激活国有企业,从而推动中国经济的新一轮增长。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当前改革正进入攻坚时期,作为改革重点的国有企业不仅没有加速市场化进程,反而走上了回头路,试图在行政垄断的窠臼中寻求安全感和庇护。

根据《2010 中国民营企业 500 家分析报告》,500 家民营企业的净利总和为 2179.52 亿元,而中国移动有限公司净利 1151.66 亿元,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净利 1033.87 亿元,两家合并赢利 2185.53 亿元。这就是说,两家国企的赢利规模已经超过了排名靠前的 500 家民营企业赢利的总和。国有企业如此庞大的规模和资本实力,让民营企业如何与之竞争?

垄断会遏制竞争。充分竞争有利于增强消费者的话语权,有效地促进企业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竞争同样对企业群体有效,能够刺激企业管理效率、生产效率,从而提升整个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中,只有效率高的企业才能获得发展,维持生存,实践优胜劣汰的市场法则。而当垄断盛行时,市场法则就会失灵,企业就会失去发展的动力,各种问题也会层出不穷。

2009 年至今，中国移动有限公司已有 8 名高管因涉嫌贪污受贿落马。第一个落马的是原中国移动公司党组书记、副总裁张春江，后被“双开”。2010 年年初，中国移动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施万中涉嫌收受西门子公司 500 万美元贿赂。2010 年 4 月，湖北移动公司原副总经理林东华又涉嫌巨额贪污。中国无线音乐运营中心总经理李向东携款外逃被捕，四川移动公司总经理李华涉嫌受贿 20 个亿……今年，这一名单还在不断延长，5 月份发生的中国移动公司数据部副总马力窝案，涉案人数超过 60 人。

数据显示，1998~2005 年，国有企业赢利 4.7 万亿，亏损 1.8 万亿，利润总额为 2.9 万亿。在此期间，国家财政向国有企业转移、补贴等各种费用 1 万亿元，国有企业利用廉价资金导致市场配置负效率，损失 1.6 万亿元，财政部核销损失 0.75 万亿元。考虑到国有企业的各种隐性成本，最终算下来，不仅没有赢利，反而是亏损的状态。国有企业高成本、低效率可见一斑。

2009 年，央企拿下全年 90 多个地王中的 60 个；2010 年 3 月 15 日，热议房价的两会刚刚结束，两家央企又拿下两块地王；5 月 20 日和 21 日，中铁建分别以 14.6 亿元、16.7 亿元拿下北京和成都两宗优质地皮；6 月 29 日，中铁建又在广州溢价 135% 购入两块地皮，随后又在天津市花费 40 多亿拿下 3 块地皮。在此背景下，媒体惊呼房

地产也快被央企垄断了。

从产品质量问题到贪污受贿丑闻,从低成本、高效率运营到扩大垄断规模,国有企业不仅没有在改革中剔除垄断基因、增强市场竞争力,反而因为垄断性的增强,在降低竞争力的同时,暴露出一系列的负面问题。

垄断犹如古代遗老遗少的袍服,外表光鲜,内里实则破烂不堪。要想真正让国有企业成为国家经济的栋梁,就必须狠下心来打破行政垄断,让国企在市场上与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公平竞争。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增强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否则的话,国有企业即便在国内赢得了垄断优势,一旦走向国外,还是会在全球竞争中不堪一击。

就此而言,国企改革依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只有进一步加大国企改革的力度,才能打破国企当前面临的困局。

【抓大放小】

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对国有企业实行“抓大放小”的改革战略。

主要内容是：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通过存量资产的流动和重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这种改组要以市场和产业政策为导向，搞好大的，放活小的，把优化国有资产分布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同优化投资结构有机地结合起来，择优扶强，优胜劣汰，形成兼并破产、减员增效机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重点抓好一批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以资本为纽带，联结和带动一批企业的改组和发展，形成规模经济，充分发挥它们在国民经济中的骨干作用。

►► 2. 小心国企改革变成“一卖了之”

经过近30多年的努力，国企改革依然是横亘在我国经济改革道路上的一座大山，能否翻越它，是改革能否继续深入的关键。

现实表明，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依然很多。比如说过于注重量的扩大，导致主业实力不突出。这是我国经济领域存在的普遍问题，就像对待GDP一样，太过注重“保八”、“保七”，而往往忽视了经济增长质量。虽然早在1995年的时候，国家就提出了“抓大放小”的方针，但结果是放得越彻底，大的国企规模反而越来越大、数量越来越多，导致业务依旧分散，主业效率依然不高。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继续加强国企改革。

由于体制的制约，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即便政府能够鼓起勇气打破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对峙，但在面对国有企业改革时，依然举棋不定。国有企业在所有制形式上与马列主义对共产主

义、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的界定最为契合，因此长期以来，国有企业一直被当做保持国家社会主义性质的坚固的“堡垒”。这么说或许有点儿矫情，但国企改革的一波三折，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人民对国有企业复杂的感情。

国有企业改革影响深远，但其自身积累的大量问题，已经影响到整个国家经济体的运行，制约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发展。在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的2011年新年特刊中，国家统计局总工程师郑京平撰文指出：“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攻坚阶段，国有企业改革需要政府让渡更多的直接配置资源的权力，需要让一些国有垄断企业放弃垄断地位。刺刀见红的大动作，将遭遇既得利益者更大的阻力。要想突破这种阻力，不需要华丽完美的改革方略，也不需要锱铢必较的理论探讨，而是要求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和自下而上的强有力的执行。”

“刺刀见红”让国企改革沾上了一丝血腥味，但这显然不是危言耸听。即便在改革初期，国企改革更多地采取的是“帕累托改进”式的温和方式，但依然遭到了难以想象的阻力。回顾国企改革30多年来的历程，我们能产生更深切的体会。

国企改革基本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但初期的改革步子极小，基本上局限在放权让利上。但对此前完全依靠计划运营的国有企业来说，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放权让利的主要内容体现在：政府给企业确定增产增收的目标，

允许企业在实现目标后提取少量利润留成，可以用来给职工发放奖金。别小看这一改革成果，联想还曾因给员工发放奖金而差点儿被绳之以法呢。

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基础上，国有企业按两个步骤进行利改税，从上缴利润改为缴纳税收。此后，政府逐渐认识到国企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必要性，开始实施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作为“承包国有企业的第一人”，马胜利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承包了石家庄造纸厂，成为改革的风云人物，并因此两度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承包经营责任制虽然明确了责、权、利的划分，调动了经营者的积极性，但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下，并不具备大规模实践的可行性，再加上承包制本身存在的问题，这一政策很快就成为过眼云烟。随后，国有企业改革从政策调整进入制度创新阶段，现代企业制度被逐步确立为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

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党的十五大提出，要把国有企业改革同改组、改造、加强管理结合起来，强调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实行抓大放小，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

在此过程中，由于国企改革太过激进，对部分中小企业和经营不良企业实行“一卖了之”，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职工利益受损，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

当年，拥有总资产 7769 万元的遵义市食品总公司对其旗下资产以 750 万元的底价进行拍卖，有两位竞标人竞标，其中一人以 1490 万元中标，相关新闻见诸当地媒体。然而，一个月后，拍卖公司以竞标方无法履约为由，再次对同一标的进行公开拍卖，后被第一次竞标的另一方以 800 万元拍得。价格比第一次整整差了 690 万元，消息一传出，顿时引起了全厂职工的不满和社会舆论的抨击。据说，拍卖标的在之前的评估中价值 3000 万，但在拍卖前的评估中突然下降到了 1286.15 万元，实在让人费解。而在拍卖过程中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也没有人追究。

更让人担心的是，拍卖的都是食品厂的优质资产，拍卖获得的费用只能买断部分职工的工龄，其余员工则只能靠政府的最低生活补贴为生。这种典型的“一卖了之”、“一放了之”的做法，正是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和大量国企员工失业的罪魁祸首。

事实上，由于国有企业中所有者缺位而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在各种资产处置过程中普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显性流失，也就是国有资产在交易过程中价值被低估，造成事实上的资产流失；另一种是隐性流失，也就是因为国有资产得不到增值而引起的资产流失。当年，国有资产提出两大目标，一是保值，也就

是不能减少；二是增值，就是要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提升。很显然，我们在这两方面做得都远远不够。

当然，这一时期改革的成果也很丰硕，全国 15.9 万户国有控股企业中的 50% 以上实施了公司制改革，442 家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重组上市。通过重组，形成了一批极具竞争力的大型公司和企业集团，其中有数家企业成功进入世界 500 强企业行列。

此后，国企改革向纵深发展，产权制度改革成为改革的核心内容。然而，这一方向完全正确的改革，却因为选择方式的失误，造成了较为严重的问题。在此过程中，一些专家学者建议，将管理层收购（MBO）引入国企改革，试图解决政企不分、产权不明的问题。MBO 源于欧美，是目标公司的管理层通过融资的方式收购公司股份，以改变公司的所有权结构和资产结构、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统一，进而获得产权预期收益的一种收购行为。

管理层收购有利于完善公司的激励机制，改善企业运营状况，是一种有益的企业收购行为。然而，我国的专家学者忽略了欧美企业实施 MBO 的背景，欧美企业的产权结构明晰，只要资金到位，很容易实现所有权转移。相比之下，我国国有企业的产权结构要复杂得多，鲁莽地将 MBO 引入国企改革，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国有资产的贬值和流失。可以想象，在国有企业原有管理层的主导下实施 MBO，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失去了监控，形成了事实上

的资产流失。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政策或措施的局部失误，就看衰产权制度改革。从大方向上来说，实施产权制度改革符合国有企业改革的需要，能够加快国有企业的市场化进程，尽快形成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从而加强国有企业的竞争力。在此基础上，国资委正通过企业整体上市等方式推进大型国有企业的产权多元化。2007年以来，国资委一直将推动央企整体上市作为国企改革的重点，希望实现符合条件的央企整体改制上市或按主业板块整体上市。与此同时，国资委还支持具备条件的央企将主业资产注入上市公司。

实践表明，国有经济必须对行业和领域作出选择，否则就会逐渐丢掉固有优势。从政府宏观调控的角度来说，国资委更为主要的任务是要进一步推进国有经济结构和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促使国有资本向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行业 and 关键领域转移，从而提高我国大型国有企业的竞争力。而对于中小国有企业，则要坚持放开搞活。

总而言之，国有经济从非重要行业和非关键领域的撤退，是一种扬长避短的正确选择，能够有效地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同时，为了让国有企业更好地参与市场竞争，必须解决好国有企业的历史遗留问题，逐步剥离企业办社会的职能，推进主辅分离、辅业改制，从而最大限度降低国有企业的负担。

国企改革应该继续坚持市场化方向，继续探索和创新国有企业的体制与机制。经过 30 多年改革，国有企业身上依然或多或少地带有行政色彩，既要依赖于政府的扶持，凭借行政力量实现事实上的垄断，又要承担与企业运营无关的社会职能，不利于企业轻装前行。这两方面问题的存在，从本质上看都源于市场化机制的缺失。就此而言，市场化依然是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通过打破垄断，为国企创造竞争环境；通过去除社会职能，提升国企竞争力。这样一来，国有企业就能通过市场竞争，真正成为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市场主体。

2003 年以来，政府不断加大力度，建立并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加快调整国有经济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使国企摆脱了经营困境，实现了提高效率和效益的改革初衷。实践表明，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思路是正确的，但改革的幅度和对以央企为代表的垄断行为的控制仍需加强。

►► 3. 国企分红就像一道美的彩虹

国有企业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吗？现在的年轻人对这个问题一知半解。其实也难怪，在大家看来，国企的利益分配状况的确没有反映出全民所有的性质来。

自 1994 年以来，由于国有企业正处在改制的关键阶段，收益也不稳定，为了尽快实现国企改革，提升国企竞争力，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从未向国企伸过援手，国企也心安理得地从未向财政部、国资委或者其他部门上缴过利润。然而，在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再加上垄断形成的巨大优势，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到 2006 年前后，很大一部分国有企业成功改制，不仅做大而且也做强了。2006 年，全国国有企业实现赢利 1.1 万亿元。在这种情况下，国企分红成为水到渠成的结果。

然而，部分国企的高管可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看来，国企每年缴纳的税收已经为国家做了贡献。按照他们的看法，国有企业要应付市场竞争，必须拥有扩张资本，否则

就会失去竞争优势。国企之所以理直气壮，其实和管理部门的态度有关。国资委主任王勇就这样说道：“国企要承担 600 多万离退休职工的养老责任，这在其他性质的企业是没有的。国企不但办学校，还承担了大量的企业集体责任，要解决吃饭问题、历史包袱问题，还要解决自身的发展问题。”

王勇说的都是事实，但这并不是国企不缴分红的理由。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大部分国有企业带有垄断的性质，在受政府管理的领域，通常会得到照顾，这是民营企业不可能享受的待遇；同时，国有企业的资本本来就来自于全民，按照最简单的投资理念，投资人也应该享有分红权。国有企业的资本来自于全体人民，国企改制的成本同样由全体人民承担，既然原始资本和运营成本都来自人民，为什么创造成果后，国企要在体制内独享分红的“蛋糕”呢？

更让百姓难以接受的是，一些国企不仅没有分享红利，而且还屡屡曝出负面事件。2011 年 9 月，某企业先是因为生产的“纯中纯”饮用水致癌物超标而遭到抨击，后又因主楼豪华装潢赛皇宫而引发民众质问。在舆论压力下，该企业称该建筑是“为做公益事业而建的中国最大版画博物馆”，但并未因此得到公众的谅解。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呼吁国企分红的呼声日益高涨。

很显然，作为投资方的政府和作为融资方的国有企

业，在辩论中都可能失偏颇，那么让我们听听局外人的看法，看看国外的国有企业是如何处置利润的吧！

2006年，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的高路易等人撰写了一份《国有企业的分红：原因、金额以及支付给谁？》的报告，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份报告详细分析了国有企业的利润状况，指出：中国国有企业的利润属于公共收入，应当向国家分红。具体说来，就是要将利润或利润的一部分上缴财政部，而有关红利支出的决定应该纳入统一预算，由全国人大批准。

高路易等人当然不可能是中国百姓的代言人，他们的观点应该是客观公正的。

这份报告的主张赢得了很多人的支持，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周小川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为了明晰产权、改善公司治理，国有企业分红问题、混合所有制企业国有股的投资收益和分红问题，都需要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认真加以讨论。”随后，全国兴起了国企应不应该分红、如何分红的大讨论。

再让我们看看国外的国有企业是如何处置企业利润的。在法国，国有企业需要按正常的税法纳税，所得税税率为50%。在此基础上，如果还有剩余利润的话，其中一部分要按照股份进行分红，国家的股份同样如此。国家股份的利润交给财政部的国库司。在美国，有不少州将红利直接分给每一位公民，真正实现了全民分红。早在1976

年的时候，阿拉斯加州就通过公民投票，设置了一个独立于政府之外的“资源永久基金”，将该州超过 25% 的石油资源及相关收入投入该基金。从 1982 年起，政府每年给居住超过 6 个月的公民发放红利。

从中能够看出，西方国家不仅将政府的财政拨款看作是全民投入，就连垄断资源也都算在全民名下。而在分红上，老百姓大都能获得直接的分红，而不用政府作为全民代表享有红利。很显然，这种红利分配方式更符合老百姓的利益，让他们能够直接支配自己的财富收入。但在我国，全民分红本身就好事多磨，经过多年呼吁，也只能获得国企的少许“施舍”，更别提直接参与分红了。

按照国际通行做法，国企分红是不容置疑的，一方面国企的全民性质，应向国家上缴利润；另一方面，国企过度留存利润带来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事实表明，由于缺乏资本运营经验和管理水平不高，很多国企在掌握巨额资本后都选择了无节制扩张，最终将企业送入深渊。

2005 年年底，三九集团的赵新先被拘，一度引起人们的关注。据媒体报道，三九集团由于过度扩张导致资金链断裂，最终导致公司崩溃。从 1996 年到 2001 年的 5 年间，三九集团处于疯狂扩张状态，共收购了 140 多家企业，平均每个月超过 2 家。2002 年三九集团厂庆的时候，

设计人员在厂史陈列室的入口放了一艘航空母舰的模型，军舰的甲板上放置了56架飞机，分别代表三九集团直辖的56家二级子公司。在赵新先离职前，甲板上的飞机最多曾达到98架。快速扩张的代价是债务猛增。当三九集团因为涉嫌违规被证监会点名批评后，融资成了难题，迅速走向崩溃。

为了防范国企乱投资，国资委就一再强调要突出主业，并曾规定一个中央企业不能超过三个主业，在三个主业之外的业务，不能投资，要进行整合、归并。

如果说国企不分红，将利润真正用于企业的发展上，由此带来更多的利润，那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事实上，国企的利润并不是用于发展那么简单，其中一部分就成了国企职工的福利。对于普通企业来说，员工通过努力带来高效益，理应分享成果，拿高工资是正常的。但对国企来说，由于拿着全民资产，而且很多时候是通过垄断的方式赚取高额利润的，也就是说，国企的高额利润并不完全是国企员工努力的结果。在这种情形下，国企职员的高收入就让人难以接受了。数字显示，2008年，电力、石油等垄断行业职工的平均收入，居然是全国平均收入水平的5~10倍。如此大的收入差距，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

在社会各界的反响下，政府终于行动起来。2007年9月13日，国务院正式下文，要求：从2007年10月份开

始，烟草企业及国资委监管的 155 家中央企业要陆续向财政部上缴总额约 170 亿元人民币的企业红利。央企国有资本收益将按“适度、从低”原则分三档上缴财政部。其中，石油石化、电信、煤炭、电力、烟草五个行业的上缴标准为税后利润的 10%；科研院所和军工企业三年内暂不上缴；其余央企均按照 5% 的标准上缴红利。

然而，这样的上缴比例并没有赢得广大民众的认可。2010 年，国有企业利润近 2 万亿元，但上缴的红利只有 440 亿元，两会期间，委员们对此也是议论纷纷，整体意见都是倾向于提高国企的利润上缴比例。面对质疑，国资委主任王勇解释说：“国资委此前发布国企实现利润 1 万多亿元，但 1 万多亿元只是毛利，央企可支配的资金只有 2000 多亿元。”

之后不久，国务院终于再次行动起来，新方案中，资源类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由原来的 10% 提高到 15%，一般竞争类中央企业收取比例由原来的 5% 提高到 10%。

虽然上缴的比例依然难以令人满意，但进步是显而易见的。随后，大家的目光又聚焦到红利的使用上。国企作为全民所有的企业，全国人民理应是分红的主体。然而，即便是国企上缴的红利，也都是成为政府财政收入，而不是直接返富于民。姑且不论上缴红利的比例是否合适，仅就这部分财政收入而论，也只有很小一部分用在了社会保

障等民生支出上。2007 年、2008 年两年，国企红利开始调入公共财政预算，但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的支出只有 10 亿元。区区 10 亿元，对全国近 14 亿人口来说，人均还不到 1 元，能产生多大的社会效益，让人质疑。

对老百姓来说，国企分红就像一道美丽的彩虹，寄托了大家无限的希望，但在现实中，始终是口惠而实不至。将百姓的幸福寄望于国企分红，显然是不现实的。

►► 4. 民营企业——从草寇到英雄

国有企业改革虽然一波三折，遭遇了不少问题和阻力，但相比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还是幸福的。中国现代民营经济的发展波谲云诡，充满了风险、不确定和不可知的因素。早期，民营经济的发展基本上是前进两步就必然会倒退一步，有时候甚至是前进一步就倒退两步。

从一场近似玩笑的大辩论中，我们能够看出早期民营经济发展的窘境。

1981年前后，一些民营企业中出现了雇工现象，由此引发了关于雇工经营的辩论。《人民日报》甚至为此开辟了专栏，辩论时间长达三个月。在此期间，经济学家林子力援引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的论断说道：“雇工到了8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是剥削。”马克思是根据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来推算的，认为雇工在8人以下、自己也参加工作的雇主，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

间的中间人物;雇工一旦超过8人,雇主就开始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成了资本家。

现在看来,马克思的算法即便非常精确,也难免片面,毕竟同一时期各地的社会生产力不可能保持同样的水平。当然,林子力将这一结论直接运用到100多年后的中国,更是大错特错。当时,人们将这一论点称为“七上八下”,也就是说7个雇工没问题,8个雇工就会改变了企业的性质。

我们不能指责前人的理论推导,毕竟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殊性。但从中我们能够看出,民营经济的发展,时刻充满着未知的风险。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每次民营经济的发展进程中,都会出现一批“倒霉”的人,成为改革的“牺牲品”。

温州“八大王”就是最早一批倒在改革开放门口的先行者,而年广久虽然得到邓小平的庇护,也难免吃尽苦头。比较聪敏的先行者想方设法摆脱体制的冲突,很快就有人想到通过挂靠政府部门或公有制单位,为自己戴上一顶“红帽子”。然而,帽子也有被摘掉的时候,当暗流真正汹涌的时候,“红帽子”也会失去作用。当年,影响深远的“鹿运红帽子”事件就是这一现象的缩影。

【“红帽子”企业】是指由私人资本投资设立,而又以公有制企业(包括国有和集体企业)的名义进行注册登记的企业,或者挂靠在公有制企业之下的企业,即名为公有制企业实为私有制企业。“红帽子”企业出现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一段时期,当时国家对待民营经济的态度和政策不太明朗,而且很多行业和领域民营企业都无法参与,出于规避风险和获取利润的目的,不少民营企业选择挂靠在政府机关、公有制企业等的名下,以公有制企业的身份来运作。

鹿城运输总公司成立于1993年2月,张朝荣出资361

万元，占公司总股金的62%，是最大的股东。受制于当时的政策，张朝荣选择挂在鹿城区公交委名下。事实上，国家并没有出钱。公司由张朝荣筹资并发起创立，并一直由张朝荣经营。但出人意料的是，鹿城区无缘无故地免去了张朝荣的总经理职务，并让一位非股东成员取代了他的职位。

在临时召集的股东大会上，张朝荣据理力争：“为维护合法权益，我表示坚决反对，宣告提前退席。”但这并不能逆转局面，张朝荣很快就被排挤出局。此后，张朝荣到处上诉，在维权的道路上折腾了4年之久。当年，张朝荣为了维权，还给《中华工商时报》写了一封信，揭露了事件的真相。随后，该报围绕该事件连续做了8篇系列报道，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鹿运红帽子”事件发生后，全国各地的“红帽子”企业都产生了危机感，随即掀起了一场“摘帽”运动，有将近7000家“红帽子”企业要求变更注册登记，摘除“红帽子”。其中，名气较大的万向集团、横店集团和方太集团，也在鲁冠球、徐文荣、茅理翔等人的努力下，加入了“摘帽”行列。

邓小平南方谈话，终于从官方的层面承认了民营经济的合法地位，自此，民营经济才迎来了第一个春天。随后，万向、吉利、希望等一大批民营企业迅速发展起来，

很快成为中国民营经济的主力军。

国有企业改革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随着“抓大放小”政策的实施,国有企业撤出的行业和领域迅速为民营企业所占据,民营经济进入了上升的快车道。当时,国有企业执行的是“有进有退”的政策,而对民营企业来说,就意味着“国退民进”,也就是国有企业退出的地方,民营企业就进去了。这是“国退民进”的本义,但在后来的媒体炒作和学界争论中,这一本意发生了变迁。

2001年7月1日在民营经济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就在这一天,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允许民营企业主入党。在次年举行的党的十六大上,5位民营企业家代表出现在大会现场,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自此,民营企业家的地位得到了质的提升,同时也为民营企业赢得了更多的话语权。

2005年,国务院常委会讨论通过“非公经济36条”,进一步放宽非公有制经济的市场准入,并从多方面加大了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支持力度。“非公经济36条”的出台进一步削减了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成为民营经济发展史上最重要的里程碑。此后,民营经济发展迅猛,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也日益突出。截止2009年年底,我国注册登记的私营企业数高达740万家,占据了全国企业总数的71%,解决就业人员8607万。个体户数量为3197万

户，解决就业人员 6585.4 万人。

同时，民营经济也成为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2009 年民营企业纳税 8586.1 亿元，占全国税收收入的 13.6%。同时，民营经济也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生力军，截至 2009 年 3 月，具有进出口经营权的民营企业达到 39.2 万家，外贸进出口总额超过 5000 亿美元。

数据显示，我国已经进入民营经济大发展的时代。特别是近几年来，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包括美日欧在内的经济体经济发展全都陷入停滞，甚至出现了负增长。然而，我国经济却依然增长迅猛，这与我国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不无关系。民营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还在解决就业、增加税收和繁荣城乡市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实践表明，一个地区经济繁荣与否，与这个地区的市场化程度相关，而市场化程度高低又取决于该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程度。通常，民营经济发展越快，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越大的地区，经济就越繁荣，就业压力也越小。有统计分析表明，各地 GDP 总量和民营经济的规模成正比。这就意味着，民营经济的发展程度，决定了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程度。

对于我国来说，民营经济的规模已经足以影响我国的经济发展。在跨国企业越来越倾向于垄断我国的民族工业、国有企业改革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了反复的情况下，如

何充分发挥民营企业的优势,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

然而,被国人寄予厚望的民营企业,不仅没有获得来自政府、银行等各方面的支持,反而面临着各种各样的瓶颈,发展受到严重制约。

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从数量、质量、经济规模上来看,我国的民营企业都处于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实力迅速提升,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也日益稳固,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的重要力量。然而,民营企业始终有戴着镣铐跳舞的感觉,因为无法打破体制的框架制约。

江泽民的“七一讲话”奠定了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地位,《非公经济 36 条》确定了民营经济的经济地位,但民营企业所面临的传统的所有制歧视并没有完全消除,市场准入障碍也依然存在。多年来,许多行政执法机关和工作人员对民营企业家抱有偏见,甚至把他们看成资本家。政府政策导向已经打破这种歧视,但人们长期形成的意识不可能在短期内彻底改变,民营企业还必须在很长一段时间承担这种外在压力。而在市场准入方面,民营企业更是属于弱势群体,不仅无法像国有企业那样在各个行业畅通无阻,甚至能够进入行业的还不如外资企业多。有人将外资企业享受的待遇称为“超国民待遇”,而民营企业享受的则是“次国民待遇”。

对此,民营企业自身力单势薄,只能通过多方呼吁争

取支持，希望政府早日缩小这方面的差距。

从融资渠道来看，融资难的问题已经成了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与国有企业动辄从政府和银行获得巨额资金帮助相比，民营企业很少能获得来自政府和银行的资金援助。银行面向民营企业的贷款额度很小，而且有着比国有企业更为严格的贷款要求。民营企业的注册资本普遍较少，在达不到银行要求的情况下，只能以房产、车辆作为抵押。并且这些抵押物进行资产评估和保险，而不能享受国有企业以账面资产替代的低成本。除了部分像温州那样民间融资比较成熟的地区，民营企业可以获得必要的发展资金，大部分民营企业只能无助地看着机会擦肩而过。

在 2011 中国企业 500 强发布暨中国大企业高峰会上，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就表示：“我们民营企业更多的是中小企业，现在中小企业普遍感觉到融资难，普遍感觉到生存压力比较大，特别是我们外向型的民营企业，这些加工型的民营企业，这些中小型的民营企业，他们的日子比较难过。一方面我们庆祝 500 强企业大举进步的同时，也要看到我们中国的微小企业的处境还是相对比较难，国家给了很多鼓励、支持和推动，银行也给了支持，但是普遍还是感觉到融资难是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主要问题。”

刘永好反映的问题是一种普遍现象，很多调查研究显示，中国民营企业虽然数量众多，但个体规模太小，这成

了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最大障碍。其实,并不是民营企业不愿发展,但在我国现有的金融体系下,民营企业无法获得必要的发展资金,只能靠自身的日积月累。就目前来看,温州那样的民间资本应该是解决民营企业融资瓶颈的有效方式,但要想形成有效而巩固的民间融资环境,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做到的。温州从改革开放初期就有了民间资本,经过 30 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规则。

人才缺乏同样让民营企业家焦头烂额。企业发展势头良好,要追求规模扩张势必要引进更多的优质人才。然而,由于很多民营企业位于中小城市,也不具备为引进人才解决户口的条件,因此对人才的吸引力有限。大学毕业生倾向于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实在没有机会的话,也会选择省会城市。在我国严格的户籍制度下,毕业生能够忍受大城市的“黑户”身份,但在中小城市,如果连户口都不解决的话,几乎是找不到人的,更别说优秀的人才。

当然,户口只是影响民营企业延揽人才的外在因素,民营企业在经营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高端人才的引进。有不少员工反映,民营企业的老板普遍对外来人才缺乏信任,人才难以得到重用;相比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只有少数像华为那样的民营企业具有较高的工资收入,大部分民营企业的待遇太低,很难留住人才;部分民营企业缺乏诚信,在原本就缺乏制度保障的

情况下，员工甚至连工资都没有保障。在今年年初的民工荒期间，就有很多民营企业的员工反映，不少企业无法兑现招聘时的待遇和其他承诺。比如说工资，有的企业会通过各种借口进行克扣，让员工始终无法全身心地融入企业。

在内外因素的影响下，人才成了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瓶颈。

2011年两会期间，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国商会董事会主席、经纬集团董事会主席陈经纬在做客人民网时就认为，高端人才的缺乏，制约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陈经纬说：“现在的普通员工和劳工很多，一些大学毕业生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广大民企特别是民营企业，要找到高端的管理人才非常非常难。所以，高端人才的缺乏，制约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这是一个很大的瓶颈。所以，我再一次呼吁，国家在培养高端人才方面，还是要再花一些功夫，企业需要人，企业需要做一些贡献，为国家培育高端人才做配合和协作，出钱出力，为了我们未来的发展。高端人才是最紧缺的！”

这样的人才瓶颈是民营企业自身难以解决的。正因为人才的缺乏，才导致了民营企业转型的困难。企业转型需要人才替代会产生规模性人才需求，同时由于转型，对人才的水平也会提出更高的要求。但以民营企业的现状，维持原有的发展已经人才匮乏，要想转型，几乎是不可能完

成的任务。陈经纬就认为,民营企业面对的人才瓶颈,国家应该出台一些优惠政策予以解决。具体说来,政府可以鼓励企业协助社会培养高端人才,而在税收等方面应给予企业优惠。

另外,由于资本实力不足和技术落后,很大一部分民营企业从事的都是制造业,尤其是那些外向型民营企业,几乎都是以轻工业品为主。民营企业刚创立的时候,通常规模都比较小,档次比较低,大部分都是靠低技术含量产品起家,因此在技术方面没有过高要求。然而,由于产品的技术含量太低,无法形成行业门槛,因此任何手握资金的人都可以经过仿造进入。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可想而知。要想进一步发展,就必须考虑进入新的领域,开发新的项目和产品。

仿造不仅影响了中国制造业向高端发展,也危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就像当前在中国低端市场流行的“山寨机”,无疑就是仿造走向极端的体现。此前,美国人甚至在昆明市发现仿真度非常高的“山寨”版苹果零售店;近期,又有国际媒体报道说昆明出现了经营模式抄袭瑞典品牌宜家家居的家具店。模仿和学习是后来者必经的阶段,但决不能将模仿当做看家本领,那样最终伤害的还是自己。“中国制造”曾经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经济,但现在却成了制约我国产业升级的桎梏。

有鉴于此,民营企业在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资本后,

必须加大技术研发和资金投入，争取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便在新一轮品牌竞争中走向胜利。

事实上，民营企业不仅仅面临着融资难、人才短缺和技术滞后的瓶颈，同时还要面对制度缺失、创新不足等问题的考验。

►► 5. 跨国企业——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在经济继续保持 8% 的增长率的背景下,中国一直是外资眼中的香饽饽。相比于金融资本,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时间更早,规模也更大。2008 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各国经济都进入停滞或倒退状态,只有中国经济很快走出低谷,实现逆势反弹,这更是坚定了跨国巨头们的信心。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我国全面实施招商引资政策,给予跨国企业超国民待遇。在此背景下,跨国公司在我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与此同时,跨国公司的战略运营和经营管理也对我国企业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有效地推动了中国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同时也极大地拉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外资企业与公有制企业、民营企业三足鼎立,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跨国公司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这些负面影响的产

生，有的是跨国公司无意识经营的结果，有的则是有意而为之。经验表明，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资本的本质就是逐利，跨国公司在我国投资的终极目的就是获取利润。更为可怕的是，跨国公司目光长远，既能在必要的时候迅速抓住短期利益，又能兼顾长远利益，以占领中国市场为目的，试图实现资本扩张。即便中国企业识破跨国企业的面目，但面对跨国公司雄厚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等方面的垄断性优势，仍然会觉得力不从心。正因为如此，我国很多重点产业被跨国企业垄断，严重影响了民族工业的发展，甚至威胁到了我国的经济安全。

在现代产业结构中，物流业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物流业是服务、贸易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独有的主渠道功能，负有连接国内外市场、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功能。正是基于对物流业重要性的认识，我国于 2009 年将物流产业认定为十大产业之一，列为政府重点扶持的关键产业。然而，让人担忧的是，我国所有的三个物流领域，无一例外地被跨国公司所垄断。数据显示，国际四大快递巨头 UPS、TNT、DHL 和 FedEx 控制了中国国际快递市场 80% 以上的份额。如果不采取措施，我国的快递市场肯定会失控，从而引发供应链的脱节，威胁到我国的经济安全。

物流业并不是唯一一个被跨国公司控制的产业。在碳酸饮料市场，国内曾有很多全国和地区名牌产品，然而，

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等国际品牌采取合资并购等方式，有意识地将其他国家的品牌挤出高端市场。现在，国际品牌的市场占有率已经超过 90%。在这些案例中，我们明显能够看出跨国公司的野心。

事实表明，很多跨国公司不止是想从中国市场获取正常的利润，还是想打压中国民族品牌，实现垄断行业的目标。在这个合作共赢的时代，跨国公司深谙竞合之道，但它们看准了中国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总想玩浑水摸鱼、釜底抽薪的把戏。

2002 年 3 月，法国达能收购当时中国饮用水市场的王者广东乐百氏集团，控股 92%。随后，达能将乐百氏创业元老全部驱逐，试图将乐百氏玩弄于股掌之间。然而，市场给达能上了深刻的一课，乐百氏的业绩不断下滑，从 2005 年开始连续巨亏，最终毁了乐百氏这个知名度很高的民族品牌。

然而，达能并没有警醒，4 年后它再次将魔掌伸向中国另外一个著名品牌娃哈哈，试图强行收购，最后同样功败垂成。仅此一役，达能在中国市场声名扫地，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毋庸讳言，跨国公司对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远没有达到我们当初的预期。中国刚

刚开放市场的时候，打着“以市场换技术、换资金”的旗号，希望跨国公司在收获市场份额的同时，能将先进的技术引入中国。但我们显然高估了跨国公司的善意，它们输入中国的，大部分都是国际市场即将淘汰的二流技术和产品，不仅没能帮助中国企业增强竞争力，还在一定程度上让中国企业走入误区，并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金融危机之后，有一个很明显的迹象，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独资化倾向非常明显。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独资化步伐的加快使得外资已在很多行业占据了主要份额，甚至成为该行业的垄断者。1997年的时候，独资企业的资金额占外资总额的比例仅为32.77%；而到了2008年，这一比例已经上升到79.20%。很显然，经过多年的发展，跨国巨头们已经完成了本土化历程，完全有能力不依赖合资企业的本土化优势而生存了。在撇开合资企业后，跨国公司便能独享成果，而不用想着如何为中国企业分一杯羹犯愁了。

跨国公司的目标是明确的，它们不仅要和中国企业争夺市场，还要向中国政府争取更多的优惠照顾。近年来，跨国公司明显加强了相互之间的合作，各种交流平台层出不穷。再加上母国政府在背后的支持，跨国公司在中国正变得越来越强势。

面对跨国公司的咄咄逼人，中国政府不能等闲视之，中国企业也必须振作起来，迎接这一挑战和竞争。

从政府方面来说,首先必须强化反垄断法的实施,完善企业的法制环境。在外商独资化步伐加快的形势下,跨国公司垄断地位加强的趋势是显而易见的。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提供更有效的法律保障,是政府打击跨国公司垄断、保护国内企业利益的重要措施。政府明显认识到跨国企业的威胁,早在2008年就发布了《反垄断法》。然而,业界人士多有反映,反垄断法部分条款还必须细化,同时要加强对监控和执行,将《反垄断法》落到实处。

从企业角度而言,必须承认跨国公司资本实力、研发能力和管理水平的优势。可以考虑通过组建企业战略联盟,进行产业链整合,从而弥补实力的差距,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增强竞争力。当前,跨国公司已经从早期的单一项目投资转变为群体项目投资,很多时候都会将投资覆盖产业链的一部分,甚至是整个产业链。比如说高盛,在收购国内两家最大的肉类加工企业雨润和双汇后,又被媒体曝光:高盛斥资2亿~3亿美元,在中国生猪养殖的重点地区湖南、福建一带一口气全资收购了十余家专业养猪场。“高盛养猪”成了当年点击率极高的新闻,也为中国农业敲响了警钟。

毋庸置疑,当高盛这样的资本炒家控制了某个产业链后,带来的危害是惊人的。如何应对这种致力于产业链控制的外资入侵,是中国当前面对的重大课题。以中国企业的资本实力,是很难独自面对跨国巨头的挑战的。在这种

情况下，如果中国企业能结成企业战略联盟，加强产业链整合，或许能够在与跨国巨头的竞争中赢得些许比较优势，打击对方的嚣张气焰。

因此，在面对跨国企业的竞争时，中国企业要团结一致，尽可能地进行分工合作，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减少浪费，降低成本，避免恶性竞争。同时，通过战略结盟和资源重组，中国企业就有可能占据产业制高点，而不用担心被跨国巨头所控制。在香港，当地两家超市联手对抗家乐福，将家乐福挤出了香港市场，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当然，我们有必要保护民族工业、遏制跨国企业的垄断野心，但并不是要排挤外资企业。取长补短，不断增强自己的竞争力，才是中国企业在面对跨国企业这一“外来的和尚”时应有的应对态度。

►► 6. 民族企业——有实力才有脊梁

第一代企业家虽然是摸着石头过河,历经了改革的风风雨雨,但有一点得承认,成功的第一代企业家,都或多或少受益于“民族企业”大旗的庇护。比如说联想在 20 世纪 90 年代战胜跨国巨头,一举奠定了其在国内电子通讯领域霸主的地位,正是得益于国民高涨的爱国热情对其产品的支持;华为也曾在北京国际通讯展上特意将展区设在了外资企业的区域,并悬挂了两面五星红旗,一位国家领导人参观后高度赞扬:“在外国展区升起一面五星红旗,华为做了一件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事情。”

然而,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完善,人们越来越用市场化的眼光看待企业。当中国企业在与跨国巨头竞争的时候,如果还想打民族牌,不仅不会得到声援,甚至会被人指责别有用心。娃哈哈在与达能对决时,宗庆后涉嫌煽动民族情绪,就遭到了很多国人的指责。不少评论人士以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表示自己同样热爱民族品牌,

但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都应该坚持让市场和法律说话，不能越俎代庖。更为理性的说法则是：民族企业应该受到保护，但应该是那些诚信、健康的民族企业。

这种言论有点像“马后炮”，在企业出现问题之前，政府、仲裁机构、民众能知道企业是不是诚信、健康？显然不能。我们不能因为部分民族企业存在问题，就对所有民族企业做一次通盘调查，那是不现实的。因此，如果我们认定某个产业的民族企业和民族品牌需要保护，就应该坚持保护，而不是先问一声：“你诚信吗？”

中国法律曾因有罪推论的原则而频遭诟病，如果在保护民族企业时首先假定其不诚信、不健康，是不是也犯了“有罪推论”的逻辑错误？当媒体和专家学者以卫道士的形象将民族企业放在被告席上让大家进行举证的时候，我们已经站在了真理的背后，失去了仲裁的权利。

保护民族企业，从而保护关键的民族工业，原本就是后发展国家的普遍选择，也是国际社会都认可的做法。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加入 WTO 时执行不同的时间表？为什么一个国家各个产业开放的时间先后有别？就是因为国际社会承认部分落后的国家和落后产业应该受到保护。我们不能因为想争取名义上的大国地位，就放弃发展中国家应该享有的特权。看看我们的近邻日本和韩国，都曾有过保护民族工业的经历。即便今天，我国还是国际社会贸易保护和反倾销的主要对象。

【有罪推论】是指认定某人犯了某一罪行，然后围绕这一罪行搜寻相关的法律和事实依据，来追究一个人的刑事责任。在有罪推论的情形下，通常要求犯罪嫌疑人通过举证的方式证明自己无罪，否则就说明有罪。比如说，在一个杀人现场，某人拿着一把沾着受害人鲜血的刀。那么，法院就会认为此人就是杀人凶手，这时候不是检察院寻找嫌疑人的杀人证据，而是要嫌疑人寻找证据证明自己无罪。如果嫌疑人找不到证据的话，就会被认定为杀人犯。

数据显示，过去 10 余年间我国遭遇的国际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主义持续增加。尤其是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国为保证经济复苏，自我保护倾向非常明显。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日益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受害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 10 年间，我国被诉反倾销的数量仅占世界反倾销案总数的 4% 多一点，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这一数据上升到 13%，而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间，这一数据已经攀升到 26%，近 5 年更是超过了 30%。

以我国传统优势产业纺织业为例，从 2001~2008 年，我国仅遭受了国外 55 起特别保障措施，但到了 2009 年，仅一年间我国纺织出口产品遭受的反倾销案件就达到了 45 起。这些反倾销案的发起国既有像中国一样的发展中国家，也有欧美发达国家。这两类国家反倾销策略是不同的，发展中国家通常依赖政策保护措施，而发达国家则主要靠技术手段。发展中国家倾向于采取反倾销、反补贴和特别保障措施等法律手段，制约中国的纺织品进入其市场，以达到保护本国相关产业的目的。当前，印度、巴基斯坦和巴西等国就经常采取类似的政策，以便更好地保护本国的民族工业。

与发展中国家不同，发达国家由于标准体系和检测机构比较完善，有条件也有能力通过其他方式阻止别国优势产业的入侵，因此在做法上更为市场化，也显得相对温和一点，但结果无疑是相同的。发达国家更多地采用技术手

段，也就是通过提高技术标准等方式形成贸易壁垒。同样以纺织业为例，为阻止我国纺织品对本地市场的冲击，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就针对我国的纺织品先后出台了各式各样的新标准和新规定，比如说纺织品生态标签标准、REACH法规和禁用偶氮染料等。

当然，这种保护不是毫无选择，而是要明确需要保护的关键领域，否则就会成了众矢之的“商业民粹主义”的替罪羊。

在外资投放急剧变化的今天，看清跨国企业的动向，能让我们更加坚定自己的选择。众所周知，外资刚进入中国的时候，摆出的是一副友好的面孔，采取的是合资合作的投资方式。这段时期是跨国企业和中国企业的蜜月期，中方虽对不能获得真正的先进技术略感不满，但总体上双方都获得了不错的收益。之后，外商独资企业虽然有所增加，但并没有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直到 21 世纪，已经适应了中国市场的跨国企业才开始蠢蠢欲动，先是选择直接投资，在感到见效过缓后，又开始将目光瞄准各行各业的民族品牌。2005 年之后，跨国企业的独资化倾向和并购之心日益明显。在 20 年时间内，独资企业的资金额占外资总额的比例就从 32.77% 上升到了 79.20%。如果说这还不足以引起我们重视的话，那么跨国企业频频将“魔爪”伸向我国各行各业排名前几位的民族品牌，就理应让我们有所警觉了。

跨国企业的并购目标明确，通常都是各行各业排名前列的优秀企业。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就曾说过：“一些跨国公司的目标是必须绝对控股，必须是行业龙头企业，未来预期年收益必须高于15%，这三条‘必须’目前正在成为一些跨国公司在中国并购活动的基本要求。”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跨国企业收购优秀企业可以理解，这样可以借助对方的优质品牌迅速打开市场，但跨国企业似乎对本土品牌并不感兴趣，在多宗并购案例中，跨国企业将本土的民族品牌弃之一旁，丝毫不觉得可惜。比如扬子冰箱与西门子合资的时候，双方约定封存“扬子”品牌60年；德国美洁时并购“活力28”的时候，约定前者独营50年。其实，不要说50年了，哪怕是5年，这些稚嫩的中国品牌也不可能维持原有的品牌价值。

跨国企业大肆并购的结果就是，我国众多行业和领域被跨国企业垄断。据统计，中国最主要的28个产业中，跨国企业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的控制权。当汽车、手机、轮胎、饮料、日化市场、电脑操作系统、房产中介高端市场等众多领域被外资掌控时，我们悚然发现，其中任何一个行业的失控，都可能危及我国的经济安全。

比如说信息安全：2011年8月，标普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级引起的震动，彰显了信息的重要性。比如说金融安全：近几年来，外资已经全面介入中国的银行业、保险业、信托投资、基金管理等金融领域，合作对象几乎包括

了这些领域最大的几家公司。以国外投资机构撬动一个国家经济的经验和实力，一旦有意为之，震动中国金融市场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比如说资源安全：我国的自然资源并不丰富，当大量的跨国企业选择到中国直接投资，在为中国带来财富和就业的同时，是以大量消耗资源为代价的。

对此，政府也开始警惕起来。2008年9月，可口可乐宣称将以179亿港元收购汇源果汁，引起业界的广泛关注。可口可乐虽然做通了三大股东的工作，但却被商务部拦截下来。经过近半年的调查，商务部于2009年3月18日表示，可口可乐并购汇源未通过反垄断调查，因为收购会影响或限制竞争，不利于中国果汁行业的健康发展。

由于社会影响广泛，商务部特意解释了原因：第一，如果收购成功，可口可乐有能力把其在碳酸饮料行业的支配地位传导到果汁行业。第二，如果收购成功，可口可乐对果汁市场的控制力会明显增强，使其他企业没有能力再进入这个市场。第三，如果收购成功，会挤压国内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抑制国内其他企业参与果汁市场的竞争。

事实已经一再证明，中国试图以市场和股权换得跨国巨头的技术，只是一厢情愿的选择。面对中国民族汽车工业的困境，汽车分析师杨再舜认为“中国商用车应该放弃民族汽车工业”。其实，如果按照这样的观点，我们需要放弃的民族工业远远不止汽车，还包括手机、轮胎、饮料、日化产品和电脑软件等。如果不以产业划分，而是以

产品形态划分的话，这个单子可以列得很长很长，长得让所有人瞠目结舌。但我们最好不要如此“心狠”，毕竟还要给民族工业和民族企业一定的自尊和信心，否则我国的民族工业就会失去最后的底盘，民族企业就会失去最后的生存空间。

有鉴于此，我们必须给予民族企业足够的信心和帮助，让民族企业用更强大的实力挺起民族工业的脊梁。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第四章

股市何以引万人竞折腰？

● 中国现在有两个市场最热，一个是房地产市场，另外一个就是股票市场。股市是一个奇怪的市场，一边是投机资本的疯狂炒作，另一边是上市企业的苦苦耕耘。在很多人眼中，股票就是投机者的天堂，但最怕投机的企业却离不开股市的追捧，实在是让人啼笑皆非的场面。

股市跌宕起伏，一波三折，有的人因此一夜暴富，也有人瞬间倾家荡产。但这一切似乎和企业并无多大关系，在中国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中国企业正信心满怀地踏上上市的征途，掀起第四波上市高潮。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 1. 上市企业：富豪的摇篮？

1990年，中国股市刚刚拉开帷幕，当年上市的企业仅有10家。20年后，我国境内上市公司的总数已经达到2063家，海外上市企业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面对日益澎湃的经济大潮，企业纷纷选择上市。有媒体如此描述互联网企业的上市热潮：互联网企业要么已经上市，要么正在上市。其实，不仅互联网类企业，中国的高科技公司、IT类企业也一致把上市看做是自身通往繁华资本市场的一次华丽的转身。

以最热门的互联网业为例，自1999年中华网作为第一只概念股登陆纳斯达克以来，我国互联网已经经历了4波赴美上市热潮。第一波热潮出现在1999~2000年，以搜狐和新浪等门户网站为先锋；第二波热潮出现在2003~2005年，以百度和盛大等专业互联网企业为代表；第三波热潮出现在2007年，以巨人网络和完美时空等网游概念股为主；第四波热潮出现在2010年下半年以来的一段时

间，当当网、麦考林网、奇虎 360 网、世纪佳缘网、优酷网、人人网等企业，竞相登场。今年以来，土豆网、迅雷网等网站相继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递交了 IPO 申请，而红孩子、凡客诚品、开心网等网络新贵也已将上市排上日程。

清华科技研究中心的调研表明，2011 年上半年，在其关注的境外 13 个市场和境内 3 个市场上，共有 339 家企业上市，其中，中国企业 207 家，占总数的 61%。全球 339 家上市公司融资总额为 900 亿美元，其中，中国企业上市融资总额为 350.10 亿美元，占比 38.9%。这些结果并不是偶然的，事实上，近几年来，中国企业上市的数量和规模整体处于持续上升的态势。

打开新闻门户的专业新闻和金融类、投资类网站的新闻页面，诸如“中国企业再掀海外上市热潮”、“江苏企业上市新热潮”、“安防企业上市热潮”、“汽车零部件企业扎堆上市”、“中国 B2C 迎来上市潮”这样的标题，已经成了引人注目的新闻热点。事实表明，中国正迎来企业上市的井喷时代。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企业选择上市是顺势而为，而上市带来的拉动效应也是显而易见的。毋庸讳言，企业上市的第一目标是融资。上市为企业融资搭建了极为宽广的平台，可以让企业有能力筹集巨额资金促进自身的发展。

对企业尤其是正在成长期的企业来说，资金问题事关自身的生死存亡。土豆网 CEO 王微对此感受至深。今年第二季度，土豆网财务报表显示：土豆网该季度净营业收入为 1782 万美元，同比增长 94.5%；该季度净亏损为 1204 万美元，比今年第一季度下降 76.5%，但比 2010 年同期增长 74.5%。根据财务报表数据，资本市场作出预测，土豆网只能再坚持两个月，如果没有注资或无法实现上市的话，很可能跌入破产深渊，或者被收购。

当时，王微也不无悲苦地表示：“采购这一块我们的确比较落后，落后的原因很简单，没有资金，优酷上个季度花了 1 亿 5 千万元，我们总共只花了 3500 万元。”以当前视频的市场价格，3500 万元就像毛毛雨一样，砸下去最多也就是泛起一点浪花。据说，搜狐视频网仅购买《新还珠格格》的影视播放权，就花了 3000 万元。由此能够想象土豆网的窘迫。

王微对此心知肚明，因此早在 2010 年 11 月，土豆网就先于最大的竞争对手优酷网提交了 IPO 申请。但天有不测风云，由于受政府离婚财产分割政策的影响，土豆网的上市计划随即搁浅。这一耽搁的致命代价，是让优酷网抢了先机。2010 年 12 月 8 日晚，优酷网成功登陆纽交所，发行价为 12.8 美元，上市当天收盘价为 33.44 美元，涨幅高达 160%，市值甚至超过了搜狐和盛大两家网络科技公司。

反观土豆网，经过数番折腾，终于在 2011 年 8 月 17 日成功上市，但市场表现还是欠佳。土豆网发行价 29 美元，但开盘价仅 25.11 美元，比发行价下跌 13.4%。即便如此，王微还是松了口气，毕竟土豆网有了融资平台，暂时不必为遭遇“断粮”窘境而心惊胆战了。

资金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企业当然不敢怠慢。尤其是那些成长型企业，更是要时刻警醒，如果能够上市，当然是最好的选择。上市不仅能为企业带来资金，还能提升企业的品牌价值和知名度，从而让企业有更多的机会获得人力、市场等资源。

华仪集团董事长陈道荣曾说过：企业上市后，招投标都变得容易了。华仪上市后的半年内，中标额同比增长了 80%，而且更多的博士、硕士愿意到华仪工作。当初，太子奶的李纯途一直拒绝投资机构的帮助，但当高盛告诉他，能够帮助他在海外上市，让太子奶成为全球知名的大公司、让他成为真正的全球企业家时，李纯途当即心动了。

与此同时，上市还有助于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企业上市的过程，就是对企业整体运营环节进行梳理的过程，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和证券公司对企业开展的尽职调查，能够诊断企业在财务管理、内部控制和公司治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督促企业尽快进行调整和改善，以期达到与国际接轨的水准。同样，企业上市也是对员工最大的激励，潜在的股权收益会显著

地提升员工的忠诚度，增强员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从而建立和完善企业的激励机制。在此基础上，企业通过上市就能很好地形成抵御风险的机制，增强抗风险能力，为企业打造百年基业奠定根基。

上市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但并不是不存在弊端和风险。企业上市后，将会转变为公众公司，公司将拥有成千上万的大小股东。为了保护股东权益，上市公司必须承受更为严格的监管，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和压力也会水涨船高。尤其是当企业不具备上市条件，或者在不合适的时机上市时，还要承担破发等风险。前文提到的土豆网，迫于自身的资金压力，不得不在一个不太理想的时点上强行上市，其结果就是破发，留给公众一个不好的第一印象。

然而，在投资机构强势介入和挤兑下，中国企业家并不能有效地驾驭自己的企业。当风险资本介入后，为了尽快套现，它们逼迫中国企业争相上市，尔后抽身而退，全然不顾企业的死活。以高盛为代表的国外投资机构，早在1994年就进入中国。早期的高盛效率很高，很快就赢得了上至政府下至企业的广泛欢迎。然而，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高盛不可能安心于作嫁衣裳，丰厚的服务费不是它的终极目标。在经过多年蛰伏后，高盛很快就暴露出资本“狰狞”的一面。近年来，诸如《高盛在中国》《揭秘高盛》《高盛帝国（前传）》《高盛的中国生意》等一系列书籍，揭开了高盛的真面目，让人们明白了郎咸平财经

“鬼故事”的内涵。

面对世界顶级的投资机构，中国企业显得弱小而无助。事实上，即便在市场机制相对完善的欧美，高盛都能畅行无阻。希腊等欧元国出现的债务危机，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个合作伙伴的危险。

早在 2001 年的时候，希腊就开始考虑加入欧元区。然而，要想成为欧洲经济货币同盟成员国，有两个关键标准必须达到：一是预算赤字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 3%，二是负债率要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60%。这两个条件希腊都不具备。正在为此懊恼不已的时候，迎来了高盛的慷慨相助。

【货币掉期交易】是指交易双方在兑换两种货币时约定，在将来的某个时点以同样的汇率或者约定的汇率进行反向货币交换。比如说 A 拿 600 元人民币兑换 B 的 100 美元，双方约定，一年后 A 拿 100 美元从 B 处换回 600 元人民币，这就是典型的货币掉期交易。

高盛为希腊制定了一个名为“货币掉期交易”的方案，背后真实目的居然是为了掩盖一笔高达 10 亿欧元的债务。在该方案中，高盛建议希腊先用欧元以外的货币发行政府债务，然后再换回欧元债务。等债务到期后，高盛可以再将其换成美元或其他货币。其间，高盛为希腊提供优惠汇率。通过这种操作，希腊的预算赤字在账面上显示仅为 GDP 的 1.5%，远远低于规定的 3%。

高盛的“高明”操作让希腊得偿所愿，成为欧盟成员国。但这种通过“作弊”的方式得来的资格，不仅没有振兴希腊的经济，反而让希腊债务危机日益严重。经过近 10 年的遮掩，希腊千疮百孔的经济体终于承受不住重压，轰然倒塌。

如此强大甚至可以说是狡猾的合作对象，应该引起所有中国企业的警惕。不要因为国际投行的影响力较大，就轻易将上市的代理权拱手相让。

当然，中国企业上市的热情，与富豪情结也有一定关系。中国最新的亿万富豪，几乎都是诞生在上市企业。网易于2000年“流血上市”，创始人丁磊于2003年登上中国富豪榜榜首；2004年，国美在香港买壳上市，当年黄光裕就成为中国第一富豪；盛大同样于2004年登陆纳斯达克，次年陈天桥成为中国首富。百度当年上市时，创造了8个亿万富翁、50个千万富翁、200多个百万富翁。据媒体报道，2010年A股涨幅全球倒数第二，但当年上市的340多只新股创造了824位亿万富翁。

正是在巨大财富的诱惑下，中国企业前赴后继地走上了上市之路。

►► 2. 20 万亿为何一夜蒸发？

如果你炒过股，而且曾经赚到过钱的话，你就会对下面这一幕毫不陌生。

你买了一只创业板股票，并且在它从 25 元涨到 26 元时及时抛掉。虽然只不过赚了 1 元，但你有理由感到开心。不过小小的遗憾还是有的，因为当你抛出后，大盘指数依然在噌噌上涨，那张你抛掉的股票已经快涨到 30 元了。

不出意外的话，你会再次出手。这一次，你选择了一只 28 元的股票，并且在它涨到 30 元的时候顺利脱手。这一次你不仅感觉良好，而且有点小小的得意了。因为你在网上看到的帖子，就是那个被人称作股神的家伙，炒了七八年股票了，居然还没出现过连胜的记录。难道自己比他还厉害？你虽然不敢当面这么说，但你的心里已经有了结论：“或许我是天才，天生就适合炒股吧！”你不无得意地想。

就在你想象的当口，大盘指数依然没让你失望，还在不停地攀高，就连你抛掉的两张股票，也在小幅波动后再次升高。这下子你有点犹豫了，因为很多经验老道的家伙告诉你，再厉害的高手也很难连续成功。你很沉着地按捺住冲动，选择去各个股市论坛听听那些失败者的心声。然而，和你想象的不同，论坛上一片红火，好像大家都在赚钱。随后你又在专业媒体上看到了专家级别的评论。评论一边倒地看好大盘，很多分析师信誓旦旦地告诉你，现在正是史上难得一见的大牛市，闭着眼睛炒股都能赚钱，而且还特别强调，某几只股票会成为超级明星股。

形势一片大好，你不再犹豫，将股本和刚赚回来的钱一股脑儿都砸了下去，以 35 元的价格买回了一只大家都看好的股票。买完后你的心里也犯了嘀咕：万一一看走眼了呢？随即你轻轻给了自己两巴掌，这也太乌鸦嘴了。如此大好的形势，自己又选了一家正处于成长期的公司的股票，即便不能大赚，怎么着也不会亏损的。不过你还是决定，只要股价稍微上涨一点儿就立马抛了。等拿到钱，带着老婆和孩子出去玩一趟，休整一下，过段时间再继续。

然而，大盘好像看透了你的心思，居然没给你一丁点儿的机会。你刚投下，大盘就开始走低了，你买的股票也毫不犹豫地跟着大盘往下跌。很不幸，你被套住了。没多久，大盘又拉出一根小阳线。股市给了点阳光，你就灿烂起来，你又进场。第二天，大盘又跌了，你买的股票也泛

绿。你想，这可能是某个谷底，又进场。第三天，大盘跌得更欢了，现在让你割肉，你也不甘心，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然而，大盘跌个没完没了，你先前认定的谷底，原来就是一个山顶，你结结实实倒在了山顶上。

是不是对这样的情景似曾相识？

其实，当你承认中国股市是政策市的那一天，就应该明白股市的任何波动都是再正常不过的表现了。回顾中国股市，你必须准备一颗坚强的心，否则即便是阅读那一连串的数字，都可能让你无法承受。

【政策市】是指股市在很大程度上由政策而不是由市场控制涨跌。股市离不开政策，但政策的目的是规范股市而不是影响股票指数。目前，有不少专家学者认为中国股市就是政策市。

为了解决国有股不能流通的问题，盘活国有资产，自2001年6月23日起，政府开始减持国有股。受这一政策影响，中国股市进入了整整五年的漫漫熊市。从2001年到2005年，上证指数一路下跌，从最高点2247跌落到最低点998。在此期间，股指持续下跌，所有的理论线条都失去了意义，7000万股民看着手中的财富跌掉了一半，绝大部分人都被高位套牢，失去了撤资的机会。

面对此情此景，很多人选择了等待，这一等就是4年。在此期间，中国股票市场过山车般涨一天跌两天，考验着广大散户的神经。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前，证券交易所门可罗雀，股市日成交额突破100亿元都很难。上市融资几乎成了一则笑话。

2005年，证监会全面启动股权分置改革，彻底激活了

股市。在会后的两年时间内，中国股市仿佛服了兴奋剂一般，从2005年6月6日的最低点998.23一路飙升，到2007年10月16日，上涨到了6124.04点，净增了5倍多。

一夜之间，证券交易所的大厅显得太过狭窄了，扩容成了各家证券交易所的一致选择。此前，7000万股民已经所剩无几，在这波牛市的带动下，过亿的股民加入了炒股大军。那时候，即便在民营企业，员工上班时都公开炒股。个别胆小的员工看到老板进来，赶紧切换桌面上的K线图，谁知老板问他：“涨了多少？”

那时候，流行一首股民即兴创作的歌曲——《死了都不卖》：“死了都不卖，不给我翻倍不痛快……就算深套也不卖，不等到暴涨不痛快……到顶都不卖，做股民就要不摇摆，不怕套牢或摘牌，股票终究有未来。”

那段时间，股市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财富神话，“股神”第一次成了全民英雄，明星般受到市场的追捧。

原本被套牢的股民，只要沉得住气的，无不欢欣鼓舞，两年间就能从一贫如洗的乞丐变成腰缠万贯的阔佬。然而，更为理性的思考告诉我们，这波涨幅并不可靠。如果说股市暴涨得益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就算GDP每年都能维持8%以上的增长率，也很难支撑股市5倍多的增长。更何况，2001~2005年期间，中国GDP的涨幅并不比2006年、2007年差，为什么那时候股市就会一蹶不振

呢？

分析表明，中国股市有太多的投机因素，往往会在利好或利空消息的炒作下，背离国家经济和企业发展的走势，被人为因素所控制。2005 年的股权分置改革，只是为股市上涨腾出了足够的空间，并不是股指净增 5 倍的全部原因。事实上，由于中国经济始终保持旺盛的增长势头，国内外资本早就垂涎欲滴，股权分置改革为这些资金的进入提供了契机，一旦中国股市打开缺口，境外资金、民间资本和各式基金纷纷介入股市，成为股指的重要推手。

完全脱离国际经济和国家经济增速的股市都是不可信的，中国股市在这两年间的引吭高歌，注定只能是最后的绝唱。而且还必须记住：出来混迟早要还的。股市透支了原本应该几十年才能积累的财富，当然不可能全身而退。

熊市漫漫，牛市过得却很快。短短两年半后，中国股市开始为前两年的疯狂还债了。这一还，就是 20 万亿元。从 2007 年的最高点 6124 点到 2008 年的 1664 点，市值最多缩水 22 万亿元。当时，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的数据表明，中国 A 股账户有 1.2 亿个，即便不考虑一人持有多个账户的问题，人均亏损的财富也是惊人的。

原来的“股神”纷纷走下神坛，创造财富神话的股市开始酝酿财富悲剧。那时候有网络帖子这样戏谑道：看到跳楼的不要问他为什么，也不要问他是谁，肯定是炒股的，被高位套牢了。

2007年牛市当道的时候，一位经济学家振臂高呼：中国将迎来前所未有的“黄金十年”，中国的资产价值需要重估，迎接中国股市的，将是牛市的下半场。这位经济学家肯定是中国足球的球迷，要不然不应该如此娴熟地说着“下半场”。事实表明，他的前半截话并没有错，但后半截则成了令人心酸的笑话。

然而，20万亿财富一夜蒸发，股民却不知道原因何在，也没有人出来作出解释。股民就像恐怖袭击后的幸存者，安静地躲在角落里，等待某个恐怖组织出来发表对事件负责的声明。但中国的股市不一样，20万亿财富就像幼儿园的孩子玩水漂一样，听得见响声就很不错了。甚至有人出来做官样文章，为中国股市歌功颂德，说股市整体运行依然平稳。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中国股市起伏跌宕、20万亿财富不翼而飞呢？归根到底还在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不够完善，政策对股市的影响太大，无法有效地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此时，就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投资者就会让位给投机者。可以说，正是因为投机者充斥股市，一旦有风吹草动，就会出现一窝蜂现象。

当股指上行到6124点的时候，投机者的贪婪显露无疑，市场鼓噪不到一万点不罢休，高喊“死了也不卖”；而当股指开始下行的时候，投机者的恐惧又暴露出来，一个跟着一个甩卖，生怕被套牢。然而，正是这种贪婪和恐

惧心理在作祟，股市才会出现跌宕起伏，才会出现股指的大跌和大涨。

2008 年，的确出现了一些利空消息，这些利空消息遭遇股民的投机心理，造成了股市的迅速雪崩。有人将 2008 年的熊市归结为四大灾害：“天灾”，即雪灾和汶川地震；“次灾”，即美国的次贷危机；“油灾”，即石油暴涨至 147.6 美元/桶；“通灾”，即通贷膨胀。其实，这四大灾害虽然会影响股市行情，但影响的幅度绝不可能大到崩溃的地步。然而，在我国资本市场不健全的条件下，原本不可能的事却堂而皇之地发生了。

如果我们能健全资本市场的制度体系，让股民不再以投机为目标，那么即便出现利空消息，人们也会根据国家经济的发展走势进行判断，而不会见风就是雨，跟着感觉走，跟着别人走。果真如此，中国的股市就不会出现大涨、大跌的现象。

或许，股市的这种波动正符合了政府的需要，因为中国股市一直贴有政策市的标签，在 2008 年“防过热”、“防通胀”的大背景下，打压股市以冷却经济，似乎是政府的首选措施。发生在 2008 年前后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能迅速摆脱影响，成为最早一批经济回暖的国家，可以说股市下跌起了维稳的作用。

当然，这波熊市还有一些更为具体的原因。比如说股市扩容问题，不仅扩容的幅度太大、速度太快，而且价格

也太高。数据显示，新老划断后上市的 265 只新股发行价的平均市盈率是原来的 28.8 倍，无形中推高了二级市场的平均市盈率。同时，股改前股市市值仅为 2.3 万亿元，仅仅两年半的时间，市值就猛增至 34.5 万亿，扩容了整整 15 倍。如此增速，即便是成熟的美国市场恐怕都难以承受，更何况“修行”尚浅的中国股市呢？

►► 3. 和股市捉迷藏，玩的就是心态

很多股市高手都喜欢和别人分享一个故事，一个非常简单的故事，却让高手们显得深沉而又与众不同。

一位不识字的农村老太太去城里看望自己的女儿。女儿看母亲太无聊，就给她办理了一个股市账号，并教会她如何在网上买进卖出。

刚开始的时候，老太太担心赔钱，每天只是看看，一直没买。每天遛弯的时候，偶尔停下来听其他老头、老太太谈论如何炒股。无论是新手还是老手，耳濡目染之下，大家谈起炒股来都是唾液横飞，一派高手的风范。

过了一周，老太太心想，就少买点儿吧，帮女儿赚点儿菜钱也好啊。一旦动了心思，老太太发挥了农民的务实精神，立即行动起来。在动手前，她打定主意，每天只要能赚下当天的菜钱就行。

接下来一个月，老太太奉行着这样的炒股原则，一天

只要能赚到十元、八元的就收手。

一个月后，老太太又出去遛弯，走到小区的广场停下来，听一群老人议论炒股。大家依然很健谈，但没有一个人提到赚了多少钱。

就在这时，老太太的女儿走过来，掏出 500 元递给老太太，说：“妈，这是菜钱。”

老太太摆了摆手，说：“不用了！”

女儿坚持道：“拿着吧，怎么能用您的钱。”

老太太回答道：“没有，你不是让我炒股了嘛，每天都能赚点钱，够咱家买菜用的。”

听了老太太的话，她的女儿一愣，旁边的老人们更是吃惊地盯着老太太，仿佛看着怪物一般。大家炒股都赚过钱，但每天都能赚钱的人，好像还真没见过。大家围着老太太，纷纷问她是怎么炒股的。

老太太很随意地说：“很简单啊，我每次挑选几只低价股，只要赚一点儿菜钱立马卖掉。”

大家一听，茫然地相互看了看，随即又点了点头，迷茫中似乎明白了一点儿什么。

这个故事说明，炒股并不存在高深的理论，如果不贪心，果断地以低价买进，价格稍涨就抛出去，赚点小钱是没问题的。事实上，网上也有很多操盘手揭秘，很多图形走势和线条图，其实并非和事实吻合。看不明白是对的，

真看明白了反而就错了。

从这个层面来看，股市和赌场差不了多少，炒股无异于赌博。

早在 2001 年的时候，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接受央视《经济半小时》采访时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中国股市很像赌场。

有人可能会质疑，10 年前说的话，现在不一定成立了。但在 2007 年的两会上，吴敬琏再次表示，自己依然保持当年的观点。

其实，吴敬琏的逻辑很简单，由于股价呈现畸型的高价格，很多股票没有投资价值。与此同时，股市上违规、违法活动很多，投资者得不到回报，成了一个投机的天堂。吴敬琏甚至表示，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在中国的股市，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

在这样的环境下的炒股和赌博又有什么区别？甚至可以说，炒股还不如赌博公平。

吴敬琏的“赌场论”曾遭到以厉以宁为首的许多经济学家的驳斥，在全社会引起了一场关于股市的大辩论。然而，直到今天，各方依然莫衷一是，争辩还在继续。

仔细梳理各方的言论，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观点相左，而是因为争论的焦点不同、时点也不同。有的人在谈论政策市，有的人在谈论股市和经济周期的一致性，还

有人在论证炒股是否存在理论和技术。其实，吴敬琏并没有否定股市本身，只不过是对于充斥着各式问题的中国股市存在看法。

众所周知，股市通常是一个国家经济的晴雨表，如果股市长期和国家的经济周期背道而驰，说明要么是国家经济出问题了，要么是股市出问题了。当中国经济连续数十年保持稳定的增速时，只能说明是股市本身存在问题。对普通老百姓来说，炒股赚钱的概率本来就很低，在国外也是如此。既然如此，如果再没有完善的制度保证和合理的规则制约，单纯认为股市就是赌场，是对股民不负责任的说法。

事实上，中国股市除了在 1996 年之前基本和中国经济周期同步外，之后大部分时间都呈现明显的逆经济周期运行的特征。股市的功能是实现一国资产的资本化，让现有资产甚至未来资产进行资本运作，从而带来源源不断的利润。当股市无法正常运营时，就既不能成为企业的正常融资平台，又不能作为国家经济的晴雨表，也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而对股民来说，这样的股市是不可控的，投资风险巨大。

当股民抱着投机的心理炒股时，股市就是赌场，炒股就变成了赌博。经济学家吴敬琏说，我从来不炒股。谢国忠也规劝人们：只要楼市不崩盘，普通投资者最好不要奢望从中国股市里赚到免费午餐和新汽车。这些有一定洞察

力并擅长分析中国经济的经济学家们，都对股票市场退避三舍，你凭什么觉得自己比他们厉害？

中国的资本市场就如同潘多拉的盒子，大多数人都在盒子外徘徊。赌跌还是赌涨，更像在玩一个证据不足的推理游戏。面对这样的现实，如果你还是要非赌不可的话，就必须摆正心态。

拥有闲置的资金才会去股市冲浪。股神巴菲特警告世人：绝不可以借钱炒股。巴菲特的博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原本是一家保险公司，只有拥有闲置资金时才开始投资，并创造了一个投资型企业。如果你拿着孩子上学的钱、给老婆治病的钱、提升自己职业素养的钱来炒股，那么你就不是一个赌徒了，你可能会输红了眼。我们应永远记得一句话：生命中很多事情永远都比股票重要。

有闲钱炒股时，还要保持好的心态，克服前面所说的“前景定理”。股市波诡云谲，仿佛是上帝为考验人性而特意设下的残酷迷局。“月有阴晴圆缺，股有横盘涨跌”，每个投资者都希望牛市长盛不衰，但股市瞬息万变，往往难遂人所愿。常在股市走，很难不“湿鞋”，保持好的心态尤为重要。

有一个和尚做股票的故事：一个很有智慧的和尚，每逢股市大跌时，他就会出来解救众生，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心态，慷慨地接入了所有散户卖出的一切筹

码。结果接入后，股市大涨，所有散户又去找和尚，希望和尚能把股票卖给自己，和尚又答应了，把所有的筹码又应散户要求卖给了散户，其后股市又大跌。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和尚其实并非慷慨地接入了所有散户卖出的一切筹码，他只是在别人恐惧时小小地贪婪了一把；而在“有散户找和尚，希望和尚能把股票卖给自己”时，和尚也并没失去什么，因为只有在别人贪婪时恐惧一点点，才能成为笑到最后的那个人。

赢时少些欣喜若狂，更不要被贪欲吞噬了理性，懂得适可而止，保持敏锐的洞察力，学会选择合适的时机退出。

短期投资和投机无异，要学会在长期投资上下工夫。股市有三句谚语：“选股如选妻”、“选股如选妾”和“选股如选美”。“选股如选妻”指的是长期投资，“选股如选妾”指的是风险型投资，“选股如选美”则是趋势型投资。普通投资者在选股时，还是老老实实选一个好“妻子”，不但对你实心实意，还经得过七大姑八大姨的考验，可以与你白头偕老。

资本市场脸色阴晴不定，短期投资往往被资本市场的变幻莫测搅得焦头烂额。而长期投资则更容易放长线、钓大鱼。短期投资赌的是政府是否出台了利好政策、某个公司是否有重组计划或者它的报表漂不漂亮。而长期投资，

赌的是经济增长周期的下一环是不是繁荣、企业的成长性到底有多大。

学会有的放矢，即盯住成长性高的企业不放，而那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企业，即使股价再低，跌破你的眼镜，也要稳住，捂住的钱袋，不要轻易让自己的血汗钱成为资本市场中的牺牲品。

资本市场风起云涌，其真相往往被浮华掩盖，唯有掠去浮华的泡沫，才知道到底哪是真金，哪是白银。对于普通散民，守一只成长性高的股票，比频繁的短线操作赚钱的胜算更大。不过，选择一只成长性的股票，操作起来也不简单。有的时候，我们明明选的是一只潜力股，可到了最后破产的也是它，原来那漂亮的财务报表都是粉饰太平，一旦看走了眼，血汗钱又在资本市场打了水漂。

考察一个企业是否具有成长性，首先要考察它生存的大环境，即该行业是否在国家政策支持之列、是否具有广阔的市场背景，如果整个行业都是明日黄花，这只股再风光，最好也不要碰；确定企业是否具有赖以生存的创造价值；考察企业在三至五年内的收入是否稳定，收入也不一定是爆发式增长，如果每年保持 50% 的增长率，哪怕只有 3%，但只要是持续和稳定的增长，就有投资价值；观察企业的净利润，其在三到五年内是否是稳定增长；看企业的资产使用效率，如果使用效率过低，也不可取；考虑公司的治理结构。对企业的领导班子有一个详细的了解，尤其

是主要领导，不但要看他在本公司的业绩，他在上一个公司的履历也要摸清，总体上对企业的领导团队有一个客观理性的权衡。

如果你选择的是成长性高的企业股票，你就不必在意股票的小涨小跌，甚至大涨大跌。因为一旦经济形势转好，这只股票也会水涨船高，你终会守得云开见月明。那么，即使第二波熊市来临，对你也没有杀伤力了。

►► 4. 股权分置改革，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股权分置改革】早期，中国股票市场上存在非流通股和社会流通股两种股份，这两种股份同股不同利、同股不同权，因而被称为股权分置。股权分置导致持有非流通股的大股东和持有流通股的普通股民之间的极大不公平，严重制约了中国股市的发展。有鉴于此，我国启动了股权分置改革，希望打破这种不平等状态，推动股市发展。简而言之，股权分置改革就是政府通过两类股东都认可的政策，实现非流通股上市流通，解决股权分置问题。

2005年6月6日，对很多中国民众来说是一个平常的日子，但对那些曾经或正在中国A股市场搏杀的股民却意义非同寻常。就在这一天，中国A股市场创下了一个历史低点——998点，这是中国个股票市场长达5年持续下跌后的一个点位，后来被股民戏称为“救救吧”。意思是，再不救市的话，历经10多年的中国股票市场就要完了。

这一天，你走进中国任何一家证券公司营业厅，里面都是冷冷清清，只有三两个已经长期套牢的股民面对着显示屏打盹。这些为数不多的股民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即将迎来中国股票市场的一波大牛市。这波大牛市历时两年半，上证指数上涨6倍。

这波牛市的直接引擎就是股权分置改革。

中国证券市场为什么要进行股权分置改革？改革为什么直接推动了A股市场有史以来最大的牛市？这就要从中国股票市场的股权结构说起。中国股票市场上的上市公司

股权分为两种：非流通股和社会流通股。流通股指上市公司股份中，可以在交易所流通的股份数量，这类股票一般被普通投资者所持有。非流通主要是指暂时不能上市流通的国家股和法人股，主要被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把持。这种股权结构造成了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利等问题，这就是一般所说的“股权分置”问题。

这个问题对中国股票市场影响巨大，股权分置问题使得中国的 A 股市场存在非常明显的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也即大股东和普通股民的利益不一致的问题，继而引发了一系列问题，诸如造成上市公司恶性圈钱、市盈率过高、股票市场定位模糊，不能有效与国际接轨等等。从市场反应来看，就是普通投资者在 A 股市场“亏惨了”。从 2001 年开始，中国股票市场涨一天跌两天，漫漫熊市长达 5 年，广大散户叫苦不迭。2005 年股权分置改革前，A 股市场成交清淡，日成交额徘徊在 100 亿以下，市场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融资功能。

市场环境惨淡，A 股市场发展前景岌岌可危。来自民间“江湖之远”的不满，已引起“庙堂之高”的关注。

从 2004 年开始，国家着手解决股权分置改革问题。2004 年 1 月 31 日，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积极稳妥解决股权分置问题”。2005 年，股权分置改革正式拉开大幕。4 月 29 日，证监会发布了《关于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提出了对价并轨的改革思路，启动了对尚未完成转轨的中国股市特色的股权分置改革。

在这次改革中，证监会吸取了以往的经验教训，方案设计更加合理灵活。在此之前，证监委也曾经提出过股权分置改革的提议，但在改革方案中采用了非流通股股权直接进入市场进行流通的方式，但这种方式不被流通股股东认可。流通股股东认为大股东在早期上市时并没有以现金在市场上购买股份，而是以低于真正市场价的资本估值获得股份及控股权，但是现在却要以同样的价格在市场上流通，流通股股东认为吃了亏，需要在股权分置改革时获得补偿。在本次股改方案中，证监会考虑了对流通股进行对价补偿的问题，二级市场自然对这次股改投赞成票。

不过，到底非流通股对流通股补偿多少才能让双方同时满意？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明确规定：股改方案必须经过三分之二流通股股东同意及三分之二全体股东同意，这一规定保证了本次股改的顺利推行。这样一来，证监会不再插手具体利益分配，把问题交由市场中的利益双方解决，同时还对流通股股东与非流通股股东双方讨价还价的话语权进行限定，以保证他们的博弈公平、公正地进行。

始自2005年的股权分置改革对中国股票市场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困扰中国股市多年的棘手问题——上市公司股权分置

问题迎刃而解。从 2005 年 5 月开始，金牛能源等第一批公司开始股权分置改革，到 2006 年 3 月，第 23 批的 46 家股改公司名单公布，至此，中国内地股票市场上，股改公司的比例已接近 50%。今天，中国股票市场还没有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公司已经寥寥。

而且，通过这次股权改革，流通股和非流通股都获得了较好的收益，流通股股东能够得到满意的对价，而非流通股股东的股份也可以上市流通了。

阻碍中国股市的重要障碍——股权分置问题，其瓶颈被打破，流通股和非流通股在股市中的利益有了保障，上市公司的股价也得到了重新估值，市场信心大涨，股市一扫以往的低迷，开始了长达两年半的大牛市。不管是上市公司，还是流通股股东、非流通股股东，都受益匪浅。以第一批参加股改的三一重工为例，2006 年，三一重工每股股价复权后不足 5 毛，到股权分置改革基本结束的 2007 年，三一重工的股价复权后为 5 元以上，上涨了整整 10 倍。今天，三一重工的每股股价为 15 元以上，比 2005 年股改时上涨了整整 30 倍。

事实上，股权改革对整个证券市场影响深远。从 2005 年年中股权分置改革正式启动到 2007 年，上证指数从 998 点涨到了 6124 点。即便受到世界金融风暴的冲击，当前上证指数仍然保持在接近 3000 点的位置，比 2005 年上涨了 3 倍多。与此同时，市场成交量也明显放大，从 2005

年的日成交量不足 100 亿到今天的日成交量达到 1000 亿，成交量是过去的 10 倍，市场活力明显增强。截至 2011 年 6 月，中国上海证券市场市价总值已经达到 18 万多亿元，流通市值 15 万多亿元；中国深圳证券市场总市值 9 万多亿元，流通市值 5 万多亿元。

经过 20 余年的发展，中国 A 股市场已经跻身全球证券市场前列，其中，2005 年的股权分置改革功不可没。

股权分置改革的意义重大，在大小非解禁之前，单以股市表现而论，称之完美亦无不可。正因为此，改革操刀者、证监会主席尚福林被业界认为是“最成功的证监会主席”。然而，当大小非时限一到，真正考验股权改革成败的时刻来了。

很多人将大小非解禁看做是股权分置改革的最后一步，但这显然是一种误解。种种迹象表明，大小非解禁只不过是股权分置改革极为关键的一步，即便股权改革能够通过考验，也不能说已经彻底成功。

事实上，2008 年股市的大跌，同样有着大小非解禁的影响。所幸，政府的救市之举拯救了股市，此后大小非解禁对股市的影响逐渐减弱。据此能够看出，大小非解禁原本问题不大，但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不完善和股民心理的不成熟，解禁往往会影响投资者的信心，从而造成股市恐慌。在经过政府维稳后，股民信心加强，也适应了大小非解禁带来的短暂波动。

总而言之，股权分置改革加快了资本市场化的进程，初步解决了非流通股的流通问题，同股不同权的问题得到了缓解。但不可否认，股权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市场化问题，股市的政策烙印依然明显，大股东的强势也依然有据可循。大小非解禁过程中，虽然通过对价弥补了流通股股东的部分损失，但新股扩容上市，再次盘剥了二级市场股民的财富。就目前来看，股市依然是蓝筹股跑马圈钱的工具。

类别股东投票制和短暂的议价机制，虽然彰显了股市民主化、市场化进程的加速，但并非股权改革的终极目标。要想将股权分置改革进行到底，大小非解禁并非重点，后股改时代，我们必须加快股市的市场化进程，揭去股市的政策市标签。更为具体的是，要通过改革畸形的新股发行机制，减少一二级市场的巨大落差。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追不上刘翔,更跑不过房价!

● 巅峰期的刘翔是所有 110 米栏选手的噩梦。他并不强大的爆发力和绝对速度,在优雅从容的栏间节奏带动下,让那些靠爆发力在起点抢得先机、却在栏间被赶超的同场赛手望洋兴叹。对中国人来说,看着不停上涨的房价,我们有着与这些 110 米栏选手相同的感受。

工资的确在涨,银行的存款也的确在增加,但无论是上涨的幅度还是增加的速度,与房价的增速比较起来,都显得是那么卑微渺小。面对工资实际购买力的下降,我们只能望房兴叹。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 1. 低收入者买不起房的时代

小王郁闷地走进办公室，挤了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更是让他一肚子火气。上班前，老婆又因为一点小事和他起了争执，虽然他强忍着没有让争执扩大，但当老婆再次提到买房的时候，他的怨气终于爆发了。

小王来自四川农村，凭借勤奋好学和上进心，毕业后留在了北京，成为一名让人羡慕的公务员。然而，生活似乎并没有想象得那么美好。由于没有积蓄，买不起房，结婚后只能在偏远的郊区租了房子。小王还好说，上班的路上只要花一个多小时，但他的老婆却要两个多小时，经常因此迟到，被上司批评是家常便饭。为此，他的老婆经常抱怨，争执太过激烈的时候，偶尔还会爆出一句：“你看人家小张混的，再看看你自己……”

小张毕业后，很快开了家自己的公司，现在已经成了有房、有车一族。

小王最受不了这样的抱怨，当即将手中的一袋牛奶狠

狠地摔在了地板上。

然而，办公室也不是安乐窝。小王进门的时候，另外两位同事正在讨论房价问题。

小黄：“幸亏去年咬咬牙买下了房子，要不然今年得多掏 30 几万。”

老李：“可不是，我那房子 180 万元买的，现在涨到 250 万元了。房子养老比儿子养老、银行存款养老靠谱啊！”

看着小黄和老李脸上洋溢着幸福，小王愈发沉下了脸，甚至连他俩打的招呼都懒得搭理。

对小王来说，买房的梦想的确越来越遥远了。小王刚工作三年，虽然公务员的工资还不错，但他每个月拿到手的钱也就是 4000 多元，再加上各式各样的奖金，差不多 5000 元。而他老婆的工资更少，作为一个本科毕业生，不仅工资不高，而且没有解决北京户口。毕业第一年的时候，她的工资是 1500 多元一个月，现在也只不过刚到 2000 元而已。两人在郊区租了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第一年的时候，月租是 800 元，现在已经上涨到 1500 元。当然，他们还不能嫌贵，因为他们住的是一处老式的小区，那些新建的环境比较好的小区，大一居的房子甚至已经超过了 3000 元。

刚毕业的时候，小王还颇有责任心地每个月往家里汇

几百元养老金，现在成天为房款犯愁，不得已只好放弃了这种孝心。即便如此，每个月扣掉各种花销，剩下的钱也很难超过 3000 元。这就意味着，他们如果想买房子的话，只能买月供低于 3000 元的房子。如此低的月供限制，就意味着他们只能买 30 平方米左右的房子。考虑到这个面积还可能是套内使用面积甚至是建筑面积，这样小的房子在北京市恐怕很难找到了。很显然，对小王这样的家庭来说，必须积累二三十年的收入后再买房。当然，如果他们打算要孩子的话，时间还得往后推移。

更让人忧心的是，这样的计算方法还没考虑房价上涨的因素，如果将这个因素考虑在其中，小王这辈子就只能租房而不能买房了。而那些咬牙借款进行首付、贷款买房的家庭，则始终生活在还贷的压力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房奴”一词。

从各方面条件来看，房价的上涨是可以理解的。无论是物价整体水平的上升，还是影响房价的地价的抬高，理应有相应升高的房价来抵消这部分成本。然而，房价上涨的速度却是普通大众所难以理解和接受的。

中国住房制度改革深入到分配货币化层面后，福利分房被全部取消，除了配套的保障性住房，商品房成了人们唯一的选择。清华大学的一位教授回忆当年的房价：1996 年她旅德归国，看到 1000 元/平方米的房价不由得大惊。作为清华大学的教师，出国前她的月工资不过是区区的

【福利分房】是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一种房屋分配形式。在这种形式下，由于企事业单位创造的利润大部分收归国有，因此包括房屋在内的部分资产以福利的形式分配给职工，因此称为福利分房。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政府逐步取消了福利分房。1998年，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决定自当年起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建立住房分配货币化、住房供给商品化、社会化的住房新体制。

100元。然而，时间到了1999年，北京黄金地段楼盘均价已经超过了6000元，短短3年间，居然翻了将近5番。2000年至2005年的6年是住房制度改革后房价最为平稳的时期，6年内价格浮动不过千元左右。此后除了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后房价曾有过短暂下跌外，其他时间一直处于直线上升态势。到了2010年，北京新楼盘均价已经高达22310元/平方米，即便如此，这一价格还低于杭州的25840元/平方米。

如果说这种变化还不够直观的话，另外几个案例应该能让人感同身受了。

在清华大学MBA的一次沙龙上，一位学员曾谈到武汉的一个房地产开发商。2007年的时候，楼盘以3000元/平方米销售，没想到一开盘就卖光了。开发商大为懊恼，连呼卖亏了，下定决心下次开盘要提到6000元/平方米。仅仅3个月后再次开盘，果然以6000元/平方米起售，没想到又一下子卖光了。开发商再次高呼卖亏了，随即表示下次开盘要提高到9000元/平方米。答案是显然的，同样是开盘就卖光了。这下开发商学乖了，为了获得最大利润，决定暂时囤积房源，等房价涨够了再卖。

开发商的后悔是少赚了，消费者的后悔可不是这么简单。那些原本有购房能力的人，受媒体影响以为3000元/平方米的价位难以持久，坐等房价下跌，没想到仅仅三个

月后就翻了一倍，随即成了买不起房的一族。

杨阳就属于倒霉的一位，当时为了结婚，他从父母和亲戚手中借够了首付，准备买一套普通的婚房。然而，女朋友却告诉他，房价很快就会下跌，她愿意再等一段时间。本来就是女朋友催着要结婚的，既然她都愿意等了，杨阳当然很痛快地答应了。接下来发生的事让杨阳哭笑不得，房价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在短短的四个月内上涨了50%，原本凑够的首付不够了。

婚期一拖再拖，原本就即将成为大龄青年的女朋友不愿意了，她逼着杨阳赶紧买房。杨阳忍不住反击道：“不是你当初让再等一段时间，现在已经有房子了……”言下之意就是，责任在你而不在我。女朋友虽然不是无理取闹之人，也明白是自己的责任，但她还是觉得自己等不起了，家人也一再催她早点结婚。结局是凄凉的，杨阳的女朋友嫁给了他人。

两年过去了，杨阳已经想开了，也不再抱怨什么，但当有人问他该不该买房的时候，他每次都会说：赶紧买，不买就来不及了。他当初就是因为想等一等，错过了一桩姻缘，他不希望别人步他的后尘。即便房价已经高得让人难以接受了，他依然表示只要有足够的钱，一定会第一时间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关于房子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但无论是喜是忧，丝

毫影响不了楼市的走势。在国家一轮又一轮的调控下，房价依然如雨后的竹笋节节拔高，直到 2011 年下半年才开始小幅回落，能持续多长时间也是未知数。

在楼市高涨的聚光灯下，“房地产泡沫论”的说法不绝于耳，甚至连部分房地产开发商都直言房价不久后会回跌。2008 年年初的时候，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房价调整甚至下跌是因为房价增长已经高出消费者收入太多，理性回归是必然趋势。他甚至建议青年人结婚的话可以先租房：“如果从我的角度来说，我是地产开发商，肯定建议你买房，而且是买万科的房子，我们从大学生公寓到最后退休的房子都有。但是比照国外的城市统计来讲，20 多岁就买房的非常少，尤其是大城市，对即将要结婚成家的年轻人来说，也是先租房为好。”

而潘石屹也在媒体上公开表示：“截至目前，北京、上海的住宅投资回报率仅仅为 2%，商业地产的投资回报率在 4%~5%，住宅的回报率太低了。就从资金回报率来说，房价还没有降到位。而且，住宅价格应该降，今年不降，两三年以后还得降。因为保障房的影响是巨大的。未来 5 年政府要建设 3600 万套保障性住房，如果按一个房子里住 4 个人算，那就是 1.5 亿人，总共的城市人口才 6 亿人，保障房的潜在影响可见一斑。”

然而，一年又一年，人们等着房价降低后结婚，等着

房价降低后生孩子，等着房价降低后将父母接过来养老，更浪漫一点的，希望能够获得带着老婆去全国各地旅游甚至环球旅行的机会，以便弥补当初简陋婚礼的遗憾。

然而，这一等就是好几年。

►> 2. 房价背后，究竟还有几双黑手？

2007 年，成都市中心的百货大楼被夷为平地，成为房地产大亨们眼中的猎物。不仅内地的房地产商盯上了这块肥肉，就连香港的房地产商也蠢蠢欲动。

拍卖那天，现场人头攒动，就像是举办明星演唱会似的，非常热闹。

起拍价并不高，只有 2000 万元/亩。

内地的房地产商首先登场，走马观花般将价格抬升到 4000 万元/亩。但国内房地产商的实力仅止于此，之后就是港商的表演了。六家港商轮番上阵，价格一路飙升到 8000 万元/亩。就连志在必得的李嘉诚的和记黄埔都未能笑到最后。最终这块地被香港九龙仓地产获得。

千万别被 8000 万元/亩的表象所迷惑，误以为连李嘉诚都承担不了这样的地价。事实上，这个项目除了前期高达 72.4 亿元的地价外，还要后续投资 40 多亿元。在此基础上，还有 8 个月内动工、三年半内竣工的硬性时间要

求。资金条件和工程条件的叠加，让实力明显不强的内地房地产商知难而退。

8000 万元/亩也就是近 12 万元/平方米，这块地毫无疑问成了成都当时的“地王”，而在这块地上建立起来的建筑，理所当然地将成为成都的“楼王”。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当时，很多人是抱着看热闹的心情去拍卖会的，但稍有见识的人已经开始为成都的房价担忧。数据显示，2006 年的时候成都 5 个城区商品房的成交均价不过 4472 元/平方米，新“地王”的出现将会如何刺激市场呢？

有分析认为，正是这次拍卖会改变了成都人的生活状态。原本，成都是一个悠闲而舒适的城市，甚至被评为联合国“最适宜人居的城市”之一。然而，这次拍卖给了成都人危机感，让他们开始为自己和子孙后代的房子忧心忡忡。

引起房价上涨的原因太多了，有经济和政策方面的原因，也有人为操纵的原因。从上面提到的例子能够看出，造成房价上升有两个原因，一是某些地方政府拍卖哄抬地价，二是外资入侵的刺激。

当人们大肆谴责房地产商暴利的时候，房地产商的回应是地价太高，把责任推给了地方政府。这是事实，与实行招拍挂制度之前的地价相比，现在的地价无疑是天价。然而，地方政府也不承认自己的问题，于是又将责任转嫁

【地王】是指在商品房用地拍卖中以极高价被拍得的建筑用地。通常来说，拍卖价格在某地的某一时段内处于市场最高价位。

给中央政府，很多人就将地价的上升归因于当年的分税制。分税制加强了中央集权，迅速将中央财政的盘子做大。由于分税制的实施，中央财政在做大的同时，削弱了地方财政的根基。为了稳定财政收入，地方政府将目光聚焦到土地上。事实表明，土地显然比税收更容易来钱，而且也不容易造成民意的反弹。在此基础上，地方政府通过土地拍卖的方式，再运用自己的“喉舌”鼓吹，地价也就顺应“官意”节节攀升了。

无论是中央财政的问题，还是地方财政的问题，地价上升是不争的事实。事实上，外资争抢中国“地王”的事并不多，大多数时候这些地被国企拿走了。郎咸平在谈论房价时，曾提到10个“地王”中有9个被国企瓜分了。其中，排名第一的杭州“地王”，每平方米的价格是46268元。拍卖的时候，同样先是小企业哄抬价格，等到总价上到35亿之后，就只剩下国企在举牌了。最终，中华集团下属的方兴投资地产公司以40亿元的价格成功拍下了这块地。郎咸平看过这家公司的财务报表，手中握有245亿元的银行信贷，40亿元对它来说并没有太大压力。最可怕的根源就在这里，这些国有企业几乎没有生存压力，只要不出现太大的经营问题，资金缺口随时可以通过政府或银行弥补。对它们来说，完全可以做到“只求最贵不求最好”。

如果说地方政府哄抬地价只不过会影响国内的收入分

配，那么外资入侵，则引起了民族主义者的反感。尤其是当人民币在国际压力下不断升值的时候，更是引诱了规模庞大的外资，热钱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2005年的时候，1美元还能兑换8.27元人民币，然而随后开始的汇率改革，人民币币值开始走上上升的轨道。到了今天，1美元已经只能兑换到6.39元人民币了。

境外资金正是看准了人民币和人民币资产升值趋势，才会疯狂地涌入中国。在当前的中国，真正有机会投资的就是股市和房地产。很显然，股市的风险是巨大的，投资机构或许能凭借自身的经验和强大的资本实力稳赚不赔，但对大部分投资者来说，房地产无疑是更有保障的投资选择。于是乎，我们看到大量的境外机构挟数十亿、上百亿的资金涌入上海、北京等地，迅速搅动了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强有力地刺激着原本就已疯狂的房价。

外资进入中国市场赌的就是人民币升值，如果不升值，外资就可能被套牢，逐渐被中国庞大的经济体系消融和吸收。但这是所有投资者和外国政府所不愿见的，因此我们才会看到国际舆论几乎一边倒地要求人民币升值。

房价的虚高当然少不了部分开发商的功劳。在大街上转悠，我们能轻易地发现很多楼盘销售的广告，但如果你找上门去，却会非常意外地发现，房子是有，但好房源没有了。销售员会很得意地告诉你，没开盘的时候那些最好的房源就被预订了。这就是楼市盛行的“认筹销售”模

式。所谓“认筹销售”，是指在楼盘正式开盘前，允许消费者提前认购。当然，认购可不是谁都允许的，不缴纳足够的认筹金，是不会有这么好的待遇的。

“认筹销售”是一种变相融资方式，既可以缓解开发商的资金压力，又能刺激房市，形成房源热销的现象。但这种销售模式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很多房地产交易纠纷皆源于此。通常，开发商会以优惠价吸引消费者提前支付“认筹金”，价格在几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然而，认筹期间开发商并没有确定房产价格，当正式开盘后，支付了“认筹金”的消费者往往得不到设想中的优惠，因而产生了纠纷。有时候，楼盘没有如期开盘，也会让预付了“认筹金”的消费者不满。但即便开发商全额退款，业已起到了短期融资的作用，而消费者却毫无利益可言。

【认筹销售】是房地产开发商的一种促销方式，在楼盘尚未开盘前，以优惠价吸引消费者提前交纳认筹金，获得优先购买权。

事实上，“认筹销售”还不仅是开发商谋利、推高房价那么简单，还可能涉及到违规。辽宁隆丰律师事务所律师王乃龙就表示，我国虽然有商品房预售许可制度，允许开发商进行预售，但是在获取预售许可证之前，开发商不能有任何销售行为。如此一来，开发商自行开展的“认筹”活动，就成了违规销售。

2011年5月18日，中央电视台《第一时间》栏目将镜头对准了房地产市场。节目透露，部分楼盘涉嫌与第三方机构联合违规办卡。通过双方联手运作，第三方机构帮助开发商达到既掌握客户资源又伺机涨价的双重目的。

对此，哈尔滨子涵律师事务所副主任马淑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擅自预售商品房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已收取的预付款百分之一下的罚款。”

这种变相销售行为虽然屡经曝光，却依然以多种形式存在于房地产市场，成为房价上升的重要推手之一。

除此之外，深不见底的民间资本、低息刺激的居民储蓄，也在不同程度上刺激了中国的房价。

►> 3. 楼市调控，政府靠谱吗？

没有人怀疑政府在楼市调控上的努力，早在 2005 年的时候，政府就拉开了政策调控的大幕，自那时起，各式调控政策和调控措施就源源不断地投入实践。

在 2005 年年初，国务院就颁布了旧“国八条”，提出要改善供给结构，控制住房需求。与之相配套的税收政策、金融政策也随即启动，房地产交易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对购入不足两年的房屋转让按收入全额征收营业税；同时提高住房贷款利率，建议取消期房预售制度。2006 年，政府加强新建住房结构调整，加快保障房建设，停止审批党政机关集资建房。与此同时，开始调整土地出让税费政策，严格保护耕地；部分房屋首付比例提高到三成，开始有意识地抑制外资购房；在税收方面，对 5 年内转让二手房征收盈利部分 20% 的个人所得税。

此后，经过 2008 年的短暂波动，楼市调控日益加强，虽然效果依然不够明显，但政府的态度足够坚决。尤其是

近年来,楼市调控进入白热化阶段,短短一年时间内,中央政府掀起了三轮调控高潮,有效地考验着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神经。

2010年4月17日,新“国十条”出台,这是迄今为止最为人们称道的调控政策之一。文件的主要内容体现在两个方面:要求对购买首套住房建筑面积在90平方米以上的用户,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30%;在商品住房价格过高、上涨过快、供应紧张的地区,商业银行可根据风险状况,暂停发放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贷款。此时,尚未对非本地居民贷款问题作出规定。这份文件最为人诟病之处在于,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问责措施。

2010年9月29日,“国五条”出台,在新“国十条”的基础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对部分政策进行了细化。内容主要包括:不分住房大小,一律要求商品住房贷款首付比例要达到30%及以上;不分地区,要求各商业银行一律暂停发放居民家庭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贷款;对不能提供一年以上当地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本地居民暂停发放购房贷款;对于房价过高、上涨过快、供应紧张的城市,要在一定时间内限定居民家庭购房套数。与此同时,也加强了调控政策的问责。文件明确要求地方政府未出台新政细则的要出细则,已经出台细则的要完善。

2011年1月26日,新“国八条”出台,内容主要包括:对贷款购买第二套住房的家庭,首付款比例不低于

60%，贷款利率不低于基准利率的 1.1 倍；拥有 1 套及以上住房的非当地户籍居民家庭、无法提供一定年限当地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当地户籍居民家庭，暂停在本行政区域内向其售房；各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和房价过高、上涨过快的城市，在一定时期内，要从严制定和执行住房限购措施；对于执行差别化住房信贷、税收政策不到位，房地产相关税收征管不力，以及个人住房信息系统建设滞后等问题，也纳入约谈问责范围。

这波调控可谓急风骤雨，让很多开发商谈“条”色变。但时过境迁，房价不仅没降，反而越升越高。就像本章开头提到的案例，都是近年发生的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反常的现象？很多人会不由自主地质问道。

其实，并不是因为现象反常，而是因为普通的消费者没有搞清楚政府调控的目标。消费者频频攻击高房价，对比 GDP 升得还快的房价深恶痛绝，而政府正是听到群众的呼声才实行楼市调控的。据此，消费者想当然地以为政府调控的目标是降低房价，让民众“居者有其房”。很显然，为维护社会稳定，政府当然不能让房价无限制地涨下去，但在目前形势下，政府的本意是一心想稳定房价。

政府调控楼市的真正目的是抑制房价过快增长。事实上，早在 2009 年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政府就调整了房地产市场的政策目标。在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的文字描述中，政府工作报告将“努力实现居

者有其屋的目标”改为“努力实现住有所居的目标”。如果能有效降低房价，当然就能实现“居者有其屋”；但如果仅仅是抑制房价过快增长的话，那么更现实的目标当然是“住有所居”了。

政府的意愿非常清晰，“居者有其屋”强调的是居住者对房屋的所有权，而“住有所居”指的是房屋的使用权。老百姓要想获得房屋的所有权，只能通过购买商品、经济适用房和限价房来实现；而如果要取得房屋的使用权的话，通过租赁市场就能实现了。两相对比，目标层次相差甚远。

开发商一度也对政府的调控政策心生警惕，但很快就明白了政府的用意。在2010年年底举办的“搜狐企业家论坛”上，原华远集团董事长任志强开篇明义：“今年1月10号有一个‘国十一条’，4月17号有个‘国十条’，9月29号有个‘国五条’，这是我们认为出台的连续三个房地产调控政策。我想问问哪个文件上写着让房价下降了？别老说让房价下降，国务院没提到让房价下降……文件上写得很清楚，要遏制部分城市房价上涨过快，只是说你涨得慢点就行了，没有说一定要下降。”

任志强说的一点儿也没错，无论是新‘国八条’还是新‘国十条’，的确找不到一条是涉及降价的政策，即便是遏制房价涨得过快的政策，也只不过是针对部分城市而已。舆论指责政府楼市调控政策无效，也有不少媒体跟着

起哄，但到头来才发现，楼市现状依然没有改变。

2011年三四月份，全国各城市纷纷公布全年房价调控目标。大部分城市将房价涨幅目标定在10%左右，部分城市表示房价涨幅将不超过GDP的涨幅，还有的城市表示将不超过去年的涨幅。有心人很快发现问题所在，政府要求各地公布的是房价目标，最终公布的却是房价涨幅目标。在这些城市中，真正提到降价的，只有首都北京。北京明确提出今年新建普通住房的价格与去年相比将稳中有降，这被认为是目前国内出台的最严格的房价控制目标。由此能够看出，房价在短期内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是不太现实的。

当然，政府也明白民众的不满，正因为此才会不断地推出调控新政。面对老百姓对各地政府公布的房价调控目标的不满，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很快作出反应，要求各地在确定年度新建住房价格控制目标时，必须在本地区内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使各地调控目标的制定科学合理，并能取得社会的认同和支持。对那些已经公布调控目标的城市，也要以适当的方式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并酌情调整已发布的调控目标。

与此同时，消费者还欣喜地在媒体上看到这样的文字：“发改委酝酿更严厉的楼市调控政策”、“中央的决心十分坚定，房价若异动，调控将进一步加码”。但根据多年的经验，这样的媒体“吹风”，只不过是给消费者一点心理安慰，让他们依然对房价下降抱有希望，即便失望

也不至于绝望。这就好像我们借了别人的钱，当对方索要时，你可以说明天还；第二天对方又来了，你可以说后天还。即便对方怀疑你的还款能力，但只要你还能说出还款的期限，对方通常不会咄咄逼人。因为对方知道，一旦逼急了，可能真的什么都没了。因此说，只要你让他还抱着能收回借款的希望，就不用担心对方和你翻脸。

政府现在就像借款不还的人一样，对买不起房的消费者心有愧疚，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又不能强行将房价降下来，只能采取这种方式，勉强维持着楼市的平衡。

楼市调控政策会再掀风暴吗？如果“国十条”和“国八条”算得上是风暴，那么风暴肯定还会来，而且可能会更加猛烈些。

►► 4. 房地产泡沫，还能 Hold 多久？

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在一期电视节目中曾举过这样的例子：海南三亚的海景别墅售价高达 450 万美元，这笔钱在美国可以买下乔治·布什的农场，在欧洲可以买下一座古堡。而在西班牙 30 万欧元就能买下一套豪华海景别墅；在希腊，花上 70 万欧元就能买到一套悬崖上的独栋别墅。人均 GDP 只排在全球第 95 位的中国，房价在全球都是排得上号的。两相对比，就能让普通人看出差别来。

所谓房地产泡沫，简而言之，就是指房地产价格在一段时期内持续上涨，并有力地刺激着消费者的预期。随着价格的不断上涨和投机资本的介入，房地产的价格远远高出自身的价值或实体价格，由此产生了房地产泡沫。房地产泡沫的产生，一方面会造成高空置率，另一方面泡沫破灭后会引发价格暴跌，甚至危害到一个国家的经济稳定。可以预见，这种泡沫或早或晚会破灭的。

那么，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存在泡沫吗？

美国对冲基金专家查诺斯，因准确预见安然公司倒闭而闻名于世，他在《纽约时报》一篇《卖空中国》的报道中声称“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比迪拜严重 1000 倍”。查诺斯显然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国内有经济学家认为泡沫不止千倍。而在《福布斯》杂志评选的全球七大近在眼前的金融泡沫中，黄金市场位居首位，排名之二的就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福布斯》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是因为它认为中国政府负担的债务约等于 GDP 的 70%，远远超过了美国政府所承担债务的 50%。

美国对中国的关注是可以理解的，虽然它并不希望中国经济持续高涨，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崩溃同样会危及到美国。美国的《商业周刊》同样警告中国，美国房产泡沫曾经引发了大量的问题，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一旦破灭，后果将不堪设想。

喜欢比较研究的人士已经发现，中国房地产当前的走势与 20 世纪日本房地产市场崩盘前的状况颇为相似。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实施借贷成本接近于零和支持浪费性投资的金融政策，取得了显著的效果。然而，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很快就迎来恶果，导致日本 20 余年间经济基本停滞甚至倒退。当前，我国借贷成本虽然不低，但浪费性投资并不少见。不少经济学家指出，中国财政支出大部分投在了基础设施上，只有很小一部分用在民生消费领域，由此造成了产能过剩，形成浪费

性投资。如果中国走上日本的老路，同样经历 20 年经济停滞的话，以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能否支撑过去实在是难以预料的事情。要知道，日本在崩盘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然而，无论是国内外学术界、媒体和舆论如何谈论泡沫破灭的可能，政府方面却还在为是否存在泡沫辩解。在 2010 年的一次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领导表示，经济学里的“泡沫”术语，是资产价格和价值相背离。中国房地产是否存在泡沫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很难一句话说清楚。

此语一出，舆论哗然。虽然说单纯的房价比较没有实质性意义，但是否存在房产泡沫并不是没有衡量指标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非理性繁荣》一书的作者罗伯特·希勒教授表示，考察房地产市场是否存在泡沫，应该考察房价跟收入的比值。当然，还包括房价和租金的比值等。

统计数据显示，当前我国房产价格是一般城市居民家庭收入的 15 倍，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比重通常不会超过 5.5 倍。以北京为例，2009 年职工平均月工资只有 4000 元，但北京五环以及五环以内的平均价格每平方米超过了 3 万元。

由此可见，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已经达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烫手的房价，使房地产市

场就像一座火山，如果放任不管，迟早会狂喷而出；如果强行将其捂住的话，就像在火山口上增加了一个障碍，只能使其积蓄更多的能量，以另一种方式出其不意地爆发。

2011年初，经济学家茅于軾在接受采访时说：“房价这么高，并不是大家真正想住这个房子，而是大家觉得房价还会涨，将来卖了还能赚钱。这其实是一种投机的行为。投机量大时就会把正常的供给需求给扰乱了，这种情况如果太多了就是一个泡沫。现在空房已经这么多了，有没有可能把泡沫消化掉？第一条路是把空房消化掉，第二条路是泡沫破灭。”

茅于軾的说法揭示了中国房地产虚热的实质，房价持续上涨是人们的预期造成的，并不是因为实际的需求太旺。在我国取消福利分房后，有一则故事颇为经典。内容大体如此：

美丽的天堂，两位老太太不期而遇，一位来自急速发展的中国，一位来自超级发达的美国。两人脸上都洋溢着笑意，看起来对前生都很满意。中国老太太幸福地说：“我攒了30年钱，晚年终于买了一套大房子。”而美国老太太也幸福地说：“我住了30年的大房子，晚年终于还清了全部贷款。”

这则故事浅显易懂，却显示了中国人和美国人消费习

【超前消费】是指消费者在不具备消费某种商品或某项服务的经济实力的情况下，通过赊购、分期付款或贷款购买等方式实现消费。在可控条件下，超前消费能够刺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但如果超前消费失去控制，就可能导致金融危机。2008年肇始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

惯的不同。中国人不习惯负债生活，在债务的阴影下，内心很难获得平静。然而，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传统的消费方式似乎落后了。比如说住房，按照中国传统的消费习惯，大部分家庭要等到快退休或者退休后才能买得起住房。这则故事告诉中国人，我们可以换一个活法，像美国人那样先拿回房子，然后再慢慢还钱。这就是超前消费，也是中国人成为房奴的开始。

超前消费对不对？这显然不能说是一种错误的消费选择。但我们应该注意，超前消费应该有度，一旦过度，就会出现问題。

上面这则故事还有后续版本，背景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据美国房地产跟踪公司统计，2006年年底的时候，美国人因为还不起贷款被收回房产22.4万套，但到了2008年10月份，这一数据上涨到了82万套。如果故事中的老太太在世的话，很可能会不幸成为其中的一员。作为一个单身老太太，其凄凉的晚景让人担心。

从促进消费的角度来看，超前消费无疑是刺激经济增长的良方。但超前消费必须基于现实的基础，一旦超出个体能够承受的范围，就会形成泡沫。泡沫本身看起来五光十色，亮丽异常，但破灭后就会对经济体产生严重的冲击。美国房地产的次贷危机能够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现实案例。

事实上，中国房地产市场有极为旺盛的需求，不仅因

为包含超前消费的因素，还因为受到投资甚至投机资金的影响。据中国城市楼宇电表数据的统计显示，2010年连续6个月以上电表读数为零的空置房超过6500万套。毋庸置疑，其中大部分都是投资性或投机性购房。

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如果房价继续上涨，这些空置房可能会继续作为投资而受到控制，其中有一部分会转移到真正需要住房的人手中，但会有更多的新空房推高空置率；而如果房价大幅下跌且在可见的时间内不能止跌回升的话，这些空置房可能真正住满，但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经济问题，能否令中国经济承受住很难说。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想让这些空置房都有人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按照茅于軾的说法，剩下的唯一方法就是泡沫破灭，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但到底什么时候破灭，没有人能说得清楚。茅于軾也表示自己无法确定。有网友说：“房价到底能撑多久，没有人知道，自称知道的要么是忽悠你的，要么就是白痴！”

话虽然粗鲁，说的却是事实。就像经济学家预测中国GDP的增长率一样，中国房地产泡沫会不会破灭、什么时候破灭是很难预测的。这是因为，房地产泡沫到底什么时候破灭，在短期内并不完全由市场决定。

有经济学家认为，房地产泡沫虽然让中国经济始终处于火山口上，但那还只是属于未来的风险，如果泡沫破了，现在就将面临危险。郎咸平认为，中国当前的产能严

重过剩，只剩下房地产市场还有强劲需求。在他看来，房地产产业是中国最后一个支柱产业。如果政府打压房价成功，房价降下来的话，整个经济体系可能受到重创。

郎咸平的观点有点夸张，但却道出了房价在政府调控下始终没有实质性下降的原因。早在 2009 年的时候，房地产对 GDP 的贡献率就超过了 13%。一个国家的经济需要支柱产业，但房地产作为我国支柱产业对 GDP 的影响太大了。纵观全球，很少有一国的房地产市场能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13%。正因为此，有人甚至说“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

很显然，如果政府强行打压房价的话，会对中国经济产生严重的影响，在短期内会导致 GDP 大幅下降。这在当前以保持物价相对稳定为首要经济目标的宏观政策大背景下，也是不可行的。

有鉴于此，一旦政府认定再不破灭就会出现崩盘的风险，泡沫自然就破灭了。否则，泡沫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依然美得炫目。

Part 6

第六章

通货膨胀在捣谁的乱？

● 所谓通货膨胀，简单点说，就是一国流通的货币量超过了实际需要的货币量，引起货币贬值、物价上涨。经济学家们喜欢用“孤岛经济”故事来解释这一现象：

刚开始，岛上的经济很简单，没有对外贸易，流通的货币只需要 100 万个单位。后来，一位外来游客了解到黄金饰品的重要性，就向当地人宣传黄金的贵重。他首先带头在岛上寻找并开采黄金，为自己开采到的黄金标价 50 万，岛上最富有的人也只有向银行贷款才买得起。但银行也没有这么多的现金，只能打开印钞机加印。富翁如愿买到了黄金，却生怕黄金被小偷偷走，就将其藏了起来。数年后，岛上的货币已经多了 50 万个单位，黄金也不再流通了，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就超过了实物资产的价值。结果就是，其他物品的价格全部上涨了。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 1. “买不起”与“卖不动”

王强拿出瘪瘪的钱包，看着里面的几十元散钞，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再这样下去只能回老家了。”

王强是湖北人，高中毕业后跟着老乡在建筑工地上混了几年，后来跟着一位老乡来到北京，在一家高校做瓦工，工作轻松了不少，每年也能存下点钱。干了一年后，他让老婆和6岁的孩子也过来了。然而，他很快就发现这一决策是多么错误，原本每个月都有结余的工资，不知为什么忽然就不够用了。

“儿子，去买半斤肉。别扣钱买零食了，要不然看我怎么收拾你……”

儿子没有其他缺点，就是喜欢从家里拿点零钱，或者在帮忙买东西的时候少买点，顺便买点零食。平时也就算了，这个月的生活费所剩无几，可禁不住折腾。

“嗯！”

儿子王小强应了声，高高兴兴地走了。十分钟后，王小强回来了，手里提着一小块肉。

王强随手接过肉往菜板上一放，拿起刀刚要切，却发现肉只有小小的一块，估计也就是三两多。原本就很烦躁的王强火气腾腾地就上来了。他将刀一放，大步走出厨房，来到正在玩玩具的小强身边，一把将他提了起来。

“我让你馋嘴！我让你馋嘴！”巴掌结实地落在了王小强屁股上。

“我没有！我没有！”

听着儿子的狡辩，王强的火气更大了。

“干什么呢，又打儿子了？”

正在这时，小强的妈妈回来了。

“你还敢买肉啊，都快二十元一斤了，把我的肉割下来去卖，估计也值不了这个钱。”小强妈妈一边脱外套，一边不停地唠叨着。

王强一愣：“二十元一斤？”

“是啊，我刚才在路上听着几个老太太议论的。”

王强一听，不由得鼻子一酸，赶紧将儿子扶起来，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差不多一个月没沾猪肉了，没想到价格涨了这么多，居然冤枉了自己的儿子。

价格上涨是近几年的热点，从2007年开始，我国的物价开始猛涨，尤其是消费类物品的价格，猪肉价格涨

了，蔬菜价格涨了，食用油的价格也涨了，除了工业类消费品，好像没有不涨的。按理说，由于土地资源的有限性，农产品的价格上涨是正常的，但当价格一个月就涨了一半甚至翻倍长的时候，靠工资生存的老百姓就支撑不住了。2007年上半年，猪肉价格上涨了55.8%，引起了政府高层的严重关切。然而，价格上涨并没有就此止步，经过三年多的冲击，猪肉价格直逼20元/斤大关。猪肉价超过牛肉价，从全国范围来说，这可能是史无前例的事了。

肉价上涨的结果是，老百姓连呼：“买不起！”，肉摊则高叫：“卖不动！”这显然是一对矛盾。当老百姓在为最常用的日常消费品价格犯愁的时候，应该说经济运行肯定在某个环节上出了问题。

当然，并不是只有猪肉的价格在涨。诙谐的老百姓还创造了几个新词来形容各种物价的上涨：“糖高宗”，说的是糖价太高了；“蒜你狠”，是指大蒜价格涨得离谱了；“盐如玉”，这个几乎是无人不知了。其他的还有“豆你玩”、“姜你军”、“玉米疯”，当我们惊叹老百姓的才智时，又不得不为其中掺杂的郁闷而叹息。

以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农产品为例，看看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基本原因。按照通常的经济学常识，价格上涨往往是由于供给不足和需求旺盛引起的。从这一点来看，农产品价格上涨是有道理的。以2010年为例，世界各地遭受了较大范围的自然灾害的侵袭，导致全球农产品供应显著

减少。而从整体趋势上来看，由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业用地也变得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原本的农产品出口大国纷纷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尤其是减少了粮食的出口，导致国际粮食价格居高不下。当年，受持续干旱的影响，俄罗斯部分森林发生火灾，导致粮食减产了将近四分之一。随即，俄罗斯宣布暂停谷物出口。我国西南部地区同样由于大旱影响，盛产甘蔗的广西深受影响，甘蔗受灾面积高达 400 万亩，严重影响了食糖的出口。

在供给减少的同时，农产品的需求却日益旺盛。在全球人口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农产品的需求量有增无减。据联合国粮农组织预测，截止 2050 年，全球人口将再增 30 亿人左右，而粮食需求将增长 70%。一方面是有效供给的减少，另一方面是需求的持续增长，供需缺口理所当然地日益扩大。如此一来，农产品的价格只能是节节攀升了。

当然，供需失衡只是导致农产品价格上升的基础原因，短期内的流动性货币过多、投机性热钱侵袭、收入与成本增长拉动等因素，也是影响农产品价格的重要因素。

近几年来，我国最热门的话题就是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连普通老百姓都懂得了经济学术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而在 2010 年的流行语排行榜上，“物价”和“物价上涨”是出现最为频繁的词汇。面对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CPI 数值，老百姓并不买账，因为在他们看来物价

上涨的幅度要远大于官方所公布的。

那么为什么物价指数会和大家预估相差那么大呢？原因就在于在计算 CPI 的过程中，政府采取的是一揽子物价统计方式。也就是说，一般人认为价格变动很大的物品，可能并不在政府统计的范围内。而那些并不经常消费的物品，反而在统计范围之内。最为巧合的是，这件物品价格变动幅度并不大，这样一来物价指数当然不会太高。比如说房价涨幅很大，但其实并不在统计范围之内，政府统计的是房租；石油价格涨幅也很大，但因为属于能源，同样也不一定在统计范围之内。说到这里你可能就明白了，原来你最关心的东西统计局都没有统计，而碰巧这都是价格上涨幅度很大、老百姓感受最强烈的消费品。

所以说，统计局并没有作假，只不过人们不清楚 CPI 的统计过程和统计类别。这么多的商品，不可能一项不落地全部统计在内。

最让老百姓难以接受的是，中国的物价居然会比很多发达国家还高。以电影票房消费来说，很多人指责中国消费水平低、中国人不喜欢消费，但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并不是中国人不喜欢去电影院看电影，而是票价实在太贵了。1982 年，去电影院看一场最经典的《少林寺》，只要掏 1 毛钱就可以买一张电影票。2007 年，《变形金刚》在中国上映，票价已经飙升到 80 元/张，25 年间翻了 800 倍；而 2011 年，《变形金刚 3》和《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

(下)》则已经出现了 150 元/张的高额票价，29 年间居然翻了 1500 倍。而 3D 版的《变形金刚 3》在美国的票价为 15 美元/张（约合人民币 96 元/张），在韩国这样的票价折合成人民币约为 100 元/张。

这也就是说，中国影院的票价比美国和韩国都要贵。再考虑到中国与发达国家收入水平的差距，我们就会理解中国人的消费水平为什么那么低了。据说，2007 年美国平均每人在影院看 6 部电影，而我国平均每人在影院仅看 0.1 部电影。这样的消费水平的确太低了，但再看一组数据，我们就不会感到惊讶了。数据显示，美国电影票价仅相当于人均月收入的 1/400；同样的票价在韩国相当于人均月收入的 1/350，在我国相当于人均月收入的 1/20。按照这一比例来计算，中国的电影院票价比美国整整贵了 20 倍，比韩国贵了 17.5 倍。

所以说，那些将中国消费水平低归之于中国人不喜欢消费的人，实在是太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了。中华民族虽然是一个崇尚节俭的民族，但中国人从来不轻视娱乐和审美活动，这方面的精神文化消费水平一直比较低，只不过是受制于物价和当前的消费水平。

只要中国的物价还在涨，中国人民的收入水平没有质的提高，中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就永远不会有提升。

►> 2. 谁偷走了你的存款？

很多靠自己努力买房子的年轻人，都会列一个详细的账单，以保证每个月能存下一笔钱。但让他们惊讶的是，虽然几年来工资涨了不少，但每个月存下的钱并没有增多。后来大家都知道了，原来是通货膨胀惹的祸。更让人忧心的是，银行的存款贬值了，即便工资的上涨幅度能够抵消物价上涨，但银行存款的利息却低于CPI，这意味着我们在辛苦工作的同时，不仅可能没有增加存款，反而可能减少储蓄。

财富当然不会平白无故地流失，既然有人财富减少了，必然有人财富增加了。那么，在通货膨胀中，究竟谁损失了财富，谁又捞到了好处呢？

张波和王浩是亲如兄弟的好朋友，但最近却因为一笔借款翻脸了。事情是这样的：两个人大学毕业后分在了同一个单位，为了能够买上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一起努力

工作着。后来，王浩要结婚了，为了买婚房，他向张波借了15万元，加上自己的15万元存款，刚好够首付。张波很痛快地借给了王浩，两人还约定，接下来要继续努力，尽快为张波赚回首付。

3年后，张波终于也要结婚了，王浩没有丝毫迟疑，很快就从银行取了15万元还给张波。但张波发现，原本30万元能够支付100平方米新房的首付，但现在却只能支付50平方米新房的首付。张波并没有意识到存在什么问题，只不过他看中的就是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因此有点闷闷不乐。

晚上回到家里，张波和女朋友谈起这个问题，精明的女朋友告诉他，三年前的15万元，按物价指数折算后，现在最起码应该有20万元了。也就是说他借给王浩的钱，因为三年的时间跨度而贬值了5万元，而这5万元本来应该是由王浩承担的。女朋友让张波和王浩好好谈谈。

张波当然不同意女朋友的建议，但他答应再向王浩借一点钱，争取凑够首付。然而，原本手头应该还有富余的王浩，居然拒绝了张波。张波没想到王浩居然会这样，原本就有点烦躁的他忍不住说道：“要不是借钱给你，我现在也能住着100平方米的房子。因为借钱给你，我现在要多花一倍的钱。”

随即，两位好朋友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两个人或许没有意识到，引起他们争吵的原因其实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宏观经济学的鼻祖凯恩斯在他的经典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说：“在高通货膨胀时期，欠债人是受益人。”如果懂得这个道理，就能明白张波在借款给王浩期间的损失了。

在现实中，借钱给别人的人其实就是银行的存款人，而借钱的人就是贷款人。有的人不明白：“我从来没有将钱借给别人用啊……”这是他没有意识到，他存在银行的钱，已经被银行借出去了。当通货膨胀发生的时候，财富就从存款人手中转移到了贷款人手中。

让人遗憾的是，存款的人不是富人，而更多的是穷人。这些人因为手中的钱很少，不足以用来投资，所以只能将有限的钱存在银行。原本他们指望用这些存款买房、养老，帮儿子娶媳妇，没想到辛苦挣来的财富却无缘无故地流失了。而那些贷款的人，并不是穷人，因为他们贷款是为了开办公司、扩大再生产，正是这些人吸纳了穷人转移的财富。

说句良心话，我们并没有理由指责富人，因为并不是他们造成了通货膨胀，很多企业家同样反对通货膨胀。其实，在通货膨胀中，由于普通消费品的价格不断上涨，而很多工业品的价格却在持续下跌，这些企业家的日子也并不好过。这也就是说，财富通过银行转移到富人这个群体，但并不是所有的富人都能获益。

在这里我们又不得不提到房地产，因为房地产开发商也是富人，而且是在通货膨胀中获益最多的富人。众所周知，房地产开发商一直是银行贷款的主力军，近几年来，房地产贷款约占中国银行贷款总额的 20% 左右。这就是说，中国银行差不多五分之一的钱都在房地产开发商手中。当通货膨胀来临时，银行可能亏本，但房地产商肯定是笑到最后的人。由于通货膨胀，相当于实际上要还的款少了，而凭借贷款盖起的房子却涨了。天下可能再没有比这更便宜的事了。

当然，在借款人中，我们还会看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连官方都搞不清楚地方融资平台到底融了多少资。2010 年，有媒体人士根据《2010 年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提到的“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占当地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的比例基本不超过 30%”，推算出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总量为 14 万亿元左右。虽然央行随即予以公开否认，但即便打个对折，贷款总额数目之大也足以让人触目惊心了。

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 2011 年 6 月底，中国外汇储备已经达到 3.2 万亿美元。这也就是说，美国差不多欠了中国 3.2 万亿美元的债务。通货膨胀发生的时候，存款的人替贷款的人买单，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如此，中国也要为美国买单。如果再考虑到美元贬值等因素，中国无疑是亏大了。

【外汇储备】是指一国政府所持有的国际储备资产中的外汇部分，即一国政府保有的以外币表示的债权。外汇储备包括现钞、国外银行存款、国外有价证券等。

这么简单的道理，央行当然不会不明白，中国政府也不会心中无数。但国内的通货膨胀是自己的事，如果自己管不了，能去怨别人吗？

那么，通货膨胀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是印钞机的错吗？

►► 3. 钱袋缩水，缘于货币滥发？

为了更清晰地分析通货膨胀的原因，我们可以假设：中国市场上只有一种商品，比如说 100 公斤大米。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是 200 元。那么大米的价格就是 2 元/公斤。

第一种情况下，大米的数量没变，但央行再发行 100 元纸币，那么大米的价格就变成了 3 元/公斤；第二种情况下，市场上流通的货币数量没变，但有一半的大米出口到国外了。

第二种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因为 50 公斤大米出口到国外，按照国内价格和现行汇率折算的话，可以换回大约 16 美元。按照我国出口结汇制度，央行就要开动印钞机印刷与 16 美元等额的人民币，也就是 100 元左右。这样一来，中国市场上的大米就只剩下 50 公斤，而人民币却多出了 100 元，变成了 300 元，大米的价格也就变成了 6 元/公斤。

不懂经济学的人第一次看到这组数据的话，肯定会目

瞪口呆，谁能想到对外出口居然会引起国内通货膨胀呢？要知道，每当在媒体上看到中国出口创汇了数亿美元的时候，充满爱国情怀的老百姓可都是欢呼雀跃的。原来是我们搞错了，出口创汇并不意味着国家利益的增多，更意味着百姓利益的增多。

从这个简单的案例能够看出，当通货膨胀发生的时候，要么是流通的纸币太多了，要么是市场上的商品太少了。

那么中国的通货膨胀是因为人民币“滥发”了吗？与此有关，但绝非唯一原因。一位经济学家就曾说过：“金融危机以后，中国采取比美国力度更大的救市政策，信贷增长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2009年，信贷增长高于前三年总和。尽管2010年有所收缩，但新增贷款仍是2007年的两倍以上。当大量信贷从银行体系流出时，必然会推动国内商品价格快速上涨。这种推动，先是表现为2009年国内资产价格快速上涨，无论是股市还是房市，都是如此，然后，逐渐传导到消费品的价格上去。”

然而，人民币“滥发”只不过是导致通货膨胀的部分原因，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国家的“出口创汇”、“出口保就业”和“出口结汇”等政策导向。事实上，美元滥发的程度远甚于人民币，但美国依然没有出现中国这样的通货膨胀。美元面世已经100多年了，作为最基本货币单位的美分在美国市场依然畅通无阻；反观中国，改革开放仅

仅 30 多年，但作为人民币最基本单位的“分”差不多已完全退出流通领域了，虽然在一些大城市的超市里偶尔还会用到。对比下，就不难看出我国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的程度了。

多年来，我国一直有着出口依赖症，生怕因为出口影响外汇储备和国内就业，尤其是“出口保就业”，一直是各级政府的政策导向。然而，由于产业结构水平较低，廉价出口并没有给中国经济以显著拉动。就像网上盛传的：8000 万件中国制造的衬衣换来一架美国的波音飞机，4000 元人民币换一吨美国的“泡泡水”（可口可乐）。很显然，在国内产业结构失调的情况下，无节制和不合理的出口对中国经济发展没有多大贡献。

在出口导向的经济政策下，在大量消耗国内有限资源的情况下，我国每年向美国等国家出口大量的廉价产品。按照中国的出口结汇制度，出口商向国外销售商品获得的美元，需要按照汇率从央行兑换人民币。目前，我国外汇储备已经达到 3.2 万亿美元，按照出口结汇制度和当前的汇率，这就意味着央行要为此印刷 20 万亿元人民币。正如上面分析的，中国市场上减少了 20 万亿元的商品，却多了 20 万亿流通的人民币，两种因素的叠加影响，大幅推动了中国的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反观美国，不仅从中国进口了大量廉价商品、增加了国内的实物总量，而且还让一部分美元流入中国。这样一

来，美国市场上的实物总量增加了，但流通的货币减少了，物价也就理所当然地下降了。

事实上，美国还有更绝的一招：在美元流出后，它还可以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从中国又收回了自己的美元。而这部分美元，则被美国政府继续用于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从而进一步降低了其商品的价格。

2011年年初，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表示，到2010年年底中国外汇储备累计为2.85万亿美元，中国央行抛出了近20万亿元人民币来对冲。他承认，正是因为中国贸易顺差太大，才导致了国内的通货膨胀。显然，易纲对通货膨胀的原因了解得并不比大部分经济学家差。在进行逻辑分析时，他明确表示，贸易顺差过大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较大，为了保持汇率相对稳定，央行只能购回美元，从而被迫打开了印钞机。流通货币的增加引起通货膨胀，也造成了物价的上涨。

易纲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已经掉入一个“怪圈”：美国开动机器疯狂印制钞票，用于购买中国的商品；大量美元源源不断流入中国，央行购买外汇，外汇储备持续增加；外汇储备投资美国资产，但投资经营和保值增值难度越来越大；而零利率则意味着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很低。

这样的“怪圈”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中美财政和贸易政策双重导向的结果。要想改变这种现状，我们就

必须改变思路，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更多从内需和民生必需品投资上寻找经济增长的动因。这样，即使我们还不能消化手头的 3.2 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也起码能保证外汇储备不会增加了。

需要注意的是，税收也是导致我国物价很高的因素之一。有数据显示，中国消费类产品的税收偏高，部分商品的税收占产品价格的比重居然超过了 60%。这就是说，消费者每购买 100 元的产品，就有 60 元是在购买税收，而产品的实际价格应该是 40 元。这是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比例，如此高的税收，物价怎会降低？

那么，仅仅是中国政府在滥发货币吗？不是的。欧洲国家和美国也避免不了这一现象。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时候，英国反应迅速，推出了高达千亿英镑的金融救援计划，并在二级市场购买中长期英国国债，有效地增加了市场上的货币流量。美国更是财大气粗，素有“直升机”之称的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扬言要“从直升机上撒钱”。伯南克并不是在忽悠各国，整个 2008 年，美国一共投入了 8.5 万亿美元救市，远远超出了中国 4 万亿元人民币。这还不是全部，2008 年 10 月，美国国会又通过了 8500 亿美元的金融救援计划。

截至 2009 年 7 月，美国方面透露，美国纳税人为拯救经济危机已经付出了 23.7 万亿美元的代价。与之相比，我国的救市资金只不过是个零头而已。然而，美国似乎

并没有为此遭遇比中国更厉害的通货膨胀，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美元长期以来是世界货币，有较好的信誉度和广阔的流通范围。另外，美国政府有较为丰富的金融救市经验。

通货膨胀是由钞票的全体持有者分担的，与人民币主要在国内流通不同，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在国际市场上大量流通，很多政府将美元作为外汇储备，全球所有的美元持有者都共同承担了美联储狂印美元的成本。同时，美国还是一个进口大国，中国等国家对美国大量的廉价出口，也在很大程度上压低了美国商品的价格。另一方面，中国看似美好的贸易顺差导致大量外汇流入，中国市场的人民币更多，而美国市场的美元更少，在货币乘数效应的影响下，结果就成了这样：中国市场流通的人民币无节制增多，而美国市场虽然增发了大量的美元，在美国本土市场流通的美元却没有明显增加。即便有限地增加，增加的那部分也主要滞留在流动性不足的金融市场。

中国原本为了经济安全选择持有看似稳定的美元，但在通货膨胀盛行的今天，持有任何一种货币都会承担相应风险。曾几何时，我们为贸易顺差而欣喜，为成为美国的债权人而自得，却浑然没有意识到落入了美国人的陷阱，成了分担美国人通货膨胀的“冤大头”。当前，最关键的是要为外汇储备确定一个合理的数额，并力争在外汇储备保值增值上有所作为。

当经济面临压力时，打开印钞机是世界各国的普遍选择，但我们必须明白，印钞必须有一系列配套措施来缓解由此引发的通胀可能，而不是等钞票印出来后才坐等人民币升值。

►> 4. “热钱”，最狡猾的捣乱分子？

中国经济的问题当然很多：房价高得离谱，消费品价格上涨的幅度更是让老百姓难以接受，通货膨胀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但我们还是得承认，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经济的总体发展是好的，人民的生活质量的确得到了很大改善。

然而，中国人民创造了财富和赚取财富的机会，却很少有人能把握住这样的机会，甚至很多人还没有认识到这样的机会。经济早就全球化了，中国经济在经历一个阶段的高速发展后，来不及“养精蓄锐”就得迎接全球市场的考验。这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瞄准中国的原因，这也是国际投机者和热钱青睐中国的原因。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在任何国家流通中的，并使土地和劳动所产生的产品借以流通并分配给适当的消费者的金银货币，都是死的存量。货币是一个国家资本中很有价值的一部分，但不给国家生产任何东西。银行

【热钱】是指为追求高额回报率而在市场上迅速流动的短期投机性资金。热钱与正当投资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的唯一目的就是为赚钱，既不会生产商品、提供服务，也不会创造就业机会。在可控范围内，热钱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经济的发展，但如果热钱数量太大的话，会导致一个产业、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失控。据统计，从 2001 年至 2010 年的 10 年间，流入中国的热钱平均为每年 250 亿美元，接近中国同期外汇储备的 1/10。

明智地用纸币代替大量金银，使得国家能将大量这种死的存量变为积极的生产性存量。在任何国家流通的金银可以恰当地比作公路……提供了一种空中通衢。”

“空中通衢”这个比喻极为生动，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钞票早就飞跃了国界，在全球各地寻找升值的机会。事实上，国外的热钱和来自国内外的投机资金也是推动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的黑手之一。中国经济的蛋糕，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外投机资本来品尝分享。

投机资本和普通的投资不同，它是以商品或资产的价格波动为条件，通过价差来谋利。从经济常识来看，价格是由供需决定的，但需要考虑的是，价格预期同样会对现实的价格产生较大的影响。投机资本就是基于几个预期选择商品或资本的，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会让商品的价格偏离原有的价值。如果投机资本预期某种商品的价格会上涨，就会吸引大量的投机资本进入该商品市场，通过买卖的差价获取利益。在这种预期的影响下，商品的需求量急速增加，从而导致物价上升。

一旦投机资本超越商品和资本的限制，就会形成虚拟经济。就像金融衍生品一样，虚拟经济体系会以泡沫的形式呈现出来，成为经济体上的脓包，并随时有破灭的危险。

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为例，投机资本预测到市场极可能出现通胀现象后，就会争先恐后地进军房地产市场。投机资本的动向会在一定程度上吸引那些非投机资本，包括

大量的民间资本，因此很容易就将通胀预期转化成通胀现实。

对国内外投机资本来说，中国经济的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很多企业家羡慕改革开放初期的创业者，因为他们好像轻易就能一夜暴富。但是，这些羡慕者们没有意识到，那些早期创业者们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受益于当时不健全的市场环境和经济体系。即便今天，中国市场经济依然不够完善，那些在国际市场摸爬滚打了数十年的投机资本，很轻松地就能在中国市场上寻找到升值的机会。可以说，高速增长 GDP 是投机资本青睐的对象，而不够完善和健全的市场机制，则为投机资本提供了进入的条件。

“只有在这里，随便朝哪个地方打一枪，都能收获一排鹿。也就是说，如果近 30 年来你只需抓住个体户热、倒卖批文热、下海热、房地产热、互联网热中的任何一个，你都会成为时代弄潮儿。或者，你只需在新股上市之时买 1000 块钱的深万科，或者在一线大城市的核心地段买一套小房子，捂住并等待，时至今日你都可以衣食无忧。”

这是因制作中国富豪榜而闻名的胡润先生在上海居住一年后给父亲写的信的内容。这位精明的英国人早在 2000 年的时候就发现了中国的价值，正是在“胡润”们的示范下，才引得一批又一批淘金者从全球各地奔向中国，寻找投机的机会。

资本的本性就是逐利，这是无法改变的。在全球经济增长趋缓，尤其是在金融危机期间，很多发达国家的经济都是零增长和负增长，只有中国经济逆势反弹，成了全球热钱和游资青睐的香饽饽。

让我们看看金融危机期间和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的表现，就能明白国际投机者并不是无的放矢。媒体披露的数据显示：全球房地产市场尚未触底反弹的时候，中国楼市已经回暖了大半年；2009年上半年，欧美汽车销量下跌了三成，而中国市场则上涨了15%；在股市同样如此，早在2008年11月份，我国股市就率先止跌回升。即便没有GDP连续数年8%以上的增长率，以中国经济面对金融危机如此优异的表现，也足以引起国际资本的关注了。

千万别小瞧国外的游资和热钱，单个的投机者似乎无足轻重，但当大量的投机者集体行动时，带给中国经济的就可能会是灾难。与国外热钱相伴的，还有国内的民间投机资本。中国居民储蓄高达30万亿，企业储蓄也有20万亿左右，这还不包括没存在银行的民间资本。据说很多民间炒家为了方便运作，选择将钱窖藏起来，而不是存到银行。这些国家无法统计的民间资本，在推动物价上涨过程中的作用同样无法小觑。

热钱本身并不可恶，当投入市场后，可以增加货币流通量，按照正常的经济学逻辑，最终可以降低物价。但是，热钱的可恶之处在于其投机性，往往是来如疾风退如

潮汐。当中国的某一产业受到热捧时，国内外投机资本就会蜂拥而至，导致某一产品的需求急速上升，从而迅速抬高物价。

从2009年6月起，在农产品市场一直不显山不露水的大蒜，居然露出了峥嵘。原本每公斤才几毛钱的大蒜，一度上涨到十几元。正是从那时候起，“蒜你狠”这一词汇风靡网络。

2010年，在“蒜你狠”之后，又出现了一个新词“豆你玩”。2009年年中的时候，绿豆的价格还在6元/公斤左右，1年后，居然涨到了13元/公斤。

从前两年中国主要产蒜和产绿豆地区的气候来看，也没有发生能够严重影响产量的自然灾害。这就是说，大蒜和绿豆的供需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反向变动，那么价格如此大幅度的上涨就只能是由投机资本引起的。相比于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农产品市场更容易受热钱的影响。以大蒜为例，年产量在100万吨左右，价位低的时候才三四毛钱一斤。以这样的价格和产量，市场上只要进入几亿元热钱，就能撬动市场，进入几十个亿的话，就能控制市场了。

然而，热钱并不是长期投资，而是短期投机。这种短期投资不仅会让农产品出现通货膨胀，而且会影响农民对来年产量的判断，祸及长期。2011年6月份，北京市场上大蒜批发价在3元/公斤左右，而2010年同期，这一价格是15.5元/公斤左右。因为2010年大蒜价格持续上涨，居

高不下，农民提升了对大蒜市场的预期，几年间大蒜的种植面积增长了将近 30%，统计显示，全国大蒜总产量增长了近 40%。

但不懂经济学的农民当然想不到，2010 年农产品之所以持续上涨是因为热钱捧场，等他们想抓住机会增加产量的时候，热钱大部分已经选择战略撤退了，大蒜市场恢复了常态。但是在增产的情况下，大蒜市场的供给明显超过了需求，价格只能急速下跌。据媒体报道，有“大蒜之乡”之称的山东省金乡县，6 月份的收购价为 2.6 元/公斤，而种植成本高达 3.5 元/公斤。这就是说，每卖出 1 公斤大蒜，蒜农就会亏损 0.9 元。

“谷贱伤农”，这是稍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明白的道理。农业虽然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但在追求市场效益的今天，很多农民宁愿出去打工也不愿意在家务农。现在，原本就缺乏稳定保障的农业，又受到了投机资本的围攻，也难怪舆论充满了对热钱和游资的指控。

从全球经济走势来看，中国经济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依然会一枝独秀。很显然，中国经济依然是国内外投机资本的首选。只要中国经济的增长率超过全球经济平均增长率，就表明投机资本有机可乘，热钱和游资就不会彻底消失。

面对令人头痛的通货膨胀和无孔不入的投机资本，中国经济不能寄望于国际金融市场的怜悯和投机资本的仁慈，而是要主要通过有效扩大内需来实现自我救赎。

►► 5. 高物价时代百姓的活法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今天，“投机者猛如虎”绝非虚言。在通货膨胀、“热钱”投机的影响下，老百姓不仅无法享用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的成果，而且还要惨遭财富被掠夺的痛楚。当百姓的生活不是向好而是向坏的方向变化时，经济发展就成了次要的问题，保持社会稳定才是第一位的。

对政府来说，无论是调控房价还是抑制通货膨胀，都需要找到自己的出路；对企业来说，无论是物价还是房价都不是自己能控制的，能够选择的就企业的经营方向；而老百姓可能是最无奈的一族，既不能决定价格，又不能拒绝消费必需品，似乎只能默默地承受。

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忍耐精神的民族。面对近几年折腾不休的通货膨胀，中国老百姓虽有怨言，但大多数人还是默默生活着、工作着。

但是在经济唱主旋律的今天，我们在保持忍耐美德的

同时，也应该掌握必要的经济常识，只有拿起经济常识的武器，才能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百姓的利益不受侵犯了，其实也就是国家的利益不受侵犯了。

那么，在通货膨胀来袭的时候，老百姓应怎样应对呢？是加大消费还是将钱存入银行，或者是选择投资？很显然，消费是不合时宜的，因为人民币购买力太低，原本能买 5 公斤大蒜的钱，现在只能买 1 公斤大蒜了。存在银行同样不合适，因为银行利息还不如 CPI 高。2010 年，一年期银行整存整取利息是 3.25%，而 CPI 是 3.3%。这就意味着，如果将钱存在银行的话，实际购买力将不升反降。近年，银行利息没见上涨多少，但上半年的 CPI 已经上升到 5.4%。

其实，对老百姓来说，CPI 并不是最好的参考指数，食品类的物价指数就很能说明问题了。2010 年，食品价格上涨了 7.2%。简单点说，如果你在银行存了 100 元钱，一年下来不仅没有挣到利息，反而要亏损 4 元钱。如果你的工资不是大幅增长的话，经过一年累死累活地工作，你的总资产不仅没有增加，还会出现大幅缩水。

有鉴于此，习惯了忍耐的中国老百姓必须改变活法了，当通货膨胀来临的时候，我们必须有意识地缩减银行的存款，尽量多掌握一些人民币资产。由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相比于人民币的贬值，房地产等实体资产的价值在普遍提升。以老百姓手头的有限资金，做房地产等大宗

商品的投资是不现实的，只能选择那些稳定而小额的人民币资产。当然，如果非常看好房地产投资，也不妨一试。现在网上非常流行团购，我们也可以选择和亲戚朋友合伙投资网店。这样不仅可以扩大资本金，而且可以弥补政策、经济学常识欠缺等方面的不足。

还有一种较为简单的方法，那就是购买国债或者基金。国债的稳定性毋庸置疑，基金则要有所选择。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最好选择那些保值性、成长性好的基金。与投机资本不同，成长性基金以资本保值和长期增值为投资目标，其投资对象主要是市场中有较大升值潜力的金融资产。这类资产的短期回报很少，甚至不进行分红，但从长期来看，却是实现资本保值增值的利器。

与普通百姓相比，企业的选择相对要多一点，比如说可以调整经营方向、改变国内外业务比例等。但对企业不利的是，调整业务方向需要较长的时间，不可能在短期内一蹴而就。同样，企业还要关注消费者的感受，而不能像消费者那样率性而为。由于原材料价格的飙升，成本的增加不断考验着企业的韧性。当消费者试图通过购买替代品降低消费成本时，企业既想悄无声息地降低生产成本，又不敢明目张胆地挑战消费者的底线。

当前，人民币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状态：在国内，由于通货膨胀，购买力下降；但在国际上，由于人民币升值，购买力却极其强悍。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有两种选

【人民币资产】

是指以人民币计价、交易和结算的资产。这类资产包括金融资产和非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主要指现金存款、股票、债券以及保险金等；而非金融资产则主要指住宅、土地等不动产。

择：一是投向进口贸易，因为人民币国际购买力增强，可以买回更多的外贸商品；对于胃口比较大的企业，还可以考虑到海外收购企业，进行直接投资。第二个选择 and 个人的选择相似，只不过企业的资本金更为充足，不用拘泥于小件商品，可以在房地产、股票等市场纵横。

老百姓和企业的自救行为，只能是有限地减少自身的损失，治标而不能治本，真正想制止通货膨胀，还是得通过降低物价上涨的幅度，还是得靠政府的拯救行动。前文提到，通货膨胀会引起财富在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再分配，通常来说获利的往往是强势的一方，比如说政府和富人。那么，要调控这种遭到诟病的财富流向，可供选择的办法之一就是缩小贫富差距。以一种极端的情况来看，如果财富在全国国民中平均分配的话，那么通货膨胀的发生概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当然，这是一种理想化的状况，就像经济学的理论模型一样，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国”。基于此，政府在缩小贫富差距上的努力，无疑是一种积极应对通货膨胀的行为。

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缩小贫富差距终于真正成为国家的政策导向。但这一政策要想见效，还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针对通货膨胀的突发性和相对短期的特性，政府还可以通过提高居民收入的方式来抵消通货膨胀的影响。如果居民收入增长超过了 CPI 的增长，那么老百姓即便不能过上更为富足的生活，也最起码能保证生活水平不

再下降。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经济学家成思危就表示，一定要警惕通货膨胀，但不要大惊小怪，只要收入增长高于通货膨胀就不怕。

当然，如果政府能痛下决心，坚决打击投机资金，妥善处理人民币升值问题，并为民营资本打造一个更为广阔、宽松的投资环境，就不会有严重的通货膨胀发生，中国人民就可以安享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的丰硕成果了。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第七章

就业天花板,达摩克利斯之剑?

● 经济大发展往往会掩盖很多问题,当经济进入停滞或衰退期时,问题就会接二连三地暴露出来。然而,中国经济却屡屡出人意料,在经济增长依然能保持 7% 的增速时,就业问题也同样突显。近几年来,就业难一直是民生的焦点问题之一。一方面是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是民工荒及白领失业的现象。

就业难一直制约着中国经济发展,并关系到社会稳定,成了高悬在向前发展的中国经济上面的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 1. 天之骄子过剩，扩招惹的祸？

2004年年底，一位来自东北的女大学生到北京来找工作屡屡受挫，后从海淀区学院路一所高校的楼上纵身跳下，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这不是大学生因找不到工作而走上极端的第一起事件，事实上，从2003年高校实施扩招政策起，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就越来越多了，“僧多粥少”导致的就业难是不争的事实。2002年，大学生初次就业率为80%，而到了2003年，这一数据已经下降到70%。此后，就业率虽有所回升，但离80%的就业率依然很遥远。

多年来，大学生一直被社会称为“天之骄子”。进入大学，对农民子弟来说，无异于鲤鱼跳龙门。10年前，一位农民子弟考上大学，全村的人都会请客吃饭。这是对人才的尊重，同样是对其未来成才的期待。那时候，考上大学意味着命运的改变，意味着日后的高收入、幸福生活和体面的社会地位。

但从 2003 年甚至更早时开始，这一现象出现了质的变化。从 1999 年到 2009 年的 10 年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由 5% 上升到 22%，毕业生规模由 108 万上升到 610 万。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攀升到 26.5%，而 2011 年的毕业生规模已经达到 660 万。但初次就业率只有 70%，也就是说有将近 200 万毕业生无法在第一时间找到工作。

其实，如果剔除读研、出国、自由职业和灵活就业的人数，大学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还会降低很多。即便以官方统计的数据，也意味着 100 名毕业生里有将近 30 人找不到工作。考虑到地区差异和学校差异，像北京地区的一流高校，就业率很轻松地就可以达到 90% 以上，而那些中小城市的普通高校，就业率甚至连 50% 都很难达到。

大学生就业难，女大学生就业更难。针对很多用人单位询问女大学生“恋爱了吗”的问题，网上曾盛传这样一个帖子：“我的 EQ 很低，对男孩子没感觉。所以，5 年内保证不恋爱；5 年后万一不慎恋爱了，保证 5 年内不结婚；5 年后万一不得不结婚了，保证 5 年内不生孩子；5 年后万一不小心必须生孩子了……那应该是 45 岁以后的事了，你们可以考虑辞退我了……”

无论是用人单位的问题，还是大学生自身的问题，最终造成的社会现实是大学生就业难。“天之骄子”过剩了，已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虽然有不少专家认为，这在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学生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就业期望太高,但有一点必须得承认,那就是绝大部分学生的期望值都是以自己的同学、校友为坐标得出来的,对自己的期望也是对自己的定位,社会提供的就业岗位不能满足大学生的定位需求,也是导致就业难的一大客观原因。

研究表明,精英情结是导致大学生就业难的一大主观原因。自1978年恢复高考后,我国的大学教育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精英教育,而当高校开始纷纷扩招时,大学教育也开始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过渡,但是老百姓并没有意识到这种转变,依然把读大学看做是子女们鱼跃龙门、改变人生命运的唯一通道。当看到子女们大学毕业时不仅无法“跃龙门”,甚至连一份最简单的养家糊口的工作都找不到时,他们的心理落差之大可想而知。在大部分国家,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变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这种转变似乎来得悄无声息而又让人措手不及。

从1999年开始,高校开始实施扩招计划,第一年就扩招了48%,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保持了较高的扩招率。2008年,教育部在一次发布会上首次公开承认,1999年开始执行的全国高校大规模扩招政策太急促。从2008年起,高校招生趋向理性,同时确定2009年扩招幅度不得超过4%,2010年不得超过3%。但即便如此,原本的招生基数已经超过了人才市场的需求,再加上历年积累下来的

过剩劳动力，大学生过剩就成了一种常态。

就业难所彰显的教育投入与产出的不平衡，让很多年轻人和家长选择了放弃高考，甘当文盲、半文盲去闯生活。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比2008年约减少30万；2010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946万余人，比2009年1020万的考生数减少74万人；2011年参加高考的人数降到了933万，比2010年又减少了13万人。可以想象，参加高考人数不断减少，但高校招生人数却在扩张，生源质量怎么可能得到有效保证？如果毕业生整体水平下降的话，即便就业环境没有恶化，又怎么能要求用人单位提供相当多的好职位？

导致大学生就业难的外在机制主要体现在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上。

公务员考试为何成了“第一考”？最大的原因还在于公务员较高的社会地位、健全的福利保障和相对稳定的收入。调查显示，大学生最青睐的单位依次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民营企业等。分析表明，收入虽然不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但影响力不可小觑。除了部分垄断性企业和明星级别的外资、民营企业外，大部分企业的收入是无法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相比的。正因为如此，在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眼中最青睐的职业依然还是国家机关、高校、研究机构和事业单位，其次就是国有企事业单位。

我国独特的户籍制度也是影响就业的重要因素。在我国,户籍与义务教育、福利保障等联系在一起。城镇户籍的福利好于农村,大城市的福利好于中小城市,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实。因此,大学生将就业的首选城市投向了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考虑二三线城市。其实也难怪,以高等教育为例,中国一流大学基本上都位于大城市,尤其是北京,坐落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所著名学府。在招生的时候,除了部分偏远省份,北京地区的分数线往往低于其他省市。其他地方的高校在北京地区招生时,分数线也要低很多。

还有一个影响因素就是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被称为经济的“润滑剂”和“安全网”,对于稳定劳动力市场至关重要。然而,我国不仅就业制度存在分割,社会保障制度同样存在非常严重的制度性分割,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和部门之间都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从总体来看,城市社会保障优于农村,东部地区优于西部地区,垄断行业优于其他行业,国家或地方重要部门优于普通部门。由于这种分割,大学生理所当然地会优先考虑社会保障制度更为健全和完善的城市和工作单位。如果想消除这种影响,就必须健全和完善偏远地区和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缩小种种“鸿沟”。

在内外机制的双重作用下,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越来越

越多，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浮出水面，成为我国就业工作的难点之一。其实，在扩招之前也存在找不到工作的问题，只不过那时候总体经济状况良好，人们并没有太多的关注大学生的就业。在扩招幅度高达 48% 的情况下，就业率只不过下降了 10 个百分点，按理说并不算高。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扩招的幅度远远超过了我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如果没有失业，全部大学生都找到了工作，那反而是不正常了。

►► 2. 民工荒，紧张了谁的神经？

如果单看民工荒，也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毕竟每年春节前后农民工都会大量流动，这种现象的出现是难以避免的。然而，当民工荒遭遇大学生过剩时，情况就变得复杂而怪异了。

“民工荒”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词汇，早在 2004 年前后，珠三角地区就出现了民工荒，只不过那时候主要“荒”在春节后和农忙季节，表现为局部地区和短期性的劳动力短缺。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全国用工需求不断扩大，民工荒的规模、地区范围和持续周期全都扩大了。尤其是金融危机后，企业接二连三的辞工现象打击了农民工的积极性，民工荒如星星之火般蔓延开来，从最初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蔓延到了全国，周期也明显拉长。

2010 年 2 月 24 日，广东省人保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声称，广东缺工近 90 万人，其中东莞缺 20 万人、深圳缺

20万人、广州缺15万。此前，民工荒很少引起全国媒体的普遍关注，但这次却由于涉及范围广、周期长而引起了极为广泛的关注。

2011年，民工荒问题更为严重，在公务员考试的模拟试题中，出现了数个和民工荒相关的申论写作话题。资料显示：2011年春节后，在上海、江苏、浙江等长三角地区的多个城市出现了企业招工难的现象，同期在珠三角地区也出现了民工荒。以南京安德门附近的民工市场为例，那里日均需求岗位达到1万个，但每天成功招到急需人才的岗位只有100多个，缺口之大让人唏嘘不已。

这一波民工荒表现出众多与以往不同的特征：一是遍及全国，不仅民工荒的常发地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依然存在这个问题，而且已经从内地向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蔓延；二是周期较长，不再像以往只发生在春节后的一段时间内，而是全年都存在这个问题；三是“荒”在年轻员工，也就是以“80后”和“90后”为主的所谓“第二代农民工”。

新一代农民工不像父辈那样逆来顺受、对工作环境和生活质量没有任何要求，他们希望能够分享城市文明的成果，获得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富足。这一代农民工受教育文化程度比较高，虽然从身份上看是农民，但大部分人对城市的熟悉程度超过了农村，毕业后又直接进城打工，因此更习惯于城市生活。由于对新生活的向往和增长见识的

心理影响,他们喜欢频繁地更换工作和工作所在的城市,流动性较大,也使得同一时间段内从业的民工人数大大减少了。

对于民工荒现象,社会普遍反映是我国劳动力红利期即将过去,但也不乏叫好声。经济学博士徐林清就认为:民工荒意味着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因此对福利待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原本能够吸引民工的岗位和待遇,对有了更高要求的农民工缺乏吸引力。对企业来说,依靠廉价劳动力获取高额利润的时代已经属于过去,企业必须尽快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金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

民工荒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企业在金融危机期间随便裁员造成的恶果,表明农民工有了更强的维权意识。金融危机期间,企业不顾民工利益,随便裁减员工,激发了员工的不满情绪。当经济开始复苏后,民工以跳槽、返乡等方式回击了企业的贪婪。很多民工反映,在中小企业工作很难拿到足额的工资,辛辛苦苦的所得,要么被当做押金留存,要么以各种理由被克扣,最终到手的工资总是不足。在金融危机期间,企业更是置劳动合同和劳动法于不顾,在订单不足的时候,无情地打破员工的饭碗。现在,更前卫、更懂得维权的“农二代”逐渐成为民工的主体,企业再也不能像对待他们的父辈那样任性了。

同时，民工荒还反映了我国区域经济的良好发展态势。此前，民工大量从欠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涌向发达地区，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正是因此聚集了大量的民工。然而，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吸引了很大一部分发达地区的资本流入这些地区。当中西部地区和部分东部地区的落后市县经济有了长足发展时，各种工厂和民营企业茁壮成长起来，很多农民发现，在家门口也能找到工作，而且工资并不低，还能照顾家里的老小，当然不再愿意出去打工了。

在江苏淮安，一位初中没毕业的男孩，刚进入富士康就能拿到 2000 元出头的工资，而即便在北京，很多忙碌在诺基亚手机生产线上的工人，一个月只不过能拿到 1000 多元。如果不是年轻人更喜欢大城市的生活，民工荒可能会更为严重。对那些已经成家立业的民工来说，当然不会因为被大城市的环境所吸引而出来打工，他们更看重的是工资高低和每年的结余。

同样是一位来自淮安的瓦工，在北京建筑工地上每天能赚到 150 元。在北京生活了将近 10 年的他，现在正考虑回老家打工。据他所言，在老家淮安一天也能赚到 120 元左右。考虑到北京昂贵的消费水平，在老家工作一年存下的钱肯定不会比在北京少。要知道，他 10 年前来北京的时候，一天的工资只不过 30 元左右，现在虽然涨到了

150元,但对于这样的技术工人还是缺乏吸引力。

如果加上奖金等补贴,这样的建筑工人每个月能赚4000元左右。4000元的月工资,对北京普通的行政人员来说,已经很不错了。在这种情况下,大幅度地提高民工的工资是不现实的,否则很可能又要出现当年“脑体倒挂”的现象了。有鉴于此,民工回流几乎是无法避免的趋势。

事实上,通过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的对比,更能揭示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的问题。这对矛盾的存在,正是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失衡的体现,折射了我国劳动力资源配置低下、劳动力市场的分割,验证了我国产业结构的不平衡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不合理。

众所周知,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劳动力需求以体力劳动者和技术工人为主,对脑力劳动者的需求并不旺盛。在这一背景下,我们就能够理解当经济回暖时,企业更需要的是技术工人和蓝领工人,而不是坐在办公室的白领和金领人才。大学生作为白领的主力军,无疑是高层管理人员的主要来源。但在某一时期内,高层管理人员的需求是有限的,相对于经济的增速和高管人员需求的增长,大学毕业生的数量无疑太过庞大,“天之骄子”过剩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多年来我国虽然坚持由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转变,但效果甚微。水平偏低的产业结构和粗放型

的增长方式，对高端人才的吸纳还是有限的。

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发展与资源供给的矛盾日益显现，民工荒就是这一矛盾的重要体现。从劳动力的总供给和总需求对比上来看，我国仍处于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阶段，但从部分地区、部分城市和部分行业来看，民工荒是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尤其是对建筑行业 and 民营企业来说，民工荒的影响是致命的。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化解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失衡，事关我国城市化建设和经济发展，已经上升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

正因为此，民工荒已经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关注，第四方就业服务平台就是各级政府为应对就业问题推出的解决方案之一。在“统筹城乡第四方就业服务体系研究与应用示范”项目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研究室副主任李志能认为，目前农民工流动性较大，就业呈现“短工化”的趋势，第四方就业服务平台的建设，正好满足了农民工就业周期短、流动大的需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力资源市场司司长毕雪融也认为，民工荒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企业和农民工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通过建设第四方就业服务平台，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从政府的角度来说，目前最紧要的是要建立劳动力供求预警机制。此前，社会各界更多地将目光聚焦在劳动力需求不足和农村劳动力上，对劳动力供给问题有所忽视。

民工荒的出现,表明劳动力供给问题已经日益显现,必须引起高度关注。政府和企业应该增强对劳动力供给进行预测的意识,通过政策调节和业务调整,尽量维持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平衡。

近几年来,东部地区很多重点加工制造企业将生产线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以此来应对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民工荒问题。这种产业转移由企业的自发而为到政府有意识引导的自觉而为,应该说顺应了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地区经济布局的改革大势。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不仅能够缓解民工荒问题、延长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促进我国经济长期保持竞争力,也是我国实现城市化和工业化的重要途径。

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研究部部长程伟就曾表示,对于东南部企业来说,通过产业转移不仅可以突破企业成本不断上升的“瓶颈”、集中有限的资金进行产业升级,还可以赢得到中西部正在蓬勃发展的市场,增强企业的竞争实力。最重要的是,这样能合理地解决民工荒问题,同时满足企业的用工需求。这对我国尚显稚嫩的民族产业来说,无疑是一大利好消息。

►► 3. 白领怎么就无辜失业了？

2008年，一篇题为《最后一个离开深圳的人，把灯关掉》的帖子刚出现时，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关注。但过后回想，却让人心有戚戚焉。

“今天是二十四节气之中的霜降，老板刚刚通知了：公司要注销。广东话就是‘执笠’。天气转凉了，心情也变冷了。没想到金融危机波及得这么快，都影响到我这样一个普通老百姓了。昨天电视上说，现在有七成的公司不打算招新员工了，有八成的人暂时不打算跳槽了，2009年毕业生有590万，加上未就业的往届毕业生有90万，总共有600多万在挣扎。我是其中一个不幸者。我将成为第一个离开深圳的人，麻烦最后一个离开深圳的人，把灯关掉。”

“失业”虽然是最近几年才被普遍使用的名词，但却

不是一种新的社会现象，以前，被称为“下岗”。在国企改革大潮中，从1998年到2001年期间，国企职工每年下岗的人数多达700万~900万。国家显然也意识到了民众心理的承受力，在媒体的引导下，“下岗”很快被“失业”取代了。

面对失业，抗压力较弱的年轻人容易走向极端。

2006年11月5日深夜，上海一名刚刚失业的软件工程师从自家的阳台上纵身一跃，结束了年轻的生命。

这是一位优秀的软件工程师，原本供职于一家日资软件公司，年薪超过10万。凭借这样的收入水平，他依靠自己精密的计算能力，从银行贷款80万元购买了一套108平方米的婚房。按照贷款协议，他每个月需要还贷7000余元。

不幸的是，这家软件公司的业绩很快开始下滑，公司决定裁员三分之一。这位软件工程师虽然能力不错，工作也非常努力，36岁的年龄在其他行业还算年轻，但在软件行业却没有明显的竞争力。现实是残酷的，他因为年龄过大而“被失业”。

此后的故事很简单，他连续数月找不到工作，还贷的压力大增。在多重压力下，走投无路的他，选择了轻生这种决绝的方式。

白领失业，这个比大学生就业难更为“滑稽”的命题，正在日益引起社会的关注。2006年，《新财经》对北京、上海两地的白领阶层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失业问题是白领阶层最为关心的问题。事实上，业界专家早就发出警告，中国很可能要迎来第三波失业高潮了。

20世纪70年代末，知青返城被称为中国第一波失业高潮；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大批国企工人下岗，被称为中国第二波失业高潮。而将要面对的第三波失业高潮，很可能比前两波更为猛烈，也更为持久。最为不同的是，这次失业高潮主要发生在高学历、经验丰富的人身上，也就是一直被人们羡慕的白领阶层。而且，越是大城市、经济发达的地区，这种情况越严重。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美国很多白领成为失业一族，由此也引发了中国白领的恐慌。当年，北京的IT圈曾流传一封电子邮件，内容大致是这样的：“请记住，千万不要跳槽、不要向老板要求加薪、不要休年假、不要结婚、不要生孩子……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不要？其实就是告诉白领阶层，你不是独一无二的，千万不要给老板替换掉你的借口……”

有一则搞笑的故事是这样的：

在一家大型IT企业工作的工程师小宋，某一天和主管因为工作问题大吵了一场。当天，他接到猎头A的电话，

邀请他去另外一家 IT 企业任职，出任某部门经理，工资翻倍。小宋痛快地答应了。

第二天，他去办离职手续前打电话给猎头，准备让猎头陪着他去公司，为自己挽回面子。谁知电话那头告诉他，因为公司发展不顺，A 已经被公司裁员，刚刚离职了。

闻言，小宋不由得打了个寒战，赶紧收拾好提包，像往常一样挤公交车上班去了。

当然，白领阶层的失业刚刚露出端倪，还不足以影响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正因为此，我们才将这一波失业浪潮归之为将在失业浪潮。但我们不能因此忽略任何蛛丝马迹，以防错过最好的调控时机。

其实，端倪还是很明显的。请看下面一组案例：

在北京的高校招聘会上，居然有不止一名大学生竖起了零薪酬应聘的招牌。

在广州市容环卫局下属事业单位的一次招聘过程中，13 个环卫工职位居然让研究生和本科生趋之若鹜，近 300 名研究生和本科生加入了职位争夺战。

这样的案例并不是个案，出现的频率也不低。不过，这些案例毕竟发生在北京、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不排除部

分找不到工作的学生为了留在那儿宁愿作出短期的牺牲。

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和国企改革的加速，主要由公有制企业失业工人构成的“老失业群体”人数已经达到峰值，今后将会逐步下降，而“新失业群体”将逐步取代“老失业群体”，由此改变失业群体的结构。研究表明，以下两类人将会成为失业白领的主流。

一类是 1962 年以后 20 年内出生的白领阶层。这个时段内出生的人口数量非常庞大，目前的年龄大约在 30~50 岁之间，以 40 岁左右的人为主。在绝大部分行业，40 多岁的人都属于年富力强，在各自的单位都担负着大部分的中高层职位，是名副其实的精英阶层。然而，除了能够混饭吃和养老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民营企业的老板是不可能花钱养闲置人口的。当源源不断的年轻大学生涌向企业，以更低的工资要求、更强的工作能力、更开阔的视野、更大的进取心挑战老白领的地位时，喜新厌旧的老板们肯定会迫不及待地将老白领扫地出门。

另外一类则是最早一批的独生子女。这批白领学历层次更高、视野也更为开阔，但他们也有着明显的缺陷，就是独立性差、抗压能力差，既缺乏丰富的阅历，也没有比较明确的价值观。他们最大的优势可能就是年轻，因此大部分也以吃“青春饭”为主。比如说软件行业，大部分以 20~30 岁左右的年轻人为主，过了 35 岁通常就开始该做管理工作了。但相对于开发人员，软件公司需要的管理人员

并不多,大部分人只能选择改行。

导致失业的原因很多,我们将由于经济周期性波动引起的失业,称为周期性失业。比如2008年的金融危机,由于大量工厂关闭、减产,市场上需要的劳动力大幅度降低,从而导致劳动力供给大大超过了劳动力需求。通常来说,在经济复苏和繁荣阶段,各厂商竞相扩大规模,扩充生产,就业人数会普遍增加;在经济衰退和谷底阶段,由于经济不景气,社会需求不足,各厂商又纷纷压缩生产,大量裁减雇员,就会导致大量员工失业。

这种周期性失业是不可避免的,只能靠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宏观经济政策调控来解决。一般情况下,政府只能采用相对积极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便刺激国内的有效需求,从而扩大就业。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一举措极可能导致通货膨胀,使得经济陷入更加危险的状况。2008年,面对逐渐向我国蔓延的金融危机,政府拿出了4万亿的投资计划。救市的效果是显著的,中国是全球最早实现经济回暖的国家,但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物价上涨的幅度有目共睹。

相比于周期性失业的无奈,摩擦性失业的影响要轻微得多。所谓摩擦性失业,简单点说,就是指人们在寻找工作或转换工作过程中出现的失业现象。比如说高校毕业生在毕业前如果没有找到工作的话,就会成为摩擦性失业群体的一部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于法

【结构性失业】

尽管劳动市场有职位空缺,但人们因为没有所需的技能,结果继续失业,也就是由于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不匹配而造成的失业。

【摩擦性失业】

指因季节性或技术性原因而引起的失业,即由于经济在调整过程中,或者由于资源配置比例失调等原因,使一些人需要在不同的工作中转移,使一些人等待转业而产生的失业现象。

鸣就曾表示，中国就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劳动力供大于求这种长期存在的矛盾，对高校毕业生来说结构性比较突出，但高校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更多表现出来的是摩擦性失业。

摩擦性失业很多时候由主观原因引起，比如说求职者的高期望值和缺乏从业经验等。通过增加职业训练计划和提高信息对称度，能够显著降低摩擦性失业人口的数量。

其实，白领失业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和摩擦性失业的关系也不大，更主要缘于一种结构性失业。当一个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的结构特征与社会对劳动力需求不相吻合时，就会产生结构性失业。结构性失业通常出现在国家经济重新布局和产业结构调整阶段，我国目前就处于这样的阶段。

著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教授胡鞍钢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在经历迅速的资本深化过程，国有工业企业资本密集程度迅速增高，不仅不吸收新增劳动力，还要不断排斥大量富余人员。在高速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带来中高级劳动力市场的结构矛盾。这些因素在 2020 年前不会发生根本改变。”

这就意味着，白领阶层至少还要面对 10 年的结构性失业考验。如果说民工失业还能返乡务农，大学生失业还可以依赖父母，那么最悲惨的就应该是白领阶层了。这个阶层的人士基本上是上有老下有小，很多还有供房供车的

艰巨任务。就像前文提到的那位软件工程师，一旦失去工作，不仅面临着生活危机，甚至可能有生命之忧。白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坚阶层，也是社会稳定的定海神针，一旦这个阶层出现急剧变动，就很可能造成极大的社会稳定问题。有鉴于此，我们必须未雨绸缪，提前为白领阶层的社会保障构筑安全防线。

►► 4. “公务员”何时成了“金饭碗”?

2011 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总共有 140 多万人通过资格审核。此外，还有数百万人参加了各省市的地方公务员考试。比如说黑龙江省的公务员考试，就有超过 15 万人报名。2011 年毕业生人数只不过才 600 多万，参加各级公务员考试的总人数将近 300 万人，达到了全年毕业生人数的一半。

2003 年的时候，国家公务员考试通过报名审核的人数只有 12.5 万人，最终的录取比例是 16:1；2008 年的时候，通过报名审核的报名人数达到 80 万人，最终的录取比例是 46:1；随后几年报考人数直线上升，2010 年通过报名审核的考试人数已经达到 141 万人，最终的录取比例上升到 87.3:1。而在 2011 年的国家公务员招考中，最热的报考职位为仅招 1 人的国家能源局能源节约和科技装备司节能与科技处主任科员及以下一职，通过审核的人数高达 4616 人，也就是录取比例居然是惊人的 4616:1。

如此的态势,显示了公务员报考的疯狂。如果说民工荒、大学生就业难和已见端倪的白领失业浪潮,都能通过努力加以化解的话,公务员报考突显出来的社会问题却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因为在这一现象后有着很多深层次的问题需要处理。

比如说令人欲罢不能的官本位意识,依然在人们求职过程中作祟,丝毫没有减缓的迹象。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人们的就业观念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本的“铁饭碗”早就不再是人们追求的终极目标。但不可否认,“官本位”意识在很大一部分公务员报考群体里依然存在,也正是因为这种意识,众多的就业者才选择报考公务员。这种意识的可怕之处不在于对权力的角逐,而在于由此引发的两个负面影响。一是求职者会容易堵塞了自身的职业发展通道,陷入职业发展的“死胡同”;二是就业供需资源配置不尽合理,浪费了宝贵的人力资源。

从就业群体的主观原因来看,公务员报考热主要缘于四大未来预期,包括地位预期、权力预期、利益预期和稳定预期。

在经济大发展的背景下,很多人对权力和地位的迷恋依然不减,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古代的中国人是学而优则仕,现代的中国人不仅学而优则仕,无论是哪方面的优秀基因都会转化为对权力和地位的追求。如果说公共管理这样的专业,走上公务员岗位属于对口就业的话,那么各

种高科技专业的优秀人才也放弃专业优势、在公务员考试的道路上矢志不渝，就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了。我们不排除部分公务员岗位具有专业技术性要求，但对大部分公务员群体来说，所做的多是公共行政工作，凡是具备了基本素质和必要的责任感的人都能做得很好。在这样的岗位上，让一位原本可以成为科学家、技术精英的人来工作的话，无疑是极端的人才浪费。

对很大一部分就业者来说，公务员的吸引力在于可观的福利待遇。前不久，一位工作 10 年的北京公务员在网上“晒工资”，从中能够看出北京公务员的基本收入状况。

1. 工资：每月 3200 元左右（扣除公积金后），全年记 3.8 万元；

2. 奖金：北京又叫督查考核奖，0.8 万元；

3. 过节费：元旦、春节、五一、国庆四个节各 1000 元，记 0.4 万元；

4. 加班费：北京把加班费固化给各个单位，最多不超过 36 小时，与级别挂钩，按季度发放，本人每季度 1500 元左右，全年记 0.6 万元；

5. 住房公积金：每月 600 左右，本人扣 600，单位再交 600，实际 1200，全年 1.5 万元左右；

6. 住房补贴：工资前两项的 66%，650 元左右，全年计 0.8 万元；

7. 13 个月的工资：不是完整的一个月工资，2000 元左右，计 0.2 万元。

全年合计 8.1 万元。

2010 年，北京职工平均年工资收入是 50415 元，这位公务员的收入水平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与效益较好的国有企业从业人员相比，这样的收入水平不算高；与垄断行业、高科技行业、大部分外资企业从业人员相比，这样的收入水平也不算高。如果仅以这样的工资收入来看，公务员的工作有吸引力，但也不应该热到现在这种程度。很显然，除了正常的工资收入外，灰色收入也是公务员成为热门职位的重要诱因。

某玩具制品有限公司曾被媒体曝光，在春节期间向政府官员送礼数十万元，包括现金红包、高档服装、购物卡等。送礼清单上甚至详细列出了送礼数量、送礼对象和所在部门。当然，对很多公务员来说，这样的灰色收入只能算是小钱，有的公务员还会暗地里在企事业部门兼职，或参加各类科研项目，所得收入更是惊人。

同时还应该考虑到，在失业现象越来越常见的今天，公务员超稳定的工作岗位，也是很多对平稳生活情有独钟的人最为看重的。多年来，政府一直致力于打破“铁饭碗”，试图引导人们的就业观。然而，“铁饭碗”不仅没有被打破，反而升级成为“金饭碗”。当失业、破产泥沙

俱下，可怕的失业前景让人们对公务员岗位充满了更胜以往的热情。

由此看来，我国的公务员制度缺乏有效的淘汰机制，也是公务员报考热的重要原因。近年来，国家加快了行政改革的步伐，为了提升公务员的行政效率，有意识地在公务员招募中引入了聘用制。然而，这种聘用制太过形式化，并未像企业那样进行实事求是的业务考核。在这种情况下，除了那些特别优秀和有责任感的公务员，大部分人都采取“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消极工作态度，导致行政机关人浮于事、机构臃肿。如果能够在公务员制度中真正引入淘汰机制，让公务员产生危机感，必然能有效地优化公务员队伍的工作现状，极大地提高政府的行政效率。

与此同时，公务员报考热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完善，从事其他行业的工作面临的竞争较激烈、失业风险也更大。由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起步较晚，体系明显不够完善。比如说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失业的白领和民工，都无法通过合法的渠道得到保障。以养老保险为例，国务院规定一般不得超过企业工资总额的 20% 的要求，但不少城市企业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远远超出了这一比例。两相比较，公务员系统的保障制度无疑更有优势。

公务员职位能够吸引足够多的人竞争，原本应该是好事，表明人们对社会公共事业和公共行政有兴趣，愿意为

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然而,当我们发现 4000 多人竞争一个岗位时,才知道这种疯狂报考的背后,还隐藏着很多令人担忧的问题。

如何保证公务员队伍既能招到最优秀的人才、提升我国政府的公共行政效率,又能纯洁报考人员的动机,真正以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出现在公务员岗位上,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 5. 机会天花板，你被挡住了吗？

“还真热门啊！”

看着网上公务员的报名人数，王成忍不住惊叹道。因为工作太难找，很大一部分文科生选择了报考公务员。虽然明知道通过率很低，但很多毕业生还是选择了尝试一下。

几个月后，成绩下来了。王成和同宿舍的张磊都过线了，只不过张磊是刚刚合格，而一向学习成绩不错的王成却名列前茅。两个人刚好报的是同一个职位，而这个岗位又只招一个人，因此两人成了竞争对手。

王成来自农村，平时争强好胜，不仅学习好，其他方面也很活跃，在学校算得上是风云人物。张磊是本地人，家里背景不错，平时很少学习，也不太合群。不过毕竟是同学，两人一起去面试了。

面试采取团体答辩和单独面试相结合的方式。王成在团体答辩中表现优异，而张磊一句话也没说，似乎对这个职位并不在意。

王成感觉自己表现很好，应该机会很大。过了一段时间，结果下来了。王成落选，而似乎没多大希望的张磊反而被录取了。

怎么可能这样？王成非常困惑。

不久王成就打听到了内幕，原来张磊早在报考的时候已经搞好了关系，只要能通过书面考试，这个职位就不可能旁落他人。王成既失望又有点愤怒，但他最终选择了忍气吞声。很久前他就曾在网上看到过“萝卜招聘”的做法，也就是用人单位以特定人员为模板，设定一系列的标准，以保证某个人或者某几个人能最终胜出。

2010年，福建省三明市市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考试招聘工作人员，岗位信息表的部分内容就曾因条件设置太过特殊遭到质疑。材料显示，三明市皮肤病医院药剂科工作人员招聘对象为“往届未就业毕业生”，招聘条件为“全日制普通院校药物分析检验专业中专毕业并具有国家承认的本科学历，在医疗卫生机构药品分析检验岗位3年以上工作经验，岗位定在宁化门诊部（未入编人员）”。

即便是外行人，也不难察觉其中的“猫腻”。用人单位在招聘人员时，如果招聘往届生，通常都是需要对方具有经验。但这个职位的招聘对象却是“往届未就业”，难道是怕应聘人员跳槽引起纠纷？而在应聘条件上，要求中

专毕业却要有本科学历，未免太过复杂。完全可以直接招聘本科毕业生，为什么要分成两个条件呢？如果说两个条件是提高要求也就罢了，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

据说三明市纪委介入调查此事，可惜网上再无后续报道，无法确认信息真假和调查的结果。

对于那些费尽心血拿到毕业证书的学生来说，毕业并不意味着和同龄人站到了同一条起跑线。有很大一部分公务员岗位和事业单位的岗位被提前预定了，即便他们能力再强，也很难获得公平的竞争机会。就像前文提到的王成，四年寒窗苦读，在面对同学的竞争时，也只能无奈接受现实。

如果好工作不是凭借真正的能力而争得，而是依靠背景、金钱和人情获得，那么寒窗苦读就失去了意义。曾经，我们都信奉“知识改变命运”，期待刻苦学习能实现鱼跃龙门，然而，残酷的现实粉碎了这一幻想。没有任何背景的学生，在争抢那些所谓的“金饭碗”时，只能处于弱势地位。

不怕失望，就怕绝望。失望一次还可以重来，绝望了就不会再做任何尝试。

事实上，寒门子弟不仅在求职上没有优势，就是在入学考试上也同样如此。大部分学校更倾向于招收大城市的学生，因此在分数线上也会有所照顾。对没有任何背景的

青年学生来说,其发展之路无异于被机会的天花板所阻。

即便在同一所城市,贫富差距的影响也是无处不在的。比如说价格不菲的择校费,就不是普通家庭能够承担得起的。在北京,比较好的小学择校费已经达到6万~10万,甚至更多;而上中学的话,费用更是高得离谱。对于有钱人家来说,这点钱可能算不了什么,但对普通家庭来说,却是笔不小的负担。最可怜的是那些农民工子弟,因为各种原因甚至无法入学。

由此可见,在机会的天花板面前,公平几乎是一种奢求。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当前,我国教育事业虽然坚持公益性和普惠性发展方向,但还没有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要求,也难以满足社会对教育公平的需求。

然而,要实现教育公平,就必须确保机会公平。“学而优则仕”,中国人对孩子教育的重视是毋庸置疑的,但在当前的现实下,这一古老的规训似乎不太适用了。尤其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合理配置资源、优化资源结构并优先照顾落后地区、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才能确保更多的民众享受到教育资源。

只要能消除教育和求职过程中的一些特权因素,让所有人都能平等地享受教育,公平地参与求职竞争,就能打破机会的天花板,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真正的机会平等。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Part 8

第八章

钞票多了就幸福了吗？

● 近年来网上一直流行比较中国和美国生活成本的帖子，看过后让人难以平静。如这样的帖子：在美国买辆奔驰 E-320，价格 50000 美元，相当于普通人半年多的工资，而在中国买辆奔驰 E-320，价格 980000 元人民币，相当于大部分人十几年的工资；在美国买一台苹果 G5 计算机，最多 1500 美元，而在中国市场上，最少要 30000 元人民币。

中国经济发展了，可是普通民众的幸福指数并未得到明显的提升。收入差距是不可避免的，对此我们不得不先问一个问题：钞票多了就会幸福吗？

全国最低交易手续费免费办理国内正规商品股指原油期货开户 零佣金 不限资金量和交易量直接申请交易所手续费
任何地方费用比我们低 10倍赔偿差价 客服微信/QQ：958218088 期货开户和书籍下载请进：<http://www.7help.net>

►► 1. 财富鸿沟，你在哪一边？

《圣经》里有这么一句话：“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这句话体现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小王和小张从小一起长大，一起从小学读到高中，双双落榜后回到农村。小王的父母是最典型的农民，除了埋头侍弄庄稼什么也不会，家里借款让小王读完了高中；小张的父亲以前游手好闲，后来靠倒卖水果赚了一份家业。两家是邻居，但关系一直不好。小王十分要强，在学校时成绩一直很好，但高考时由于家里太穷，住不起旅馆，只能在亲戚家寄宿。但亲戚家里开了一个跳舞厅，小王晚上没休息好，严重影响了考试。小张不爱学习，上高中还是家里花了钱才上的，考不上大学也很正常。

毕业后，小王虽然郁闷了一段时间，但很快就调整过来，发誓要靠自己的勤奋挣一份家业，过上比小张更好的

生活。起初，小王跟着父亲在家种地，生活虽然稍有改善，但每次见到小张依然抬不起头来。后来，家境渐有起色，小王的手头上也活络起来，就开始考虑从事副业。最终，小王选择了大棚种植，但手头的钱不够，只能到镇上的农村信用合作社贷款。

小王有文化知识，很快就学会了大棚种植技术，第一年就赚了点钱。还了贷款，还能赚1万多元。到该还贷款的那天，他特意换了身新衣服，兴冲冲地直奔镇上的银行。小王到银行的时候，碰巧小张也在那儿。小王不动声色地拿出几大捆钞票，递给营业员。

小张不屑地瞟了眼小王，大声对另外一个营业员说：“小黄啊，我的账户今年利息有多少啊？”

被称着小黄的营业员回答道：“你不是刚查过吗？”

“我忘了，麻烦你再帮看下。”

“嗯，51150元。”

小王一听就愣住了。自己辛辛苦苦忙了一年，只不过赚了1万元，别人什么事都不用做，只靠银行利息居然就赚了5万多元。

小张看着满脸诧异的小王，走过来轻佻地说：“如果不是我的钱存在这儿，你到哪儿贷款啊！所以说啊，你得感谢我啊，老同学。但千万记住了，你赚再多的钱也不可能比我多的，我成天躺在家里赚的钱都比你多。”

小王没有回应小张的挑衅。这一年来，他一直算着做

大棚生意的账，知道自己做得再好，一年也最多赚三四万元，这还得靠老天保佑，别出什么岔子。这就意味着，无论自己怎样努力，和小张的差距只能是越来越大。原本兴致勃勃的小王，一下子失去了奋斗的激情。

在中国，数年如一日地演绎着这样的故事。“贫富差距”在中国是最敏感的词汇，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崇尚“不患寡而患不均”。虽然很多经过粉饰的统计数据在有意缩小这种差距，但明眼人从身边俯拾皆是经济现象就能看清真相。郎咸平在一期电视节目中指出，像西湖这样的“公共物品”，因为周边别墅林立，很多普通百姓无法享用，使那里成了富人的私人会所。

如果说这种“上层现象”还不能震惊人心的话，那么聚焦底层或许更能触动人的灵魂。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前所长赵人伟和李实等人长期从事收入分配调查和实证研究，他们关于我国收入分配的调研数据，即便不是最权威的经济数据，也算是很有说服力了。在实地调研中，他们曾在福建晋江的一个村子里，看到这样的景象：远远地看去，村子里矗立着几栋宫殿一样的高级住宅楼，但走近一看，才发现在它们旁边，紧挨着的是五保户的贫民房。这些贫民房破落不堪，漏着缝的房顶只能用塑料布勉强盖住。而在李实的记忆中，有一幕场景至今难忘：有一户三口之家，老头子卧病在床，除了吃饭，整天只能躺在床

上。因为无钱看病，连患的什么病都不知道，吃喝拉撒全在床上解决。还有一个老太太和一个 40 多岁的痴呆儿子。全家人只能靠老太太一人照顾，日常开支只能靠一点薄地的收入来维持。

政府保障政策的覆盖面在不断扩大，但依然还有很多偏远地区成为盲区。在李实他们的实证调研中，中国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除了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曾一度缩小外，其他时期一直在拉大。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由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实施，而城市各项改革措施尚未启动，因而农民的收入曾一度接近甚至超过城市居民的收入。我们在以 20 世纪 80 年代为背景的电视剧中，时常看到一些农民身着“奇装异服”去城里探亲。原本对农村来的亲戚一直心怀抵触的城里人，陡然发现这些人不再像以往那样要吃要穿要钱了，反而给他们带来了大包小包的礼品。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城里人难言的落寞。

然而，这种景象注定不会长久。随着城市价格双轨制以及体制外企业的兴起，改革的浪潮从农村向城市蔓延，很快，城市经济发展就以更前卫的思想和更大胆的精神，走到了农村的前面。很多时候，“钱袋子”是衡量一切的标准，甚至被用来评价我们的尊严高低。从此，农民再也无法像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那样在城里人面前“挺起腰杆”了。

事实表明，尽管政府一再调整收入分配政策，但体现

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贫富差距依然在日益扩大。数据显示，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之比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 1.8 : 1 扩大到 2007 年的 3.33 : 1，近两年这一数据依然在上涨。由于差距的拉大，导致人口迁移现象明显加剧。有人用“围城现象”来描述这一现象：农村小学的教师们，梦想着到中学去；农村中学的教师们，梦想着到城里去；城里的教师想效仿孔雀实现东南飞，而东南沿海的教师则一心要出国。

城乡收入差距早已有之，行业之间的差距在近几年来更是愈演愈烈。用名义工资来衡量的话，差距更是惊人。以石油、银行、证券和航空运输等行业为代表，这些行业职工年平均工资已接近或超过 10 万元。2010 年，北京市金融业从业人员平均工资高达 18 万元，而中石油职工平均年薪也超过了 13 万元。

人们的不满是有原因的，太高的收入差距会让人失去奋斗的动力。虽然根据一些媒体公布的数据，我国的基尼系数只不过刚刚超过国际公认的红色警戒线 0.45，但更多研究人员的研究结果却远高于此。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丛亚平等人的研究表明，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 0.28 上升到 2007 年的 0.48，经过最近几年的持续上升，目前已经超过 0.5。事实上，早在 10 年前，我国就突破了黄色警戒线 0.4。目前，即便如媒体公布的数据，我国的基尼系数业已达到了 0.47。

【基尼系数】是判断一个国家或地区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是在 20 世纪初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根据劳伦茨曲线提出来的。基尼系数介于 0 和 1 之间，“0”意味着收入分配绝对公平，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完全平等，没有任何差异；而“1”则表示收入分配绝对不公平，所有收入被一个单位的人全部占有。在国际社会，基尼系数低于 0.2 表示收入绝对平均；在 0.2~0.3 之间表示收入比较平均；在 0.3~0.4 之间表示收入相对合理；在 0.4~0.5 之间表示收入差距较大；在 0.5 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

让人寒心的是，有关部门虽然竭力呼吁减小贫富差距，但贫富差距却在明显拉大。近些年来，虽然政策调整成效不大，但有关部门在收入分配制度上的努力是存在的。2010年，温家宝总理在文章中还专门谈到收入分配问题。他也承认：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至今仍相对滞后，主要是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偏低，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有拉大的趋势，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如果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必将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

面对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很多人表示大惑不解。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说政策方面的原因，国家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希望先富带动后富，但现实中只强调了前者而严重忽视了后者；体制方面的原因，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促成了贫富差距的拉大；发展方面的原因，这是经济发展造成的必然结果。当然，这些原因都是显性的，也是极为重要的，但却不是人民大众关心的，人们更在意的是由于不公平、不平等等因素导致的贫富差距拉大。

比如说国企改革。国企改革本身没什么问题，但在改制过程中由于缺乏监管，导致大量国有资产流失，也由此产生了一大批超级富豪，相伴随的当然是很多失业的工人。在国企改革过程中，一方面是少数人的花天酒地和大肆敛财，另一方面却是一部分人成为中国最底层的贫困人

口。再比如说权钱交易的问题，在权力寻租的情况下，权力市场化使得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还有垄断收入分配问题，由于行政干预资源分配，导致很多垄断行业从业人员收入太高。虽然我们鼓励生产要素可以参与分配，但当生产要素是通过不公平、不平等的方式获取时，就会导致人民群众的不满。这种不满的持续积累，就会影响人们对经济发展的信心，从而导致可能带来社会的不稳定甚至动乱。

在 2010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总理掷地有声地说：“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这是面对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给出的郑重承诺。

在 2010 年的春节团拜会上，温家宝总理再次坚定地表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这是面对日益加大的生活压力，给予我们的希望和信心。

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巅峰，政府有能力也有愿望解决日益悬殊的贫富差距问题。

但我们还是应该意识到，贫富差距问题是一项世界级难题，有意愿解决是一回事，能不能解决则是另外一回事。事实上，多年来我国政府就没有放弃过缩小贫富差距的努力，但任重而道远。

有研究表明，GDP 每增长 1 个百分点，基尼系数就降

低 0.01。就此而言，经济增长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有效方法之一。但让人诧异的是，我国 GDP 增速明显，但基尼系数增速同样明显，没有体现出应有的效应来。作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我们无须质疑 GDP 增长对缩小贫富差距的贡献，更应该思考的是，在 GDP 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为什么基尼系数会出现异常的变动。很显然，影响基尼系数的因素很多，而 GDP 则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

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发展私有经济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有效途径。有一种错误的观念认为私有经济会拉大贫富差距，之所以会有这种观念，当然是因为富有的民营企业家的存在。但我们应该在更开阔的平台上看待民营企业家，相比于一个人的超级富有，成百上千人的生活改善更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实践表明，民营企业鼓励竞争，可以有效地降低市场上的寻租机会，同时还能扩大就业。有研究表明，在一个国家的银行贷款中，私有经济所占的比重每提高 10%，基尼系数就能下降 0.003。

与此同时，政府还应继续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建设，从而有效地缩小贫富差距。从 2011 年 9 月开始，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调整到 3500 元，这可以看作是政府新一轮收入分配调节的开始。

►► 2. 财政大盘子与百姓小盘子

每年，当我们看到世界银行公布的中国的 GDP 数值及全球排名时，都会为之惊喜，为之自豪；但平静下来后，还是不得不在“房奴”、“车奴”等严酷的现实面前叹息。目前，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这种原本应该成为中国人民集体欢庆的事儿，却很难引起普通百姓们的高兴。因为在中国 GDP 日益增长的背景下，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超过了 GDP 增长，而居民收入的增长率却远远低于 GDP 增长率。也就是说，政府财政的盘子越来越大，而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跟不上 GDP 增长的速度。

统计数据显示，从 2000 年至今，除了个别年份，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增长速度一直低于 GDP 的增速。这是政府财政收入得以持续增长的重要原因。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中国财政收入水平太高。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的相关负责人就曾表示，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中国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并不高，在发展

中国属于中等偏低水平。官方数据显示，从 2007 年到 2009 年，中国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一直在 20% 上下浮动。即便按全口径财政收入计算，也就是公共财政再加上政府性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和社会保险基金收入来算，政府收入所占 GDP 的比重也不过接近 30%。而从世界来看，政府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的平均水平高达 40%，其中发展中国家政府财政收入占 GDP 比重的平均水平为 35%。与之相比，中国的这一比重并不能称高。

然而，很多学者指出，中国政府财政收入的计算方法不全面。《中国经营报》曾撰文指出，中国政府的收入至少应包括税收、土地收入、社保收入、彩票收入、国企上交红利与政府的收费和罚款。但事实上，我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只计入了税收、纳入政府预算内管理的土地收入和国企红利等。

以 2007 年为例，无论运用直接法、间接法还是支出法，得出的中国政府的收入都超过了 10 万亿元，比财政部公布的 5.1 万亿元要高出一倍。这样一来，政府收入占 GDP 的比重就超过了 50%，接近 60% 了，不仅远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甚至比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都高出不少。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明白为什么在经济发展迅猛的今天，普通百姓会感到自己的“钱袋子”瘪下去了。

按常理，政府是代表人民的利益的，不存在所谓的政府利益。基于此，政府财政收入应该以政府所需支出和人

民的承受力为基础，如果政府花不了那么多钱的话，就不应该收那么多的税。同样，人民把钱给政府，是为了让政府改善民生，而不是让政府用来存款做“食利者”。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从1999年到2008年的20年时间内，政府存款额居然从1785亿元一路飙升到16963.84亿元，增长了近10倍。与此同时，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的比例却在萎缩。如果政府的财政收入是为了存款，那么百姓不如自己将钱存在银行，换一份心安；或者用于投资，带来利润。

至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居民收入跑不过GDP增长，甚至跑不赢CPI了。相关部门对此的回应是，政府的收入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无论获得多少收入，最终还是用在了人民身上。但民生难题的长期存在，让普通百姓很难真正承认这一点。

以金融危机期间政府的救市来说，4万亿的投入不可谓不大，但救市的目的似乎不是为了民生，而是为了保证GDP增长，大量的资金被投资到低效的基础工程上，而投放到民生必需品上的资金则太少。数据显示，我国GDP构成中消费所占比例太少。20世纪90年代的时候，消费比例曾达到60%，但现在已经下降到30%多。在欧美发达国家，这一比例是50%~60%多。与之相反，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却大幅增长，近几年一直处于50%~60%的范围内，比欧美发达国家多出一倍。很显然，这种倒置的投资结构

虽然能保证 GDP 的持续增长，但却造成了经济结构的畸形发展。这种增长是不合理的，也是难以持续的。如果加以控制，只能导致政府的盘子越来越大，而百姓的盘子越来越小。

前不久，各省市相继公布半年报，数据显示，29 个省市的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超过了 10%，31 个省市的居民收入高于 CPI。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似乎居民收入增长了，但考虑到居民的银行存款和原有资产，就会发现这完全是个伪命题。因为，当年的收入增长速度超过 CPI，只是反映了居民当年的实际收入增长了，但银行里的居民存款，却因为利息收入远远低于 CPI 而在很大程度上遭到了贬值。很多专家认为，银行利息最起码不应该低于 CPI，否则就是不合理的。

很显然，政府也发现了居民收入增长和 GDP 增长的不匹配，因此在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居民可支配收入的预期增长目标要高于 GDP 的增长目标。然而，如果政府不改变投资结构、加大对民生必需品的投资；如果政府不压缩财政收入、调整收入再分配比例，如果银行不提高存款利息、让利息高于，最起码不低于 CPI，那么政府的财政盘子依然会越来越大，老百姓的盘子依然会越来越小，这是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必然结果。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玩投资风险太大，也缺乏投资的资金。然而，如果 CPI 增长率始终高于银行存款利息率的

话，即便工资收入增长了，也禁不起银行存款购买力下降的折耗。因此，通过控制物价上涨和提高存款利息来保障人民利益，是实现政府财政和人民收入合理再分配的关键。

与此同时，政府还应该灵活运用保 GDP 增速的措施，不要将希望全部寄托在投资上，还应该在消费上多下点功夫。投资、消费和出口是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2009 年之前，消费一直是经济发展的短板。在欧美发达国家，消费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70%，而我国很长一段时间都维持在 30% 多点。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政府太过看重 GDP 增长，财政支出大部分都投放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忽视了对民生消费品的支出。金融危机期间，国家大手笔投入 4 万亿元刺激经济增长，但绝大部分还是投放在基本建设上。全国工商联经济部部长欧阳晓明就直言，国家 4 万亿元投资并没有惠及到中小企业。欧阳晓明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中小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体，只有员工收入稳定增长才能刺激消费。对我国来说，“中产阶级”消费的边际效应无疑更大。

有不少专家认为，无论是缩小贫富差距，还是提升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最终还是得靠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尤其是中低层居民的收入水平来实现。对此，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通过调节税收体系、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来增加底层居民的收入、缩小贫富差距。但由于长期以来，为了 GDP “保七”、“保八”的目标，让各级政府太过注重财政收入，

因而只愿意增加税种，而不愿缩减税收。

“起征点从 2000 元提到 3500 元的新个税在上海、厦门、河北唐山、天津武清等地未得到彻底实施，某些地方税务局以软件没有更新为由或干脆不说明理由，仍按 2000 元起征个人所得税。”在个人所得税新起征点实施后，媒体不断报道不少地方仍在执行原先的税收体系。

媒体曝光后不久，北京、上海、厦门等地税务部门就出面辟谣。上海市地税局表示：“全市各级税务部门严格、准确地执行国家税法规定，已做好包括征管软件调整在内的各项准备工作。纳税人 2011 年 9 月 1 日（含）以后实际取得的工资薪金所得，按 3500 元的减除费用标准和税率表，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厦门方面也表示，在个人所得税新起征点实施后，厦门地税局就对当地的税收管理系统进行了改造升级，并于 9 月 1 日零时起上线运行。

无论真相到底如何，公众和政府个人所得税的关注，正反映了税收调节对老百姓生活的重大影响。此前，在关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调查中，社会各界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的当天，由于公众参与度太高，网络调查系统一度陷入瘫痪。当时，调查倾向的起征点集中在 4000~5000 元，虽然最终确定在 3500 元，但比起原先的 2000 元，还是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

需要注意的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

单靠个人所得税的调节是很难出现太大效果的。在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整后，有人甚至认为，这不仅不会缩小贫富差距，反而可能会拉大贫富差距。还有的说法是，因为个人所得税调整引起的财政收入减少，政府财政会通过其他税收或费用予以弥补。果真如此，个人所得税调整就将成为笑柄，不仅不会缩小贫富差距，反而会造成公共管理成本的上升，浪费更多的社会财富。

长期来说，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赖于国家经济的发展，但在短期内，居民收入水平和政府财政收入有着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要想提升居民的收入水平，就必须通过调整税收体系等方式，压缩政府的财政收入，从而减小政府的财政盘子，增大百姓的财富盘子。

►> 3. 你离幸福还有多远？

“你给我滚！”

面对着已经结婚 10 年的老婆，王安忍不住怒骂道。

王安和张红是大学同学，家庭都不算富裕。毕业后两人就结了婚，过着有点拮据的生活。为了油盐酱醋，两人没少拌过嘴，不过也没出现太大的矛盾。那时候，张红也就是经常唠叨一下什么时候能买得起房子，什么时候王安能陪她出去旅游一次。

后来，两人的工资逐渐高了，积蓄的钱也让他们用首付买回了房子。王安原本以为接下来将会过上越来越美满的生活，但事与愿违，张红的唠叨越来越多了，两人吵架的日子也变多了。刚才，张红说家离单位太远，希望换一处大一点、离单位近一点的房子，没想到两人间的矛盾又一次崩发。

以他们俩的工资，只能勉强应付现在的生活开销，如果换一套房子的话，王安又得像以前那样到处找兼职了。

现在的王安再也不想过那样的日子了，他觉得没有必要把自己逼得那么狠。但是张红喋喋不休，让王安很烦，随后两人就吵了起来。

是不是觉得这一幕很常见？现实中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家庭有了，但很快就是扑面而来的生活压力，幸福离我们似乎越来越远。

从个人角度而言，生活的目的就在于追求幸福。同样，对幸福的追求也是国家富强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尤其在物质财富逐渐增长的情况下，人们对幸福的追求也日益强烈。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幸福指数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热议的话题。

上网一搜，关于幸福指数的定义五花八门。但对普通百姓来说，不愁吃、不愁穿、养得起孩子、供得起房子就是幸福了，政治地位、权力威望等都是身外之物。

对于普通工薪阶层来说，没有人不希望福利能再好一点、工资能再高一点。随着我国经济一波又一波的高涨，老百姓的物质生活也水涨船高，越来越丰富。即便 CPI 指数比银行利息率跑得快，甚至要快过 GDP 增长率，但还是得承认，我们的钱越来越多了，家里的家电设施越来越齐全了，原本看来遥不可及的有车生活，现在只要想买，几乎每个人都能轻松地买下了。但夜深人静的时候醒来，我

【幸福指数】是衡量人们幸福感的指标数值。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它表现为在生活满意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

们发现，原来有钱的日子也不过如此，有钱的生活似乎并不如想象得那么幸福。

是因为钱还不够多吗？

是因为我们变贪婪了吗？

还是因为幸福原本就不是钱多少的问题？

俗话说：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这句话很耐人寻味。要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准，就必须能挣到足够多的工资；但是钱再多，也不可能保证我们生活得幸福。有时候，幸福甚至和金钱成反比，当我们的银行存款越来越多时，有时反而会增添许多烦恼。

有一位年轻人，在校期间很优秀，和同学们的关系相处得非常不错。毕业后，又找了一份非常不错的工作，收入也很好。每次同学聚会，基本上都是他负责筹备，人少的时候，甚至连大学流行的AA制都取消了。但后来发现，同学聚会的时候他很少出现了，甚至会找各种理由不出席。大家都觉得很奇怪，直到他一位最好的朋友说出原因，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时常有同学向他借钱，有时候他不方便，但又不好意思回绝，为此闹了很多不愉快。最后，他以封闭自己为代价，失去了朋友，失去了友谊，人也变得越来越沉闷。

中国人过惯了缺钱的日子，口袋里的钱突然多起来后，反而会觉得手足无措。

很多去过欧美国家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触：在中国，无论早晚还是周末，随时随处都能看到在努力工作、学习的人，路上的行人更是个个脚步匆匆。而在国外，周末是度假娱乐的时间，即便生活再拮据的人，也很少会在周末加班。

“别打扰我行嘛，没看我在忙着吗？”

爸爸坐在电脑前忙碌着，一行行的代码从屏幕上滚过。女儿抱着玩具，希望爸爸能陪她玩会儿。

“囡囡乖，爸爸工作呢！爸爸赚了钱，给囡囡买玩具，好不好？”

妈妈赶紧走过来，让女儿别打扰爸爸。

“我不要玩具，我就要爸爸陪我玩。”

“你……”

看女儿如此不听话，妈妈举起了手，随即看到女儿脸上委屈的样子，暗暗叹了口气，顺手摸了摸女儿的脑袋。是啊，好像一家人很久没有一起出去玩过了。就连近在咫尺的社区公园，一家三口都难得去散一回步。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如果不工作，怎么应付越来越昂贵的物价和越来越高的房费、学费、赞助费？

对大部分工薪阶层的中国家庭来说，结婚生子和买房租房都属于较为沉重的负担。如果没有父母支持的话，绝大多数青年夫妇是很难付起房子首付的。在种种生活压力下，民众的幸福指数一直难以上涨。

事实上，就算解决了物质财富问题，我们也无法保证自己的幸福。在追求物质财富的同时，我们砍倒了太多的树木，导致大量水土流失，造成很大程度的空气和水污染，生存环境愈发恶劣。

前不久，湖南省汉寿县围绕县域公共环境管理问题进行调研，结果表明：支柱产业做大了，但人们的生活环境变差了。“十一五”期间，汉寿县虽然在工业化和城镇化方面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但由此造成的环境污染等问题，逐渐成了制约县域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调研发现，工业“三废”、农业污染、生活废弃物污染和医疗废水、废弃物等严重污染了居民的生活环境，有的地区还出现了各种民事纠纷，对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影响。有关方面虽然发现了问题所在，但在GDP增长、工业化和城镇化等指标的压力下，也只能眼看着问题愈来愈恶化。

汉寿县面临的发展问题，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全国各地必须面对和解决的紧迫问题。工业化

进程的加快，虽然有利于增长社会的物质财富，但如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最终还是难以提升人们的幸福感。

经济发展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但却不是万能药方，对个人如此，对国家也是如此。多年来，一些地方将GDP作为评价地区经济发展质量和自身政绩的最重要的指标，因此不惜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虽然政府意识到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先后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等方针政策，但还是难以协调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数据显示，我国GDP年均增长率数倍于发达国家，但单位能耗同样是发达国家的数倍，而污染更是高达30倍。不少专业人士表示担忧，认为中国的经济奇迹很快就会结束，因为环境保护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势必会制约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更为具体的数据显示，我国七大河流中超过一半的水资源派不上用场，将近25%的居民享用不到纯净的饮用水，超过30%的土地遭受过酸雨的袭击，同样有超过30%的城市人口只能呼吸被污染的空气。而且，越是经济发展快速的地方，环境污染也越严重。

对国家来说，追求更高的GDP是一种欲望；对个人来说，追求更多的物质财富同样是一种欲望。然而，欲望既能成为进取的动力，也能成为幸福感的奴隶。因此，很多人越是努力奋斗，越是感觉缺乏幸福感。有追求是应该

的，奋斗也是必须的，其实，只要不让欲望凌驾于友情、亲情、事业之上，就能感受到幸福。

一旦突破欲望的控制，经济增长速度或许会放缓，但污染会降低，噪音会减少，生活环境会变得越来越好。

一旦突破欲望的控制，收入水平或许会降低一点，但我们会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和朋友，亲朋好友之间的关系会得到改善，我们的幸福指数也会提高。

参考书目

1. 王佳宇：《中国经济改革 30 年：抚脉历程》，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4
2. 张文魁等：《中国经济改革 30 年：国有企业卷》，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4
3. 周立群等：《中国经济改革 30 年：民营经济卷》，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4
4. 唐任伍等：《中国经济改革 30 年：对外开放卷》，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4
5. 凌志军：《沉浮：中国经济改革备忘录(1989—1997)》，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7
6. 艾学蛟、于一：《未触底的中国经济》，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11
7. 叶檀：《拿什么拯救中国经济？》，中信出版社，2009.11
8. 朱丹等：《中国式博弈》，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08.12

9. 剧锦文：《中国经济路径与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0

10. 王志浩：《大国经济之路》，中信出版社，2010.1

11. 韩保江：《中国经济》，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2

12. 林建华：《驻华大使眼中的中国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4

13. 郑新立：《中国经济分析与展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

14. 王东京：《中国经济观察》，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2



看懂 THE NO.1 BOOK 中国经济 的第一本书

看懂中国经济，让人民币追着你跑
从此不再做钱奴！

在这个衣食住行都藏着经济学秘密的时代，你若不懂一点中国经济，你就out了。

——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博士 杨钢

一本干净的书，以清晰简单的语言与脉络梳理经济的沉浮颠沛，巨变家国的经济青史，被做成了通俗易懂的文章。

——国务院参事室特邀研究员 保育钧

大家都在关注经济，但众说纷纭，真真假假，一时难辨经济真貌。了解最基本的经济常识与事实，你自己也能对很多玄而又玄的经济学现象作出演绎和推理，譬如勤劳与富有的相关性，民间柴米油盐与庙堂宏观调控的微妙关联……

——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王忠明

当你从抽象的理论框架中抽身而出，通过生活中点滴小事重新审视经济，你会发现猪肉、牛奶、面包中蕴含的经济学常识，正是我们解构中国经济的钥匙。

——民进中央经济委员会委员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 周德文

- ◆ 中国GDP增长了，你可能还站在幸福的门外徘徊；
- ◆ 勤劳未必就能致富，你还得防着兜里的人民币缩水；
- ◆ 你流的汗不值钱，是因为中国“人口红利”的存在；
- ◆ GDP拉着CPI跑，捂住钱袋子不如学会投资；
- ◆ 不是钞票多了，才会有幸福；
- ◆ 看懂经济大势，看破经济迷局，才能觅得致富路。

中国经济和你的日子息息相关，一本书参透它！

上架建议 财经

ISBN 978-7-5502-0545-1



9 787550 205451 >

定价：29.80元